



也并不经营土地，只是有征收当地田赋的权利。凡被征服的土地，特别在边疆地区和交通不便的山区，未经没收而留给原有部落首领或印度教王公去管理的，即是世袭的“札明达尔”，波斯语就是土地拥有的意思。拥有这种世袭领地的陪臣每年须向中央政府进贡一次，必要时还得出兵力以支援帝王的军队。在十六世纪阿克巴统治时代，非世袭的札吉尔最为普遍。但在十七世纪很多世袭的札明达尔夺取了札吉尔以扩充自己的领域，同时也承担了札吉尔的一切责任和义务。到了奥兰则布统治时代，札明达尔和札吉尔几乎没有分别，这两种领地也已经相同了。

莫卧儿王朝以前，早已盛行非世袭的领主制度。十三世纪德里苏丹统治时代所称的“伊克塔”和“齐尤尔”也就是札吉尔。札吉尔各有大小，最小的只管辖二、三百人的农村公社，最大的竟包括一个或几个帕尔加纳（县）的地面，领地内的公社人口共达数万至10余万。侍奉阿克巴的大臣往往拥有很大的札吉尔，其耕地多至25,500比加，合我国127,500市亩。大领主每年征收田赋，按每比加耕地不低于一个卢比征收。此外他还索取杂税，通称为“阿勃瓦布”，就是附加的意思。杂税的项目有收割税，家畜税，果树税，打柴税，盐税，以及多种市场税。新到任的札吉尔领主照例倒抽一次穆斯林头巾税。阿克巴虽曾公布废除这些“阿勃瓦布”的命令，但很多地方仍继续征收。他逝世以后，新的杂税还增加了许多。十六世纪阿克巴统治时代，最大的札吉尔近500个，中小的415个，更小的有1,388个。

札吉尔尽管有大小或贫富的悬殊，但都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既然他们从帝王那里获得赏地，也就要替中央政府服务。札吉尔领主之间彼此无隶属关系，也无等级的差别。领主对帝王的服务全按札吉尔的大小而定。平时要奉帝王命令，征用自己领地内一切劳动力，在强迫而又无偿的劳役制度下，修建宫殿、陵墓、清真寺、花园、桥梁、运河、公路以及水利等工程。



还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骑兵和战车，随时帮助帝王打仗。大领主还另外供养战象，并出一部分军费。如遇中小领主不能用自己供养的兵力征收赋税时，中央管理税务的官吏往往带同军队直接来征收。大领主喜欢用武力帮助帝王去扩大版图，以便从中获得新的札吉尔。

莫卧儿帝国的行政制度是军事化的。各省总督就是一省军队的总司令。大臣没有不参加作战的，他们从事民政或外交活动时也拥有军衔。亲王们，以至宫廷中御厨的杂役，也各有军衔。薪俸多少就按军衔高低而定。阿克巴曾以400名骑兵组成他的卫队，队员每月享有500卢比的高额饷银。他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包括步兵、炮兵、骑兵和海军。军职分为三十三级之多。当时最好的炮手是从土耳其移入的穆斯林。海军人员大部分是出于西海岸的印度和葡萄牙混血种。载有战象的军舰驻防在北印度的几条大河里。阿克巴很重视这些战象。以十只、二十只、三十只为一队，每只有一个名字。阿克巴的军队共有30万人，战象5,000只。作战时不但非世袭的札吉尔领主们要来助战，即世袭的札明达尔领主们也须参加。札明达尔往往借保卫公社土地的名义号召农民参战。札吉尔领主率领他们供养的骑兵充当军事指挥官。阿克巴统治的初期，近7/10的札吉尔领主是出于从波斯和阿富汗移入的家族，其余3/10多一点则大半为本地的穆斯林，一小半为印度教徒。但经过屡次叛乱，在阿克巴平定了这些叛乱而大力削弱札吉尔势力以后，外来的领主家族降为39%，本地的穆斯林成份升为40%，而印度教徒家族更增至21%。这显然是阿克巴缓和了民族矛盾的成绩。

六、当时社会各阶级

在这个封建国家里，9/10的捐税出于上万的农村公社。这



就是城市榨取乡村，中央榨取地方，王室和整个封建领主阶级剥削广大农民的局面。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都是拥有札吉尔的领主，因而400至500家最大的封建领主就成为统治集团的最上层了。他们骑在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兵士的头上而发挥几乎无限的权力。

当时的人们都默认，全国土地属于帝王，一切赋税由他支配，他不但派官吏直接征收，还通过封建领主间接积聚了大量财富。帝王往往拨用上千万卢比修建宫殿和陵墓，所藏金银、金刚钻、珠宝等简直无法估价，他库内现款也经常有数千万卢比。但他的开支同样是非常巨大。不但在宫中供养宫女和女侍4,000—5,000人，在德里和阿格拉两处还饲养3,000匹战马，800多头大象，以及数千头载重的马、骡、骆驼等。还有30余万兵士和脚夫的生活费也是要国库开支的。宫廷中的开支，只服装一项已很可观。阿克巴每年要添置1,000套衣袍，其中大多数是赏给他所召见的大臣们和外国使节的。

组成统治集团最上层的大封建领主分布在各地区。他们并未经营领地内的土地，也不干涉当地公社的事务；只是在领地内向农民征收赋税以及在形式上非法而实际却通行的各项附加税和杂捐。在收税问题上，他们有对农民行使审判和处罚的权力。在日常打猎和兴修各种私人建筑时，他们也有权向农民榨取无偿的劳役。他们所修建的宫殿、陵墓和园庭，都是仿效帝王的。

这样的大领主若非王公、太子和所谓国戚，便是有勋勋的文武大臣。他们的领地尽管有大小差别，但他们都直接隶属于帝王并为他服军役，他们彼此之间无隶属关系。十六和十七世纪时代，他们的领地是不能传授给子孙的。到了十八世纪领地才成为世袭制。当非世袭制盛行时，封建领主死后他所享用的一切，如房屋、大象、金钱、奢侈品以及书藉等，都须上缴入



帝王的国库。他们的子孙或亲属只得指望自己能重新获得较高的职位和与此相适应的领地。

由于没有财产继承权，很多大领地的封建领主变得异常奢侈，用贵重的宝石镶嵌自己的衣服、武器，甚至象和马的挽具。他们也不惜挥霍金钱，建造清真寺和陵墓。他们时常摆宴会，并重赏诗人。在宴会上这些大封建领主往往喜欢吟诵这样无聊的诗句：“大地无常，须及时行乐。不要累积钱财，因为钱财终于要归他人所有”。

到了十八世纪，领地世袭制尽管已经盛行，对农民的榨取尽管比过去更是苛刻，一般的大封建领主仍面临入不敷出的困难。他们所征得的税收除供养兵士、开支军费，并实行施舍以外，还不够他们的挥霍。于是他们往往同商人们结成伙伴，合资经营对外贸易以牟取暴利。有时他们竟勾结进出口商人，暗中给以走私的便利，从而分得一部分利润。当时这种事情在沿阿拉伯海的印度西海岸是层出不穷的。

属于统治阶级而数以千计的中央和地方官吏，到了十七世纪后半期奥兰则布执政时代，更加腐化了。那时居留印度的法国医师蒲尼曾说，原来盛行的官爵买卖愈来愈猖狂，无疑地又要增加这个不幸的国家的苦难了。因为奥兰则布连年发动战争，急于筹措大宗军费，向朝廷送礼的事情就愈来愈多起来，贿赂居然公开，钦差们同地方长官更互相勾结，大规模地从事官职买卖，并提高了这个买卖的价格。许多通过借高利贷而取得官职的人们，当然要狠狠地加紧搜括民脂民膏以捞回他们的本钱。

印度北部和东西海岸的对外贸易，在十六至十八世纪二百年间已很发达。同中亚细亚、土耳其和波斯等地区固然有陆路通商，同非洲、南洋、日本和中国也有海上贸易。除印度自造的大帆船外，还有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往来于印度洋、



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海湾。从印度输出的货物最名贵的有棉织品和丝织品，特别是以金银丝线织成的锦、缎。还有靛青、地毯和其它各种手工艺品。这些价格高昂的商品曾畅销于锡兰、苏门答腊、泰国、缅甸、也门、阿拉伯、土耳其、波斯以及西欧各国。印度进口的货物也是很多，香料来自非洲和南洋各地，象牙来自缅甸、泰国和非洲，珍珠来自锡兰和波斯湾各地，瓜果来自撒马尔罕和波斯，干果和杏仁、枣子、葡萄干等来自中西细亚，黑色厚呢来自法国，瓷器来自中国，铝来自英国，铜来自日本。当时每年要输入良马25,000匹左右，大多数是从波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等国经海陆两路运来的。从这样盛大的对外贸易局面来看，莫卧儿王朝的商人自然数以万计，分布于各海岸及大河流域。

当时从事商业的人十之七八信奉印度教，尤以西部古吉莱特人，中部腊其普德人和东部孟加拉人为最多。为适应商业的需要，他们也设了钱庄。商人很讲信用，往往以10万卢比的存款交给钱庄而不取收据。钱庄有许多分号，分布于各大城市，办理储蓄和借贷，还有票据通行全国，持票据者随时可向钱庄或分号兑取现款。沿海的某些大商家过着极其奢侈豪华的生活，但一般中小商人很节俭。因恐被人知道他富裕而横遭重税的负担，这些中小商人就用各种方法隐蔽他们的财产。在那个时期，印度出口货总价值远超过了进口货总价值，因而美洲新大陆发掘出来的金银通过欧亚各国大量地流入印度。除一部份变成器皿和妇女们所喜爱的首饰外，这些金银都被商人们埋藏到地下去了。商人们对王室和官吏供应货物时，不敢不压低价格。但对平民则不惜在价格和高利贷上实施双重的剥削。

莫卧儿王朝时代也有一个全靠工薪收入生活的阶级，称为纳克迪。这个名称是波斯文“银子”的意思。纳克迪阶级包括大小衙门中的雇员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兵士。帝王拥有各种军队



至少30万人，加上各区封建领主的10多万骑兵，全国兵士近50万。连他们的家属就不下200余万人。更应该注意的是大小军官们的家属都住于军营所在地。当时的军营所在地便是城市。军营中尤多男女仆役和手工业者。炮兵的饷额最高，骑兵次之。骑兵军官们生活不坏。但因他们在过年过节时须照例向他们的上司献礼，他们所得150卢比的平均月饷有时还不敷开支。步兵军官们所得饷银较少。普通一个步兵每月只得10个至20个卢比。军饷都是每两个月发给一次。有时到期未发或拖欠过久，官兵们只好出卖他们的马匹和家具，来维持生活或清偿债务。莫卧儿王朝末期，因欠饷而激成兵变的事情也是常有的。军队溃散后，许多兵士就去参加土匪集团。

商店和衙门里的雇员及仆役，生活比兵士还要苦些。他们所得工资远不如兵士，一般每月只有一个半至两个卢比。尽管在那个时代物价很低，恐怕不到今天物价的1/10，但他们穷得仅能维持每日一餐。每餐所吃也只是大米、豆类和牛油的混合物。他们所住的地方，只是涂泥的墙和铺草的屋顶。屋内家具也很少。炊事要靠拾牛粪、马粪来当作柴烧。这些穷人们往往千方百计索取小费以补助糊口。一旦失业，就不得不去要饭。十七世纪名叫塔浮尼埃的一位法国珠宝商到过印度六次，他曾叙述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乞丐，估计总数达百万以上。除失业的雇员和仆役以外，这些乞丐还包括更多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

在封建社会里，从事生产的人们只有手工业者和农民。城市手工业者既生产出各种货物供应国内市场，又生产了大批运往国外的商品。替莫卧儿王朝赚得不少财富。但他们自己还是过着穷苦的生活。居留印度十二年的法国医师蒲尼，在他1670年给法国财政大臣柯尔伯的报告中曾说：“这些手工业者永远不会富裕，他们自己只求能免于饥饿，和穿着粗劣破烂的衣服。”



他们如果增加一点收入的话，就会被商人更多剥削一点，商人也就会被官府更多榨取一点”。至于乡村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更是低微。在农村公社中他们不参加耕种，但替农户修造农具和家具。每次收获时，他们分到应得的一份粮食和其它农产品。

在中古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盛行崇拜祖先，手工业者组织了行会制度；西欧各国基督教教会组织，同时也有手工业行会制度；印度就很不相同，祖先崇拜、教会组织和手工业行会三种制度都没有。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印度社会却全面发展了梵文所称贾提制度。法显和玄奘先后将“贾提”译为种姓。种姓制度便是印度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印度在奴隶社会时代早有僧侣、贵族、商人和雇农四个阶级。后来每个阶级又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分化为很多集团。这种集团就是种姓，是等级同姓氏结合起来的。人一生下来就属于某一特定的种姓，只有在同一种姓内才可以通婚，共同饮食。因此各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不能通婚，不能同位而坐、同席而食、同井而饮。可以说是阶级死硬化的表现。这个种姓制度开始是封建时期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后来国家法律也就将其固定下来。主要在印度教徒中盛行，但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也受到影响，直到现在种姓制度还普遍存在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锡兰四个国家。马克思说过，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

莫卧儿王朝统治下，城市和乡村各阶级早就划分为等级高低不同的许多种姓。一般说来，社会经济最低的种姓都在乡村。但农民大体上也有上中下三个不同的地位。地位最高的是集体农户，他们所种的是种姓所共有的田地，这种田地往往分布于两个村庄。中等的是所谓村内棚户，所种的是王室的田地。租税直接上缴给封建领主或王室派来的收税官员。下等农户是大



批从村外移来的雇农，其地位接近农奴，可以说就是农奴。

阿克巴死后，随着贸易的扩大和发展，封建领主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为要取得更多的金钱，封建领主们不断地提高税额和杂税。这就使税捐、田租、利贷及连带地价一起增加了。农民们在政府、商人和族长的重重压迫下，生活越来越贫困。在阿克巴死后二十年，居住在阿格拉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经理弗兰西斯科·彼耳沙特写道：“各省都很贫穷，以至应有5万卢比收入的札吉尔有时连2.5万卢比都拿不出来。同时向农民勒索得很凄惨。留给农民的只是一些仅够充饥的干面包”。事实上那时农民们逃亡到城市去当仆役，去做挑水、养马、运货等事的就很多。离村去当兵的也不少。

阿克巴在位时曾有1556年阿格拉地区的灾荒，1574年古吉莱特地区的天灾和瘟疫，以及1595—1598年连续四年而区域更广大的饥荒、水灾和流行病。当1616年阿克巴的儿子杰汉基统治时，北印度几乎大部分地区鼠疫流行，随即遭遇荒年。阿克巴的孙子沙杰罕在位三十八年，在这个期间印度北部、南部和西部竟有七次严重的大灾荒。禾苗往往象火烧过的一样，颗粒不收。农民的眼泪就好似断了线的珠子，瞻望前途，绝无生路。更不用说将妻子儿女出卖为奴仆的事了，就是人吃人的悲剧也曾有过。在封建剥削制度下，无疑地农民是最受迫害的阶级。

七、阿克巴的子孙

古今中外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不断发生。自十六世纪中至十八世纪初，阿克巴、杰汉基、沙杰罕和奥兰则布四人相继做了帝王，这就是莫卧儿王朝最兴盛的时代。在这一百五十年间，王室内部子篡其父，父狱其子，兄杀其弟的残酷斗争也层出不穷。阿克巴求子心切，每年赴印度教神庙去祈祷，盼望他的腊



其普德族王后生下一位太子。果然1569年8月30日太子沙利姆出生了。沙利姆32岁时谋篡王位，援引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势力竟驻兵在阿拉哈巴德而宣布独立。阿克巴命他幼子法兹尔从德干高原带兵回阿拉拉首都。法兹尔中途被其兄派人刺死。同时宫内另一派贵族阴谋以沙利姆的十七岁长子赫斯牢继承王位。阿克巴目击这样情况，愤慨而得病，终于在1605年10月17日逝世。

沙利姆在他父亲逝世后第七天做了皇帝，改称杰汉基。次年1606年3月阿格拉首都为他大举庆祝，连日盛宴有十七天之久。宫内拥戴赫斯牢的阴谋早已失败，此时杰汉基赦了他儿子篡逆的罪，并给予大厦一幢和现款10万卢比。不料赫斯牢野心复燃，潜逃出宫，赴拉合尔举兵谋叛，因此父子相见于战场。赫斯牢几度战败而被囚。杰汉基把他儿子的双目在阿拉哈巴德狱中弄瞎了。赫斯牢后来再次得赦出狱，但不久被其弟赫拉姆毒死。赫拉姆做了太子，1627年登王位而号称沙杰罕。

1611年3月杰汉基在阿格拉出巡街市的时候，遇见35岁的波斯女子名诺基罕，不到两月就娶了她做王后。这位王后善写诗句，能创造纺织品图样，设计新首饰和新服装，又时常伴随皇帝出外打猎。有一次她射中了一只猛虎，杰汉基马上赏她当时值10万卢比的一对金钢钻手镯。诺基罕那样被宠爱，她的父亲和长兄等都做了大官而享有很大的札吉尔。杰汉基自己从15岁起已习惯于狂饮，娶了诺基罕更不问朝政，大权旁落于诺基罕父兄手里。

杰汉基不象他父亲阿克巴那样目不识丁，他善于阅读各种典籍，浏览波斯诗文，熟习印地歌曲，并步其祖先巴布尔后尘，也写了一部著名的回忆录。杰汉基不但自己喜欢绘画，且供奉很多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画家，提倡并促成了腊其普德一派的作品。他对克什米尔和北印度其它地方的动植物还有很广泛的



知识。在宗教政策上，同他父亲一样，对各种宗教，包括西欧传来的天主教，他都一视同仁。

杰汉基53岁时，疾病缠身，久已不问朝政，宫中便大闹继承王位的问题。他有四个儿子。长子赫斯牢，如上所述，早被次子赫拉姆毒死。三子巴勿兹因嗜酒沉饮也早去世。1627年11月杰汉基由克什米尔返阿格拉首都途中病死后，幼子沙利雅得王后诺基罕的支持而在拉合尔称帝。但诺基罕的长兄，亦即赫拉姆的岳父，一面软禁他的胞妹、一面出兵助其女婿击败了沙利雅。沙利雅被处死，赫拉姆改称沙杰罕继承王位，这位岳父阿沙夫汗就做了首相。阿沙夫汗从他领地上所获收入年达500万卢比。他所拥有的珠宝财富竟多至2,500万卢比。

阿克巴很喜欢他的孙子沙杰罕，他逝世时这位孙子年已13岁。沙杰罕是中等身材，黑眸白脸，额部很宽，右眼、手指以及左脚都有黑痣。不到5岁他就开始识字读书，说得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也学会了印地语和土耳其语。他不喜欢饮酒，但他爱好骑射、击剑、打猎、诗歌、音乐和美术，没有一天不滥用香水以自娱。沙杰罕的母亲是一位腊其普德公主。沙杰罕20岁时同诺基罕王后的内侄女亦即阿沙夫汗的女儿蒙塔慈玛哈尔结婚。当沙杰罕依仗他岳父的势力继承王位，那时年已36岁了。

沙杰罕黎明起身，祷告完毕即开始问政。他往往站在大殿的窗口向远处看去。这时红色堡垒的墙下百姓争相瞻望他。他从窗口走上了宝座，朝见群臣，接受了各省递呈的奏折。每逢星期三早上他亲自审判重大案件。群臣退出后他就批阅奏折，有时监督正在进行中的工程，且召见亲信讨论问题。中午他进了内宫，那里王后蒙塔慈玛哈尔还要披览关于福利或慈善事业的各种呈文。傍晚沙杰罕又召见少数人谈话。晚餐以后他在内宫听妇女们歌唱。在未睡眠时，总有人在帘幕后面把历史、游记和伊斯兰教先知的传记朗诵给他听。不象他祖父阿克巴和他



父亲杰汉基，他是不赞成印度教，更是反对天主教的。

十七世纪上半期葡萄牙殖民者在孟加拉建立了军事基地，贩卖奴隶，抢劫农村，横行一时。1631年沙杰罕命孟加拉总督用武力镇压这些葡萄牙人。在加尔各答附近双方交战达百余日之久。葡方虽有七千炮兵，仍被莫卧儿军队击败，从葡萄牙人牢狱中释放出来的印度人多至万人以上。过去葡萄牙人常常迫使孟加拉人信仰天主教，此时沙杰罕就乘机报复。他命令4,500名葡萄牙俘虏全体放弃天主教而转奉伊斯兰教，否则要把他们终身监禁或当作奴隶。

在沙杰罕指挥下的莫卧儿军，包括骑兵、步兵、炮兵和海军，1648年44万人，军饷支出的浩大可想而知。沙杰罕曾先后派兵远征阿富汗，因无结果而召回部队。但他胜利地平定了印度南方的叛乱，任命他儿子奥兰则布为德干总督。当时王朝的统治已扩大到二十二省，每年征收田赋2.2亿卢比。沙杰罕经常拥有6,000万卢比的现款，还有值1亿卢比的珠宝首饰等。他的宝座就值1,000万卢比。

沙杰罕迁都于德里。自1639至1656年在德里建筑了红色石堡、宫殿、花园、清真寺等。清真寺工程就花了百万卢比。沙杰罕还在故都阿格拉为他的亡后玛哈尔建筑了一座陵园。陵园波斯文为“泰吉”，今人仍称为泰吉·玛哈尔。这个工程经过二十年才完成，所用工人有2万名，尽管工资很低廉，也花去4,000万卢比。当我在印度参观这座陵园时不禁赋以五律一首如下：

沙后穹窿墓，萧萧枫树风。

红砂张翼殿，白塔卫幽宫。

池水滔滔逝，岚云霭霭笼。

斯陵工费巨，咏叹古今同。

十七世纪时代莫卧儿王朝的税捐奇重，差役频繁，官吏多



贪污，土地多荒芜，水利多失修，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当时如果没有大批驻兵，农民们早就暴动起来了。帝王们在财政上如此挥霍，贵族、大官、大商人的生活也是奢侈成性。惟独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兵士一贫如洗，度日如年，遇到灾荒只得束手待毙。古吉莱特、旁遮普和孟加拉等地区，在沙杰罕执政时期都曾有严重灾荒。尽管沙杰罕豁免了田赋并实施了救济，死亡率仍然可惊。当时城中还有狗肉当作羊肉出卖，乡村里则将人骨碾磨掺入面粉。这种情况使我们猛忆杜甫的诗句。他咏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莫卧儿王朝那时贫富悬殊的程度如果和我国公元八世纪唐代相比，几乎不相上下。

八、王朝的没落

沙杰罕有四个儿子都被任命为总督。长子达拉封于西北部旁遮普，离德里首都最近。次子舒雅封于东部孟加拉和奥里萨。三子奥兰则布远据中部的德干高原。幼子茂拉特在西部古吉莱特。这四位名为藩镇，实则都是小皇帝。他们都拥有军队，各自为政，不听父王指挥，甚至各在自己的区域内颁发货币。终于演出了争夺王位、互相残杀的悲剧，历时四年之久。1657年沙杰罕在位已三十年，他们三个儿子结成联盟。会师进攻他们的长兄达拉。次年达拉战败。沙杰罕被其三子奥兰则布囚于阿格拉。再一年，即1659年5月，奥兰则布竟正式登基，自称皇帝。沙杰罕被关禁了八年，于1666年74岁时逝世，葬在他生前为玛哈尔后所营造的陵园中。

当太子达拉被击败的时候，奥兰则布马上捉住他的弟弟茂拉特而借故杀掉。达拉率军西行，由腊其普德转赴信德。他在信德半沙漠区流浪时，被当地王公所出卖。奥兰则布将他捕送



德里，迫使他在首都街市穿着破烂衣服游行，还怕有人拥戴他继承王位竟将他暗杀于狱中。次年，即1660年，奥兰则布派兵穷追其兄舒雅，驱逐他到缅甸边境阿拉干森林区。舒雅全家死于土人手中。沙杰罕未死前五年就已经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被他第三个儿子所杀害了。奥兰则布并把他的侄儿们毒死或终身监禁。又因怀疑他自己的长子苏尔丹企图篡位，也把他拘禁起来。奥兰则布自己的女儿查勃恩尼沙反对她父亲这种措施，亦被捕入狱。兄妹二人均死在狱中。

奥兰则布惯于猜忌，残酷成性，但生活颇有节制，从不饮酒。他笃信伊斯兰教，非常虔诚。他在德里的红堡内用大理石筑了一座规模很小的清真寺，在拉合尔用红砂石建立一座大规模的清真寺，在贝拿勒斯竟拆毁了印度教大庙把它改建为清真寺。尽管在位四十八年，他没有兴修其它建筑。他是被伊斯兰教中的守旧派所拥戴的，比他父亲沙杰罕更要反对印度教，因而被他下令拆毁的大小印度教庙宇仅腊其普德一个地区就多至186座。他禁止印度教徒的节日，鼓励他们转奉伊斯兰教，并恢复了阿克巴早已废除的人头税。1679年4月2日印度教徒数千人在这座清真寺前抗议征收人头税，奥兰则布竟下令用大象和战马驱散群众，当时伤亡很严重。

从1659至1681的二十二年期间，除西北和东北边境曾有战事外，全国尚称太平。但因锡克族、腊其普德族、马拉地族和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的反对派群起而反抗守旧派的歧视和压迫政策，奥兰则布后期，1681至1707的二十六年期间，没有一年不发生战争。直到奥兰则布89岁逝世时，马拉地族部队还同50万莫卧儿王军周旋于印度西部各地区。因连年战争而王朝政府急筹军饷，以致捐官卖爵，贿赂公行，政治腐败，赋税奇重。村户逃亡，生产低落。1669、1672、1681和1691年农民四次起义，社会经济原有秩序到处遭到破坏，王朝统治的基础显然大



为动摇。从1702至1704年恒河流域又连年大旱，天灾之后继以瘟疫，死亡人数超过200万。奥兰则布也曾因筹饷的缘故，在1690年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缴纳的现款而准许他们在西海岸苏拉特一带和东海岸恒河口继续贸易。从此英国殖民主义者就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建立了统治全印度的基地。

奥兰则布逝世后，子孙们争夺王位，经常发生内战。不久，德干高原和孟加拉相继独立。1740年入侵的波斯军队在德里屠杀了九天，沙杰罕的宝座也被劫去。叛乱的马拉地军队虽被阿富汗军队在1761年1月14日帕尼帕特战役中击溃，叛乱的腊其普德军队仍盘据在阿格拉和德里附近。莫卧儿末代帝王沙阿兰姆在1764年勃哈尔战役中亲自去投降了英国人。从此英国军队长驱直入恒河流域，英卧儿帝国就沦为英国的附庸。马克思在1853年写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地人打倒，马拉地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⑥。

莫卧儿王朝在印度历史上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是从外面侵入的。因为阿克巴运用开明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腊其普德族的协助，就统一了整个恒河流域。那时印度南方，就是现在的安得拉、马德拉斯和迈索尔等地区，还属于完全信奉印度教的维加雅纳加尔帝国。莫卧儿王朝时代，德里附近军营中产生了以印地语文法为结构而以波斯和阿拉伯语为辞汇的乌尔都语文，这便是现在巴基斯坦的国语。莫卧儿统治者带来的波斯文化也影响了印度原有的建筑、绘画和音乐。用波斯文所写的印度历史和主张人道主义的印度哲学都是在这个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德里市容的繁盛，堪与布哈拉、巴格达、开罗、君士坦丁和北京相比美。可见莫卧儿时代的文化就为今日印度文化打下了基础。



注：

- ① 印度中部高原。
- ② 尼泊尔南部沼泽地带。
- ③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译文略有改动）。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 ⑤ 《论俄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5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6版。

原载《外国历史小丛书》，
商务印书馆，1979年8月北京版。



《印度的垄断财团》

序

从经济观点出发看印度，时下的研究者可以说有三派：第一派认为印度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象早期的英、美、德、法那样，因此主张马上在印度组织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派认为印度的社会性质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因此竭力鼓吹要组织农民起来革命；还有第三派，他们认为印度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有着很多封建势力。那么，到底那一派观点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要说明白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在印度发展的过程，换言之，就必须了解那些主要垄断财团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1944年4月我到了印度，并在德里大学历史系任阅卷员。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印度还没有独立，比拉尔和塔塔等财团虽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因很难从国外购置机器设备，所以他们的事业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47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废除了各大小土邦，统一了国内市场，实行了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使财团有了发展生产和扩大市场的方便。

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现在印度已有90多个大小财团，其中一些大财团都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垄断组织，在亚非拉国家中可以称为大资产阶级，但是，与欧美和日本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相比，却又是小巫之见大巫。例如，1981年美国



最大的企业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资产达 1,000 亿美元，约为印度最大财团塔塔的 50 倍。

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不仅要依靠国际市场，更加需要设法扩大本国市场。目前印度人口为 6.8 亿，没有什么购买力的贱民占到总人口的 16%，又据印度官方统计，全国 48%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可以说研究印度财团势力如何增长和国内购买力如何提高是我们了解印度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必要课题。

本书的第二、五、六、十章是由孙培钧同志写的，第二和第八章是由华碧云同志写的，这两位曾对印度大资产阶级作过长期研究；第一、三、九章和第七章分别由张敏秋同志和高鲲同志所写。他们四位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搜集了许多参考资料，吸取了学者们关于印度财团的研究成果，作了较深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印度是我国的近邻，同我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今天印度在第三世界中又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了解印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本书作者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值得一读。

陈翰笙

1983 年 9 月 18 日



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有历史兴趣的一位英国文学家韦尔思去年8月29在伦敦《晨报》发表一段议论，说“欧洲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改革中，英国竟将降为二等国家，实在使爱国的英国文人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感觉是感觉。事实是事实。英国所以成为一等强国全靠帝国主义的威权。帝国主义的台柱是工商业的发展，资本的堆积，劳工权利的剥夺，和一切殖民地的利用。从工、商、劳、资、殖民地五方面的事实来看，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未可乐观呢。

六十年前英国居世界市场魁首。他需用的棉花原料占全球42%。二十年前德美两处工业发达，不让英国独步于世界市场。今英人所需棉花原料已降至全球22%。试举煤、电、船三种工业以证英国的组织与技术均有落后的光景。自欧洲大陆用水利发达电气工业后，英国煤业即受不吉的影响。统计3,000煤坑分归1,800公司管理。组织既不良善，资本亦不雄厚，于是乏力设备新式机器去开采下层煤矿。更无资本将煤块变成煤油。煤价日涨而工业的成本和航轮的运费日增。凡此皆足以妨碍英国商业的发展。

从英美电业的比较，英人的组织与技术实不敌美人。芝加哥270万人中约有65万是仰给于一个大电公司的。伦敦800万人的地方有电公司七十七处。芝加哥制电的设备费每千“瓦特”为四十二磅，需要煤力850“格兰姆”。伦敦则每千“瓦特”为七十五磅，需煤1680“格兰姆”。然美城的电业利息为6.55%，



较多于英京的 5.37%。

凡尔赛条约曾经很痛苦的剥夺德国平民的利权，但反而使德国的资本家从德政府手中取回许多资财。因此德国现时船厂的设备较优于英国。且德国造船的技术早已胜过英国，若往汉堡等处察看，德国工匠正忙着替英国大轮船公司添造新船呢。三十五年前英国航船的吨数占全球 48%。十五年前减至 41%，今则不过 30% 耳。英国煤的出口减少，影响于原料和食料的进口。航业亦随之退步。

英国工业的不发展从原料和食料进口的比例亦可证明。民国二年英国进口货中食料占 38%，原料占 35%。民十二年食料增至 50%，原料减为 30%。据英国商会会长列斯脱 (Cunliffe Lister) 今年 7 月 5 日在国会中演说，英国近五年来国外商业的成绩大有不利的趋向，在依靠外债来恢复工业的时候，进口额年年超过出口额。

英 国	出口货额	进口货额	进口超过出口额 (均以百万磅计)
民十至十一	697	855	153
民十一至十二	955	1,158	203
民十二至十三	997	1,338	341
民十三至十四 年五月	995	1,390	395

现时美国国外商业较战前为 119%。法国较战前亦得 106%。独英国只有战前的 57%。英国商业的退步主要不外乎四种原因。一是战后各国购买力的减薄。二是英国各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三是美日两国出品的竞争。四是伦敦已非世界财政的中心。

世界财政的中心已移至纽约，这是因为美国有 250 亿美金



的资本散放在国外。欧洲大战后英国亦须依赖美债去恢复工业，英国工业联合总会会长Vernon Willey曾明白的宣示这种情形（见今年7月15日伦敦“Daily Herald”报）。十二年前英国资本的出口年达墨银16.4亿元。五年前为8.8亿余。二年前减至2.4亿余。今春澳大利亚欲在伦敦募集公债2,000万磅。所得仅500万，余1,500万磅只可向美国去要求。

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等殖民地，既不能望英国的资本来振兴他们的产业，在财政上自然只有依靠美国的趋向，且英国的海军力已降为与美国平等的地位。以上所说的三处殖民地因为地理的关系不得不仰仗美国海军的保护。英美同种大联合的主张更使英国让美国在太平洋中有独霸的希望。殖民地渐与美国接近，则英国在土耳其和中国的政策未必就能得他们的同情。至于埃及的政变和印度罢工的风潮益使我们明白英国帝国主义破产的预兆。

英国资本家在殖民地所获的利息年年有减无增。他们就没有余款来偿给国内一般劳工。且为减轻成本起见反欲剥夺工资。所以惹起煤矿海船等罢工大风潮。这些罢工的工人团体自然赞助中国的反抗帝国主义。英国职工团联合会最健的领袖蒲赛尔和英国矿工总会会长柯克等22人代表国际劳工后援会执行委员会为救护中国工人于8月22日布告大不列颠全国工界。布告译文如下：

“政府当局已经宣布他们的政见，要每个工人的工资贱落下来。据他们说，这是因为国外商业的竞争。何以国外商业的竞争如此激烈呢？再据他们说，这是因为国外工资的低廉。现在我们确知劳工条件最恶劣，工资又最轻微的，莫过于上海、天津等处的英国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中国人已经表示不满于这种待遇了。压迫我们的政府当局要我们助他们去压迫中国工人。你们若助他们去打倒中



国，你们就是助他们来打你们自己。不要帮助政府当局。要帮助中国工人。”

现时英国工党的势，因职工团的活动，渐渐要集中于蒲、柯等一般新人物。职工团势力愈猛，则寄托于英国工党的“第二国际”愈加动摇。因为“第二国际”是主张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的。职工团是反对资本主义和他的帝国主义行为的。“第二国际”战败了。他的事务所已在八月间从伦敦迁移到日内瓦了。九月间英国职工团在斯加婆罗（Scarborough）开年会时又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议案两件。一为援助国内外劳工向资本家正当的要求。一为赞成各殖民地脱离英国而自决为独立国家。综观英国国内外状况，工、商、劳、资、殖民地五方面均不许帝国主义的发展。英国前进的大变迁从此可以推想。世界的政治经济因此亦必受转移的影响。

十四（1925年），十二，十九，北京

原载《现代评论》第3卷第55期

（1925年12月26日）



十一国钳制中国的协约

德国和丹麦已加入四年前所订的对华条约。从此九国协约要变成十一国协约了。这个协约就是华盛顿会议中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委员会用两个半月工夫开了三十一次会议的结果。名目是英、美、日、意、法、比、葡、荷、和中国自己共同遵守“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这个意义虽然在英日三次盟约、法日盟约、日俄和约和日美协约中已经载明。二十余年来列强角逐于东亚，何曾保存平和主义呢？欧战以后英美渐趋于国际资本主义联合的主张；法日仍旧继续国家资本主义的行动。两方冲突，危及时局。故有华盛顿会议，将列强剥夺中国的政策从竞争的变为合作的。九国协约固能暂时获得列强间在东亚的和平。但中国何曾因此有细微利益？实际上这就是列强盗取中国的联合预约券；中国反因此更失去国家的尊严与自由。

德国自实行道威斯经济改造的计划后，已处处受英美的支配。所以对于欧洲方面德国只可跟从英法等签订罗卡诺协约，对于东亚方面只可跟从英美等签订华盛顿协约。德国既加入，同时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丹麦亦照样签订九国协约。德、丹两国现将与列强在中国合作。换言之，资本主义国家对我的侵掠政策较四年前更有团结。

一星期前，德国签订华盛顿协约的电报来京时，柏林 Tageblatt 的访员，Arbeiter-Idustrierte Zeitung 的访员，和富兰克堡 Frankfurter Zeitung 的访员相继来问中国舆论界对此的论调。北京各报除照例登载电报外竟无一评论此事者。呜呼，我国舆论界的幼稚实不让外交界也。

原载《现代评论》第3卷第57期（1926年1月9日）



国际新局面

导 言

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单是悬挂在内政问题上。良善的内政须适应世界潮流才可以站立得稳当。无论从那一方观察——路矿、商业、关税、银行、法权等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早已结成功比珠丝还要紧密的一个大网。我们的铁路不甚发达，然而我们的铁路就有了1,092兆元的外国资本。去年我们煤矿的产额不过是2,400万吨，然而23%出自日本势力下的抚顺，22%又出自英国势力下的开滦。外国人只要互相谅解了便能用武力来屠戮我们：上海，汉口，沙基，万县，南京等事件层出不穷。替外国政府当走狗的虽然战败还可以苟延残喘，变本加厉的来杀害同胞。无辜的百姓长此受冤屈，多么痛心呀！研究外国事情，明了世界大势，决不仅是学校课程中应有的目标，实在关系到我们民族全体的命运。

中国铁路上的外国资本
(A. Kantorovich)

国名	国 币	百分数	国名	国 币	百分数
俄国	401,000,000	36.6	德国	47,000,000	4.3
日本	338,000,000	31.0	比国	35,000,000	3.3
英国	132,000,000	12.2	美国	29,000,000	2.6
法国	91,000,000	8.3	荷兰	19,000,000	1.7
			总计	1,092,000,000	100



一、战后欧洲的经济

正在十三年前欧洲起了很大的战争。日本政府便趁火打劫，公然以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侵犯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亦趁火打劫，做着一百三十天的“洪宪”皇帝。四年的国际大战送掉 29,561,530 条性命，毁坏无数万千兆财产。活着的人经过这番震动以后，富的浪费得更多，积蓄的更少，贫的消耗得更多，工作得更少。从前说土耳其是欧洲的病夫。现在欧洲是世界的病夫了。

战后欧洲经济上的病根不外乎六项：

债款的亏累；

纸币的滥发；

关税的增高；

“联盟”的无效；

东欧的隔绝；

赔偿的过分。

欧战时期内俄、比、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其它巴尔干与波罗的海国家都向法国借款，达美金 3,500,000,000 (H.E.Fisk, *Inter-Ally Debts*, N. Y., 1924, pp. 348—9)。

捷克斯拉夫，意大利，和法国等都向英国借款，达美金 11,200,000,000。英法等九国又向美国借款，达美金 9,626,700,000

(U.S. Statistical Abstract, 1922, pp. 555; *Annuaire Général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923, pp. 279)。负债国只有两种

方法归还本利。一是借债还债，不过是暂时的办法。一是

增加出口或发达海运，可算正当的手续。但欧洲正缺乏资本，

大多数国家尚继续筹借外债。有些国家利用放债方法一时仍可

增加出口货。以后债上添债，必致国际财政的支配更不平均。



因此放债国迟早必受产业停顿的重大影响。战后美国的对于欧洲，欧洲各国间的互相对待，都以为损人可以利己；利己就必损人。债权国不愿免除或减少债款。结果使债务国的富力低落，不仅不能偿债，并且不能购买债权国的出口货。债款的亏累实是恢复欧洲经济的一大障碍。

岂但国际公债，各国的国内公债在战争时期亦涨得惊人。例如英国，从 700,000,000 增至 7,000,000,000 英镑。法国从 34,000,000,000 增至 150,000,000,000 佛郎。德国除去纸币和赔款以外，它的国内公债在战时从 5,000,000,000 增至 140,000,000,000 马克。停战后因为弥补公债，救济国库的缘故，政府不得已滥发纸币。1921 年德国中央的度支预算有 71,000,000,000 马克的亏空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20/21 Finanzwesen)。德国的纸币就从 2,000,000,000 马克 (1913) 增至 80,000,000,000 马克 (1921)。法国的度支是一样穷困。大借款做不到，资本税通不过议会，所得税又不易扩张，要求出入相抵，纸币便愈发愈多。法国国家银行的纸币从 5,723,000,000 佛郎 (1913) 增至 37,000,000,000 法郎 (1921)。然而德法两国各种地方银行和各处商会所发的纸币还没有统计。那些纸币既非全国通用，又因单位很小不便于流通。

欧洲在 1921 年简直成了一个纸币世界。不但西欧方面有滥发的风气，东欧亦何尝不然！捷克斯拉夫对于纸币政策素来小心。那时捷克的马克亦只值我们的大洋四分。至于波兰的马克不过合中国大洋一分的 26%。俄国一万万的卢布才抵得大洋一元。如此情形，汇兑发生很大的困难。从前匈奥的钱币可以供给 50 兆人民，战后政治分裂，金融随即混乱了。

从前比、法、瑞士的佛郎可以通用，战后哪里办得到呢？纸币滥发对于国内的信用亦撼动了。

因此商店不敢多积货，工厂不愿多制造，批发者无长期经



营的希望。于是工商堕落，物价飞涨，失业的人愈增，谋生的路愈窄。拥有大资本者还不要紧，中产以下的就不堪其痛苦了。1923年8月18日柏林的鸡蛋每个售价55,000马克，茶叶每磅值155万至200万马克。那时普通的工资只有200万马克一天。即中产阶级一人一月的进款亦仅够买皮鞋三双而已。

纸币滥发，币价降低。出口货应该容易增加了，但事实却又不然。战前英国货物销售于德国的比运往印度的还多；对于英国商业说，300兆的亚洲人不及60兆的欧洲人做主顾。英德间进出口总额有英国与殖民地间总额的1/3。柏林和维也纳是欧洲商业最重要部分的中心。列强互相贸易的关系远胜于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联属。战后列强屡次增高关税，号称保护国内实业。新成立的弱小国家，更因极端国家主义的感情，不惜破坏国际经济自然的供求。时髦的保护关税不免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作用。客观的讲来，这是以人为的界线损害自由贸易。欧洲战后的关税政策真无异作茧自缚，自讨苦吃。

国际竞争的心理作用，根本上是基于国际公法的失去效力。

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首先提议组织一个“国际联盟”的团体，希冀挽回国际公法，图谋世界和平。英国赴巴黎和会的代表（Robert Cecil and Smuts）极端赞成。于是“国际联盟”组织起来了。这个古怪东西最初即为少数强国所把持，成为它们外交上的一种利器。

德国和美国（战败的和战胜的）都没有加入，都不能加入。那“联盟”常任理事的位置被英、法、意、日四国代表独占，好象一百二十年前俄、奥、英、德四国外交家垄断维也纳会议一样。1920到1922年间德国曾诚意的要设法加入“联盟”。法国右派当局屡次抗拒。前年2月左派登台，知道德国若不加入“联盟”，一切困难问题如莱茵和萨尔等将永无解决的可能，方才肯和德国商订所谓安全保障条约。直到德法钢铁业大联合



快要成立，法国不得不和德国在经济上同盟去抵抗英美的時候，德国代表始取得“联盟”的一个常任理事的位置。

去年8月12日德国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载它驻伦敦访员说：“假使我们德国人忘不掉战时的法国，那就更不能忘掉战前的英国。我们和英人的经济竞争似乎胜于战前。英人对我们已很有些猜疑的地方。照今日情形看来，潘格资确比张伯伦要好得多。”德国加入“联盟”，何尝不象其它国家一样的貌合神离呢？列强的外交家表面上娴和温柔，骨子里狡滑慧黠。以前的国际公法破产了，现在的“国际联盟”依然没有什么出息。国际不能相待以诚，国际信用怎样能不堕落呢？

不但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未加入“国际联盟”，社会主义的俄国（现改为苏联）亦没有参预。战前俄国的库券和股票差不多1/3是在外国人手里。从1909到1913年，平均每年中俄国要供给世界市场的粮食27.8%，木材23%，麻40%，鸡蛋44.7%。那时英国货物销售于俄国的比运往非洲和海洋群岛的还多。可见东西欧间财政和经济的联属非常紧密了。战后呢？日本、英国、捷克、波兰，相继用武力干涉苏联。白党将领柯尔嘎克，戴尼根，尤屯尼奇，蓝格尔，洗曼诺夫等又赖列强的暗助，不断的扰乱苏联边境。随后又有瘟疫和旱荒。天灾人祸齐把农产与市场隔绝，俄国对西欧每年至少2,500,000,000金卢布的商业几乎完全停顿。因为政治的干涉和武力的干涉，竟使欧洲经济遭莫大的打击。列强不得不讨论如何与东欧恢复经济的关系以救济西欧的穷困。这就是今年（1927）5月4日四十余国代表在日内瓦地方开国际经济会议的一个原因。国际会议不一定有什么结果，更不一定有良好的结果。试观巴黎和会，耗费五个月光阴，虽然闹得喧腾震天，末了还是弄成一个万恶的凡尔赛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德国要割地给法国和波兰，要永远不和用德文德语的奥国联合，要无条件的放弃海外



殖民地；要让列强的进口货享受特别铁路运税；要交出 5,000 辆火车头和 15 万辆火车、要让列强共管德国境内的四大河流；要每年送给比、法、意等国它煤产的 1/3；要把所有 1,600 吨以上的船全数放弃；还要在五年以内每年替英法等国造船 20 万吨。至于赔款问题呢？列强自己不知要多少才称心合意，所以条约中未曾规定确实数目，将估计的全权付与一个列强组织的赔款委员会。欧洲停战了两年半以后，该委员会开始和德国算帐。帐单在列强方面不能再说不满足了。可是，影响于欧洲的经济如何呢？尤其是德国否认这笔帐或无力还这笔帐的时候，它的影响又如何呢？

据英国经济学家 J.M.Keynes 的统计，德国的赔款至多应为 2,120,000,000 镑。他的算法是：

战时比利时的损失

物质方面 150,000,000 镑，租税 100,000,000 镑，外债 250,000,000 镑，合计 500,000,000 镑。

战时法国的损失

物质方面 500,000,000 镑，租税 300,000,000 镑，合计 800,000,000 镑。

战时英国的损失

海上的 540,000,000 镑，空间的 30,000,000 镑

合计 570,000,000 镑。

战时意大利，尤哥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损失

合计 250,000,000 镑。

各国总计共为 2,120,000,000 镑。但利用凡尔赛条约第 231 条，列强还要向德国索取军士的抚恤费。

抚恤费总计有 5,000,000,000 镑；

英 1,400,000,000 镑，法 2,400,000,000 镑，意 500,000,000 镑，美及其它 700,000,000 镑，共计 5,000,000,000 镑。



若是严格依着凡尔赛条约来讲，那末，德国至多不过赔款 $(5,000,000,000 + 2,120,000,000) = 7,120,000,000$ 镑。尽德国所有可转移的财富 1921 年 5 月以前只能交付这个数目的 $1/20$ 。

然而赔偿委员反违背了条约所规定，要求德国的赔偿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即使几十年后 1966，德国勉强能够付清本款，以后每年还须补缴利息 780,000,000 镑！

从前英法妒恨德国制造品，决意排斥它。现在德国没有现款了，它们又愿以德国制造品作为赔偿。法、意、比等国一方面恳求免除或减少对于战债的担负，一方面它们又硬要德国差不多完全担负全部的战债。政治上措置如此自相矛盾，欧洲的经济怎样能恢复原状呢？

二、世界经济的趋势

凡尔赛条约成立后，德国好象不能恢复它们的帝国主义威权了。它的属地全数被人夺去，国外投资被人收没，赔款多至无法付给，海陆军减削到无能为力了。可是德国有权势的资产阶级如 Hugo Stinnes 一流人物还不曾醒悟，依旧要“卷土重来”，来重新试验那旧经济政策。初则乞援于美国资本家，因而整顿币价，再兴工商，经济界从死里复生。后恐国内银行铁路永远受掣于美国，又赶紧施行亲英联法的方略。

现在英、法、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渐渐要打成一片了。八年以来，世界的产业从分量讲已有稳定的样子；从性质讲就未必有稳定的倾向。并且据 *Mirovoye Khozaistvo*, 1919—1925, 和 *Viertel Jahrshefte für Konjunktur forschung*, 1926, 统计，社会主义国家战后生产恢复的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较速又较匀。



何以知道产业的分量渐趋稳定呢？一是因为世界生产量已近乎恢复战前的数目。二是因为世界商货总值亦已近乎战前的数目。三是因为世界金融关系大部分已恢复战前状况。

测验生产量的多少，最好是简单的测验生产工具的分量。煤、铁、钢三项是现代最紧要的生产工具。我们试观这三项的产量如何：

世界煤、铁、钢的产量 (以 1913 年的百分数计算)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煤	86.3	97.6	80.5	86.8	98.3	96.9	97.6
铁	70.0	83.5	49.7	73.6	89.8	87.2	95.7
钢	81.1	99.2	60.6	90.5	105.5	105.0	115.4

关于商货的总值，我们可以把三十四国的国际贸易额来统计。1913年每月平均值11,566兆金马克。1924年每月平均值10,512兆金马克。1925年每月平均值11,259兆金马克。若以百分数算，则1924年有1913年的91%，1925年即有97%。世界金融的关系，从纽约市面上外国钱币价目就能明了。试观下列统计：

纽约的外国钱币价目 (以金币的百分数计算)

年份	月份	德国	英国	法国	比利时	波兰
1921	每月平均	98.80	90.78	27.07	24.01	101.88
1925	每月平均	99.96	99.25	21.69	24.66	92.16
1926	1月份	99.96	99.87	19.31	23.52	69.53
1926	7月份	99.96	99.87	12.72	12.59	52.64

虽在法、比、波，甚至在意，金融有贱落的趋势，英、德、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则皆稳定。挪威，丹麦，



日本，西班牙的币价且有升涨的事实。

何以知道产业的性质渐趋于不稳定呢？一是因为世界生产涨落的速度毫无准则。1919年是落，1920涨，1921很落，1922至1923渐涨，1924渐落，1925涨，1926很落。战前生产的涨落大多是纯粹的经济关系。战后生产的涨落又大多受政治的影响。

二是因为世界生产涨落的程度比战前还要险恶。例如英国产铁额最低的时候比上年降19.4%（1889—1892年的平均），战后有一年（1921）降60%，去年（1926）煤矿大罢工竟使产额降96%。战前美铁产额最低时（1908）降39%，战后（1920—21）降48%。又如战前英国物价最低的降落是24.8%（1883—1887年的平均），战后有一年（1920—21）降48%。美国1867至1871年平均物价的降落是20%，1920至1921年是40%。

三是因为世界生产发展的程度与速度在国际比较上差别太大。统而言之，美国生产力飞涨；欧洲则还未十分恢复战前的精神。即在欧洲，法国有渐涨，英国有渐落的样子。按年而论，可观下列一表：

1920—21……英美—恐慌；德法—隆盛；
1923……德—恐慌；其余各国—隆盛；
1924……法意—隆盛；德美—摇动；英—减色；
1925……美法—隆盛；英—减色；德—前半年隆盛，
后半年恐慌；
1926……英德—减色；美法—隆盛。

四是因为世界生产的工具——钢铁——增加得比生产还要快；同时生产的工具可以造机器亦可以造枪炮，可以助生产亦可废止生产。1925年世界生产的情况：（以战前产额的百分数计算）



	钢产额	铁产额	种小麦的面积
世界	115.4	95.7	112.9
欧洲	93.9	78.4	90.8
美国	141.2	118.8	110.8
英国	96.5	60.9	83.8
德国	103.5	93.2	92.6
法国	99.6	95.0	82.0

五是因为生产虽然近乎恢复战前的状态，参预生产的人数反而减少。试观英德两国失业的统计即能推想。

德国（失业人数以工团人数百分数计算）

1913…… 2.9

1926 1月…… 22.6

1926 6月…… 18.1

英国（失业人数以国家保险者百分数计算）

1913…… 3.7

1926 1月…… 11.1

1926 6月…… 14.7

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恢复的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较速。可从几方面观察。例如农田的恢复，苏联较速于德法。煤产和钢产的增加亦是如此。

农田面积以 1909—1913 年的百分数计算

	1909—1913	1922	1923	1924	1925
英国	100	105.3	97.6	82.8	89.4
德国	100	82.1	87.2	88.9	90.7
苏联	100	63.6	77.0	83.2	86.4
法国	100	80.0	81.8	81.2	81.7



煤钢产量以 1919 年的百分数计算

		1919	1922	1923	1924	1925
煤	苏联	100	108.3	159.2	192.1	210.8
	欧洲其他国家	100	118.2	113.6	127.7	123.1
钢	苏联	100	181.7	364.8	571.4	1,066.0
	欧洲其他国家	100	130.7	133.3	165.8	170.5

战后苏联生产恢复的程度很均且稳，有如下列表中所统计：

	农业增加百分数	大规模厂工业增加百分数	小规模手工业增加百分数
1924—25	108	155	124
1925—26	119	143	115
1926—27	105	114	108

近年帝国主义国家的钢铁工业又发达起来了。可是，这大半是因为扩充军备的关系，并非因为正当的生产工具有多大增加。列强积极的添置军备，恐怕就要把全世界引到破产的路上去了。

英、法、意、美四国的：

军费（以美金计算）	陆军人数	军用飞机	年度
993,000,000	1,613,000	150	1913
1,743,000,000	1,681,000	2,400	1923
1,768,000,000	1,821,000	3,550	1926

美国总统顾理治邀请英日代表于今年 6 月 20 日在日内瓦开三国缩减军备会议，无非是一套假面具。就使美国此时愿意和平，和平能够办到吗？



三、英国产业的堕落

我们既然明白世界经济的趋势，尤应明白现时世界政治经济的转移中有什么要点。这种要点，经过一番分析后，可以说有三个。一是英国产业的堕落。二是苏联产业的改组。三是美国威权的生长。三者都是国际外交发展的关键，即国际新局面的基础。

有历史兴趣而不甚懂得历史的一位英国文学家韦尔思(H.G.wells)在1924年8月9日的伦敦《晨报》发表一段议论，说“欧洲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改造中，英国竟将降为二等国家，实在使爱国的英国文人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感觉是感觉，事实是事实。英国所以成为一等强国，全靠它的工商发达，资本堆积，劳工权利的剥夺，和一切殖民地的利用。但从工业、商业、财政、殖民地和劳资问题几方面的事实看来，英国的产业已有堕落的现象。

六十年前英国居世界市场魁首。英国需用的棉花原料占全球42%。二十年前德美两处工业发达，不让英国独步于世界市场。今英人所需棉花原料已降至全球22%。试举煤、电、船三种工业以证明英国的组织与技术均有落后的光景。自欧洲大陆用水利发达电气工业后，英国煤业即受不祥的影响。统计3,000处煤坑分归1,800家公司管理。组织既不良善，资本亦不雄厚，于是无力设备新式机器去开采下层煤矿，更无资本将煤块变成煤油。煤价日涨而工业的成本和航轮的运费日增。凡此皆足以妨碍英国商业的发展。

从英美电业的比较，英人的组织与技术实不及美人。芝加哥270万人中约有65万是仰给于一个大电公司的。伦敦800万人的地方有电公司七十七处。芝加哥制电的设备费每千“瓦



特”为四十二磅，需要煤力 850 “格兰姆”。伦敦则每千“瓦特”为七十五磅，需要煤力 1, 680 “格兰姆”。故美城的电业利息为 6.55%，较多于英京的 5.37%。

凡尔赛条约曾经很痛苦的剥夺德国平民的利权，但同时使德国的资本家从德政府手中取回许多资财。因此德国现时船厂的设备较优于英国。且德国造船的技术早已胜过英国。若往汉堡等处察看，德国工匠正忙着替英国大轮船公司添造新船呢。三十五年前英国航船的吨数占全球 48%。十五年前减至 41%。今则不过 30% 罢了。因为英国煤的出口减少，影响于原料和食料的进口，航业亦跟着退步。

英国工业的不发达，从原料和食料进口的比例亦可证明。1913 年英国进口货中食料占 38%，原料占 35%。1923 年食料增至 50%，原料减为 30%。据英国商会会长列斯脱 (Cunliffe Lister) 最近在国会中演说，英国五年以内国外商业的成绩大有不利的趋向。并且在依靠外债来恢复工业的时候，进口额年年超过出口额：

英国（都用百万镑计算）

年 份	出口货额	进口货额	进口超过额
1921—22	667	855	158
1922—23	955	1, 158	203
1923—24	997	1, 338	341
1924—25	995	1, 390	395

现时美国国外商业较战前为 119%。法国较战前亦得 106%。独英国只有战前的 57%。英国商业的退步要不外乎四种原因。一是战后各国购买力的减落。二是英国各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三是美日两国出品的竞争。四是伦敦已非世界财政的中心。



世界财政的中心已移至纽约，这是因为美国有空前的巨大资本散放在国外的缘故。欧洲大战后英国亦须依赖美债去恢复工业。英国工业联合总会会长(Vernon Willey)曾明白的宣示这种情形(见 London“Daily Herald”, July 15, 1925.)。十二年前英国资本的出口年达 164,000,000 镑。五年前为 88,000,000 镑。二年前减至 24,000,000 镑。

去年(1926)11月3日德国 Frankfurter Zeitung 载称“战后世界商业的新发展即是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的一个事实。美国购买于欧洲者渐减少，购买于亚洲者渐增多。同时日本与中国购买于欧洲者亦渐减少，购买于美国者反增多。日本1913年的出口货 23.3% 运往欧洲；1925年已降至 6%。日本的出口货运往美国者同时期内从 30% 升至 74.5%。又欧洲输入澳洲的货品同时自 71% 减至 54%；输入阿根廷的自 80% 减至 64%”。

1924年春天，澳大利亚要在伦敦募集 2,000 万镑的公债，所得仅 500 万，余 1,500 万镑只可向美国的资本家去讨求。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等殖民地既不能望英国的资本来振兴它们的产业，在财政上自然只有依赖美国的趋向。且英国的海军力已降为与美国平等的地位。以上所说的三处殖民地因为地理的关系不得不仰仗美国海军的保护。英美同种大联合的主张更使英国让美国在太平洋中有独霸的希望。

英国在殖民地的威权既是堕落，英国资本家在殖民地所获的利息年年有减无增，他们就没有余款来偿给国内一般劳工。且为减轻成本起见，反欲削夺工资。所以惹起煤矿海船等罢工大潮。去年英国煤矿工人与矿主间发生很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直接原因，不是积极的要求增加工资，不是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无非是消极的反抗无条件的削夺工资。铁路工人会，运输工人会，印刷工人会，煤气和电气工人会，建筑工人会等先后



同情罢工。英国产业界乃突然有九天的总罢工。

总同盟罢工的失败，应该由英国历史上特产的一种贵族化和妥协化的劳工领袖负责。麦克唐纳尔，亨德孙，汤姆斯等就是这些人物。汤姆斯等没有向矿工申明要停止罢工的用意，就悍然宣告总罢工完结。于是资本家开始排斥那些 3,653,527 人投票赞成总罢工者。总罢工的失败，既非出于劳资双方的调协，又非出于政府高压的威权，不过出于工人领袖的盗卖工人。所以组织较强领袖较优的矿工仍旧继续罢工。煤矿罢工在半年以上。因罢工的关系，英国生产损失至少在 300,000,000 镑以上。

煤产额锐减就牵连到钢铁业。半年内英铁产额降至原有的 1/30，钢产额 1/20。钢铁业堕落，自然影响到对外商业。本年英国每月平均的进口货总值，较去年罢工前少 6%。出口货总值亦少 15%。若以去年一至八月份比较前年那同时期的统计，对外商业总值的亏折约在 110,000,000 镑以上。姑不计国内商务与交通事业所受的打击，即生产与对外商业两项损失已达 360,000,000 镑。这个数目是远过于英国煤矿资本的总额。照从前办法，假使政府继续津贴煤业十五年，还用不了这个数目。依现在工党的提议，如果政府决然收买煤矿为国有，亦用不了这个数目。可知英国劳资问题，不仅是经济关系，并含有重大的政治用意。

英国法律承认职工团存在的权利已经有一百年。因为帝国剥削殖民地所得的额外利润特多，能够贿买一部分工人和他们的领袖，所以劳工运动在英国进展太慢。直到去年才有总同盟罢工。本来总同盟罢工如 1903 年荷兰的，1904 年意大利的，1905 年俄国的，1909 年瑞典的，1910 年法国的，1913 年比利时的，都含有政治意味。在英国独有那些贵族化和妥协化的领袖还不敢承认去年的总罢工有政治作用。这是完全违反事实，并且使



一般工人大失信仰的地方。总罢工在英国失败以后，新领袖为适应事势的需要，快要登台了。英国保守党的月刊《英国的评论》（去年6月份）曾说：“这次总罢工对于国家利益似乎没有不能补救的损失。只有一件不可救药的事体：那就是少数危险分子乘此机会伸张他们的势力，想要夺取国家最高的政权”。

现在英国保守党（现在的政府党）提出“工团法案”（The Trade Union Bill），要禁止同情罢工和政治的罢工；一方面否认工会监视罢工的规定，一方面默认资本家或雇主的锁闭工场；要推翻政治基金募集的组织，防止稳健组合的发达，激成阶级的斗争。将来政治的同盟罢工，总罢工，迟早还须重演于英国。产业必因此而更受打击。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正未可乐观罢。

四、苏联产业的改组

苏联从帝国制到苏维埃制，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还在过渡时代。在这过渡时代自然有许多新状态，许多新危险。可是，我们可以先观察苏联的生产是否有进步或增加。因为生产是一切经济的基础。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没有生产就讲不到分配，谈不着享受。再要看苏联在这过渡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否消沉；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升长。末了还要知道这种消沉或升长的速度如何，才能推测苏联经济改组后是否稳固。

生产的增加自然是尽人欢迎的。无怪乎六年前苏联采用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一般资本家都十分满意，以为苏联快要恢复资本主义政策了。岂知它国内的经济仍可分为两类。一是社会主义化的各种国有的与合作社的经济。一是非社会主义化的，小资本家经营的，或农民自有的经济。这两类的消长，就是苏



联内政和外交的关键，间接就影响到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至于消长的速度又与世界市场的情形，世界经济的分工，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有连带关系。若苏联社会主义化的经济升长颇速，那末，足见得它抵抗帝国主义的本领不小。反之，若苏联资本主义或非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不在那里消沉，自然可以证明它不得不顺应帝国主义的潮流了。

关于苏联的统计，我们可以用苏联中央政府的国政建设委员会所发表的。这个委员会是谋永久事业的一种固定的组织。它任用的人员非统计学专家即是对于统计很熟悉的。况且它的性质有保守中立且免除成见的可能。它是个独立的机关，非但不附属于任何行政部分，并且不受任何行政团体的操纵。

苏联的生产力和生产额，在大革命以后四年内几乎降到最低限度。因为英国趁苏联有旱荒和瘟疫的时候，还要故意和它为难。英国实行了那可怖的经济封锁政策，想断绝 130,000,000 俄人的生活。到了打它打不败，俄它又饿不死，英、法、意、日等才正式承认苏联。于是苏联能够把目光从军事转移到民政。所谓新经济政策，就是要赶快恢复生产实力的工具。首先便裁红军，从 530 万减为 180 万。现在的军额已速减至 56 万左右。军费节省了别的就好办。我们可以在苏联产业改组中看它的农工商业、交通、和财政。

农业自然是苏联经济最重要的部分。农民占它们全国人口 84—90%。全国农业的基本富额为 6,527,000,000 卢布。这项数目较工业的基本富额多 1,191,000,000；较交通事业的基本富额亦多 477,000,000。全国土地总值 63,000,000,000 卢布，占国富 62.5%。统计 2/5 的土地都是农田。又全国房屋总值 19,592,000,000 卢布。在乡间的较城市的多 414,000,000。全国关于农业的工业，如木材、面粉、糖业、烟业、皮料、棉织、毛织、麻业、制衣、造纸等类，共有工人 67.6 万余，占全国工



人数目 45%。此类工业中所雇用的事务员 共计 7.8 万余，占全国工业事务员 39%。苏联有组织的工人 23.2% 直接依赖农业为职业。苏联工业的资本 13.4% 完全为农业而经营的。

苏联需用农耕机器日广。农耕机器的制造亦有进步。这四年内犁的产额已增三倍，铧犁则六倍。去年流白来兹开公司重行改组，每年所造的收割机器已达 13,000 余架。然苏联每年仍须输入农耕机器值 2,000 余万卢布。农工互相促进，于此可见一斑。

农产由进口货物 11.98%，四年以内，已减至 2.63%。其总值已减少四十倍。农产由出口货物 51.51% 增加至 57.95%。足证对外商业中农产的地位渐渐抬高。苏联国内商业中农产占总额 1/3，其重要可知。但农民只以农产 1/3 出售于市场。故国内商品总值的 37% 为农产，63% 为工产。1925 至 1926 年份全国市场所存谷类农产为 23,360,000,000 俄镑，较上年份多 10,816,000,000。这是 22.8% 的增加。今年份农产的总值照战前价格计算为 11,124,400,000 卢布，较去年份多 2,093,100,000。

苏联工业的发达亦甚明显。工厂的人数有 250 万，一倍于四年以前。全国工艺工徒和工厂人数大约相等。每年艺徒的产物总值至少有 3,000,000,000 卢布。前年份工业投资为 385,000,000 卢布，去年份增至 778,000,000。今年份多至 1,070,000,000。前年份国有工产的总额照战前价格计算为 3,761,000,000 卢布。去年份多至 5,333,000,000。这是 42% 的增加。苏联工业的生产力较战前已高 108%，其中钢铁的增加胜于它种工业。今年份工业投资的大部份，675,000,000 卢布即是发展钢铁的。换言之，工具的生产比货物的生产还要紧些。苏联工化政策的业绩据此已可证实。工具的生产在那里进步，无非是要使工业立于坚固的基础上，将来更可以希望扩



张货物的生产额。怪不得现今苏联欢迎纺织机器进口而限止纺织物件输入。今年五月伦敦的阿克斯楼搜查事件发生后，苏联就停止实行向英国购买纺织机器的契约而转向德国去采办。

比较 1920 的统计，苏联进口货总值增加十一倍；出口货总值增加三百余倍。去年份进口货为 633,000,000 卢布，今年份达 730,000,000。去年份出口货为 508,000,000 卢布，今年份达 685,000,000。进口货 60% 都应用于工业。此又为苏联工业化政策的证据。

交通事业的发达自然和农工商有密切关系。单讲铁路一项，近四年来，每年乘客已从 7,600 余万增至 160,000,000，路工已从 90 余万增至 100 余万；路款收入已从 404,000,000 增至 870,000,000 卢布。去年份修理铁路费用为 2,000 万卢布，今年份增至 5,000 万。一年以内所筑铁路有 4,500 里，撤旧换新的轨道有 1,600 里。统计全国各种交通事业前年恢复战前 44%，去年 52%，今年 75%。

财政的进步，那是反照生产的势力。苏联中央政费去年以后即无亏欠。同时国家预算额亦有升长。去年份为 2,812,000,000 卢布，较前年份多 36%。今年份为 3,842,000,000 卢布，较去年份多 37%。全国银行存款总额三年内增加八倍。按五个大银行统计，它们发行的金票去年份为 799,000,000，今年份为 1,238,000,000；去年份较前年份多 95%，今年份较去年份多 55%。它们存款的总数去年份为 802,000,000，较前年份多 93%；今年份为 1,214,000,000，较去年份多 51%。它们信用的总额去年份为 1,262,000,000，较前年份多 121%；今年份为 2,203,000,000，较去年份多 75%。

苏联产业改组后，虽有巨大的进步，然综观今年份苏联的经济尚有下列诸弱点。

(一) 货物另售的价格较前年份增高 10—11%。



(二) 五年前生产所需费用只有指数 225, 今则涨到 271。

(三) 对外商业的出不抵入尚有 4,500 万卢布。

(四) 中央政府所积蓄款项不及预算表规定的那样多。

(五) 铁路上货捐额虽抬高, 因为不纳费的运输太繁, 铁路收入较预算的数目大有减损。

(六) 燃料的需要较去年份加 102%, 燃料的供给反而短少 87%。

生产的增加自然不能表明苏联的特别。就是殖民地如印度、加拿大等处, 和道威斯计划实施下的德意志都在那里增加生产。我们要问的是苏联经济中资本主义是否消沉, 或社会主义是否升长。现时对于它消沉或升长的手续虽不易说明, 这几年来苏联经济的倾向社会主义已毫无可疑了。社会主义化的各种国有的与合作社的生产在全国农、工、商, 交通等等生产总额内, 前年份占 76.3%。去年份占 79.3%。今年份占 79.7%。去年份计算国有的资本为 11,700,000,000, 合作社的资本 500,000,000, 私有的资本 7,500,000,000 卢布。最可注意的是生产的工具差不多都不在私有资本下。生产工具的出品有 62% 已在社会主义范围内。

不要说那比较容易社会化的工业, 就是 2,200 万散居苏联的农户亦一个个的从非社会主义跑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了。革命以后政府曾将 8,700 万俄亩的田地和值 500,000,000 卢布的农具分给一般农民。现在除土地以外, 农业生产的 4% 完全在社会主义势力中。工业生产的 81.9%, 国内商业的 57.5%, 国外商业的 95%, 交通事业及信用机关的全部分都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



苏联国有的、合作社有的、和私有的产业，百分数比较

产 业	农 工 货 物 的 总 量				工 业 的 生 产			
国 有 的	44.4	48.4	51.0	52.3	69.6	72.1	74.5	75.3
合 作 社 有 的	4.3	4.5	5.2	5.2	5.5	6.1	6.7	6.6
私 有 的	51.3	47.1	43.8	42.5	24.9	21.8	18.8	18.1
年 度	1923	1924	1925	1926	1923	1924	1925	1926
	-24	-25	-26	-27	-24	-25	-26	-27

比较国有的，合作社有的，私有的产业，可知它们的价值与总量有升降；百分数亦有消长。因此我们可以明白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的增加及其增加的速度。这种速度几五倍于战前。现时还能利用战前已成立的工厂和已设备的机器，苏联生产增加的速度自然很高。以后的速度恐要减低了。可是，照现状看来，它们国内没有什么无益的竞争，生产增加的速度未必定在它国之下。英、美、德、法、日本仗着它们老练的技术和完密的组织，制造品常比苏联的要便宜些，并且要比苏联的好些。然而五十年前德意志亦不能赶上英吉利。后来靠它的关税保护政策的帮助，还不是变成富强的德国了吗？苏联采取对外商业国营的政策，要想和资本主义国家抗衡。所以它的代表在这次国际经济会议声明苏联现时无论如何不能抛弃该政策。

苏联的右派或反政府派还嫌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得太慢。它们的主张是：（一）促进工业化的速度；（二）厉行社会主义的农税；（三）再提高工资以鼓励生产；（四）赶紧和软化的英国职工团脱离关系；（五）趁早帮助西欧各国完成社会的产业革命。但苏联自产业改组以来，生产力与生产，并且是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下的生产，已明显的稳定的年年有进步。照这样进步下去，苏联自然会达到富强的目的，用不到右派所主张的急进政策。



五、美国威权的生长

意大利一位史学家 Ferrero 说得好，美国是分量战胜的地方。在美国人心理什么都喜欢多又喜欢大。这种欲望不能说是不可满足的了。美国虽只有全世界土地 7% 和人口 6%，它的铁路占全世界 40%，谷产 41%，煤炭 50%，生铁和木材 52%，锌矿和铜矿 60%，石油 64%，棉花 71%，汽车 90%。

汽车工业在美国要消耗全国羊毛 3%，钢铁 11%，硬木 15%，玻璃片 52%，煤汽油 80%；要雇用 310 万职工，全部事业值 1,500,000,000 美金；这真正是一个伟大的工业了。美国去年的统计汽车多至 22,342,457 辆。差不多 5 个美国人平均就有一辆汽车。英国要 56 人，法国要 68 人，德国要 272 人，意大利要 409 人，波兰要 2,126 人才能平均有一辆。可见得美国的优胜没有疑问。

美国财富简直占全世界的 1/3。据 1924 年的统计全世界银行存储的现金共为 9,379,400,000 美金。美国几乎有一半，4,547,400,000。欧洲大战以前美国的生产力早就远过于英国。现在更是如此了。请看：英美煤铁钢出产和英美棉花消费的比较（以全世界的百分数计算）

		1913年	1925年
煤 产 额	英	24.4	21.4
	美	43.2	45.7
铁 产 额	英	13.3	8.3
	美	39.8	48.1
钢 产 额	英	10.3	8.5
	美	41.7	51.1
棉花消费额	英	21.0	14.8
	美	25.3	27.3



(数目根据 Commercial Yearbook, 1925, World Almanac 1926, Mirovoye Khozaistvo, 1918—15)

因为美国实业发展，英国属地输入美国货增加得很快。以百万美金为单位，统计美国出口货到：

	1910—14	1923	1924	1925
澳大利亚的	38.7	119.4	125.2	148.5
埃及的	17.0	6.2	5.9	7.4
英领东印度的	14.2	39.5	44.3	52.1
英领南非洲的	12.9	28.4	36.0	46.2
西非洲的	3.2	8.1	8.0	10.7
东非洲的	0.7	1.5	2.6	3.8

对外商业的地位自然要影响到国内经济。战后美国的工价有向上，英国的有向下的趋势。怪不得近年来英国罢工的事件层出不穷，美国罢工的风潮暂时已经减少。据美国商部总长 Hoover 发表的第十三周年的报告 (Washington, 1925, pp.4), 英美两国工价的比较如下：

1920—24英美工价的指数 (1913 = 100)：

年度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英	230	260	200	170	170
美	199	205	193	211	228

美国大公司的红利差不多年年有增加，可以举美孚煤油“托拉斯”为例。按照 Pforzheimer 的统计，战后美孚的每年纯利：(单位：美金)

1915年	62,401,204	1921年	115,294,292
1916年	98,627,875	1922年	129,039,865



1917年	99,957,923	1923年	138,423,295
1918年	103,480,916	1924年	150,388,555
1919年	105,901,477	1925年	153,506,099
1920年	115,776,793	1926年	200,319,594

有职业美国人占全国人口26%。它们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照W.J.King的统计，在那里一往直前的增加。另外以每年的币价折算成为战前的币价。这个数目又表示每年平均的购买力亦有增加。

有职业的每人平均所得

	当年币价 美金	1913年币价 美金		当年市价 美金	1913年市价 美金
1909	791	823	1918	1,386	879
1910	809	829	1919	1,669	934
1911	812	821	1920	1,851	907
1912	844	850	1921	1,537	887
1913	864	864	1922	1,586	979
1914	836	828	1923	1,821	1,113
1915	861	843	1924	1,840	1,121
1916	1,014	919	1925	1,971	1,165
1917	1,232	947	1926	2,010	1,186

去年(1926)美国全国所得达89,682,000,000美金，占国富的1/4，实力空前的巨数。但美国的威权不仅在此。去年7月19日英国议员Snowden在伦敦国会演说，说美国每年所得，每年要增加200,000,000镑，而每年资本的积蓄要增加10,000,000,000镑。美国资本左右国际局面的伟大势力真正惊人。

战前美国欠欧洲各国5,244,000,000美金；战后欧洲各国反欠美国9,626,700,000美金。战时美国运往欧洲的军用品战



后贱价卖给欧洲各国，又使它们添上 574,800,000 美金的债务。结果美国在经济上得着非常的地位。如欧洲各债务国偿还美国利息四厘和本钱一厘，美国的财政部每年就可以得 500,000,000 美金以上的收入，够付中央政府度支预算的 1/5。

战前美国欠欧洲		战后欧洲欠美国	
(以百万美金为单位)			
英	3,344	英	4,277.0
荷	700	法	2,997.5
法	700	意	1,648.0
德	350	比	349.2
其它	150	其它	355.0
共计	5,244	共计	9,626.7

(Reibultz, Sozialwiss. Forsch., (Liberty Loan, Statist. abt. IV, H. 3, Berliu, 1926, S. 7) Abst, Washington, 1922, P, 555)

英国 Lord Robert Cecil 以为此番欧战后美国经济的地位和拿破仑战后英国经济的地位仿佛是同样的可以领袖各国：纽约接受伦敦的威权好象伦敦从前接受荷兰的威权。这个比较恐不甚确切。因为那时英国资本势力所及大半限于欧洲，现在美国的资本差不多要操纵全世界了。最容易看得见的美国势力就是各重要都市的美国银行。试披览美国大报纸如纽约《时报》，马上可以知道许多外国股票和公债的价格。美国投资的人自然对于世界各政府的事业不得不特别注意了。前年美国对外投资有 1,149,000,000 美金。去年增至 1,906,705,101；



1926年美国对外投资（美金）

	中央和地方政府	各种工商业公司
欧洲(德国除外)	187, 252, 000	189, 524, 680
德 国	87, 460, 750	348, 395, 550
欧洲总计	274, 712, 750	537, 920, 230
加 拿 大	130, 882, 122	357, 219, 500
南 美 洲	263, 057, 970	139, 630, 950
中 美 洲	10, 920, 000	104, 421, 880
美国属地	8, 881, 000	2, 547, 539
其它各处	19, 779, 000	56, 732, 100
总 计	708, 232, 842	1, 198, 272, 259

德国的钢铁，意大利的汽车，古巴的蔗糖，瑞典的火柴，智利的铜矿，都得着美资的帮助。

美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异常神速，可举例如下：（以百万美金为单位）

	1909	1912	1913	1920	1923	1924
加 拿 大			417		2, 425	
古 巴	141			525		1, 250
阿 根 廷				40		234
智 利		15		200		400
哥伦比亚		2		30		80

1924年5月16日美国财政部总长宣言，欧洲各国政府欠美政府的债款总计有11,896,000,000美金。又据Max W. Winkler统计，去年美资在国外除掉政府公债尚有13,252,000,000美金。这样，美国对外投资总额已达25,148,000,000，再过十



年，按 Robert Dunn 推测，不难到 50,000,000,000 美金的数目。

美国是分量战胜的地方。美国亦是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每年所得在一万美金以下者占全国人口 75%，所得在一万和十万间者占 21.3%，所得在十万以上者占 3.7%。美国对外的关系就取决于能够左右政府的少数资本家。华盛顿的外交和军政无非要使美国资本家到国外找寻市场比售出品；到国外找寻原料供给国内不断的生产；到国外获得治外法权，建设公司和工厂，且能尽量投资。所以国际政治经济的政策不听命于政治经济的学理，而不得不屈服于工厂银行的要求。所以 顾立治（现任美总统）的思想和新闻界的宣传还不能根本的转移国际政策。有这种根本的能力的实在是美国商人和投资家。

六、国际外交的发展

英法所以能战胜德奥曾赖有美国的援助。待战事完结，美国的海陆军以及军装食料等就用不着了。明知美国不能在战后立刻索价，尽可对它无所顾忌，所以议和席上只有英法说话的地位。威尔逊兴高采烈的赴巴黎，竟弄得垂头丧气的回来。

和会中英法都以德国为脏物，但各有它自己的目标。英法对和议的计划亦就各有差别。推翻德国的海权，减削它工业的势力，剥夺它一切殖民地，这是英国的政策。法国的意思要限制德国的军备并使它在地理上万难兴师报复。一面要求在莱茵河下游建设一个法国的保护国；一面想在范赫赛尔河下游使德国与波兰间发生境界的争执。苟有战事则法军能进占莱茵流域，而鲁尔地方亦必归入法国炮弹的范围。在德境战德军，不难长驱直入。于是南北可以截断，东西可以牵制，这就是法国福熙将军的深谋远略。



福熙的计划正是英国极端反对的。英国断不愿法国独自支配德国的政治经济。因为支配德国的就能称霸于欧洲大陆。称霸欧陆的即不利于英国。所以英相劳佐治利用战穷思的舆论，假意赞成美总统为世界和平所发表的主张。同时，他就竭力宣传法国计划的将破坏和局。究其实，英国那有诚意使德人真正得着民族自决的机会呢！沙，落兰，阿尔赛斯三处强被凡尔赛和约割归法人的版图，何曾得该地德人的同意，又何曾蒙英人仗义的起来抗议呢？

因为英美一致的反对，法相克来阁梭不得不谋暂时退让的办法。一面要订安全保障的条约，使德法再战时英美必以军力来帮助法国；一面在凡尔赛和约中埋伏好些条款以图将来实行福熙的计划。什么条款呢？德国解除武装，军队限定十万，不许有重大的炮队。法国并且有占据鲁尔流域十五年的权利。波兰与德国间边境又完全须照法国的意旨决定。这都是留为德国不能按期付赔款时实行福熙计划的预备。法国又故意把赔款数额提高，使德国万难应付，借此可望进军。到时法国实际还能称霸于欧陆。

法国的失败始于美国的否认凡尔赛和约与保障条约。英国声明无力单独订立保障法国安全的条约，故意与法国为难。到了1921年英国经济状况愈转危急，使它愈加感觉怎样受德国纷乱的连带影响的痛苦。劳佐治就竭力劝说法国对赔款问题宽待德人。他同时允许订立保障条约，使法境在十年内可以安全无敌。法国知道英国不肯成立实在的军事协约，且预料十年后正为德人复仇的成熟时机。因此亦不肯听从英国的提议。

1922与1923两年中，英法外交暗斗的风潮最烈。要缔结德国拉拢苏联去恢复资本主义威权的日诺亚会议，因此终归失败。英相陆旁拿所组织去解决赔款问题的巴黎会议亦因此毫无结果。于是马克一落千丈，佛郎随之跌价。法军有所借



口，实行占据鲁尔。同时谋促成莱茵流域似是而非的独立区。福熙的计划宛若复活。欧洲充满了二次大战的空气。但德国资本家的损失太多，不能再忍痛去抵抗法军。法国亦觉财力疲乏，不易长久支持。双方正待解决鲁尔问题的时候，美国便乘机而入了。

英国外交和美国资本联合起来，成就一个所谓道威斯计划。于是在德国创设银行，发行钞票，五十年以内不受德政府的支配。银行的董事十四人，半属外国籍，董事长亦不是德国人。赔偿委员会扣留关税、烟、糖、酒精、啤酒等税每年1,250,000,000金马克作为赔款。德国许多工业的股票和全部铁路的股票都归赔偿委员会经理，每年300,000,000金马克工业的利息和660,000,000金马克铁路的利息，统由赔偿委员会支配。德国每年至少要付2,500,000,000金马克的赔款，但没有规定年限，直须到委员会满意的时候才停止。这是历史上未曾有的赔偿办法。

道威斯计划无非要把德国的赔偿和抵押品国际化。国际化以后法国就不能独自支配德国。福熙将军的谋略亦不能应用。但所谓安全保障问题在昔不过是法人谋德的一种藉口，至今乃变为事实上必要的条件。德国人口增加的速率与法国外交孤立的情形都是足以使法人大起恐怖。故1924年法国利用英国工党内阁和平的态度，在日内瓦第五次“国际联盟”大会中成立一个国际仲裁的议定书。这种议定书如果发生效力，则德军侵犯法境时，英军必出全力以助法。不料工党内阁的命运不长久，继起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反对这种议定书而竟不予批准。

保守党政府重新替德法间提议安全保障条约。洛卡诺会议因之得以开幕。这个会议的重要成绩是什么呢？一是德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从此英法不以敌人看待德国。英国欲利用德以制法。法亦想利用“国际联盟”以拘束德国。二是英国保



障德、法、比三国的境界。此时英人不独对于法比两国担任援助，德国亦可得同样的保障。三是德国可以和波兰及捷克自订条约去解决一切关于境界的问题。这是明明要增加德国在东欧的外交自主权。四是法国干涉波兰和德国间境界问题时须受“国际联盟”的支配。波法与捷法两同盟须因此损失其原有意义。法国亦就不能称霸于欧洲大陆了。

但就大体说来，洛卡诺条约已经将凡尔赛和约解除了吗？法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所有的谋略现时确无实行的可能，它却能进占莱茵区域和沙地方。法国想借此以警备英人单独的去支配德国。同时英国故意利用德法间感情的失和作将来操纵外交的工具。

在东欧方面，今后波兰问题更将有无穷的发展与变化。德国的加入“国际联盟”，形式上虽为资本主义国家大联合的一个重要步骤，德国未必一时即愿意反抗苏联。对于波兰问题，德国与苏联尚有合作的必要。去年4月24日德外长史特来斯孟和驻德的苏联大使客拉斯丁斯基签订了一个五年为期的协约。德外长尽管说俄德协约毫不妨碍洛卡诺条约，苏联当局亦尽管说俄德协约无非为东欧谋“实在的”和平。究竟这个协约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据约文内容，则战时彼此有始终守中立的责任，平时彼此不得和它国构成经济或财政的对抗。假使苏联和波兰或罗马尼亚开战，德人就不仅要消极的守中立，并须防止法军越境到波兰去助战。俄德协约表面上虽为承继五年前勒泊罗协约，虽仿照去年的俄土条约，骨子里却又是苏联要破坏资本主义国家大联合的一种手段。

在东亚方面德国受了英美的影响，前年年底加入了五年前所订的对华协约。这个协约就是华盛顿会议中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委员会用两个半月工夫开了三十一次会议的结果。名目是英、美、日、意、法、比、葡、荷、和中国自己公同遵守“门



户开放”和“利益均沾”。这种意义显然在英日三次盟约，法日盟约，日俄和约，和日美协约中已经屡次载明。二十余年来列强在东亚何曾保全平和主义呢？欧战以后，英美渐趋于国际资本主义联合的主张；法日仍旧继续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两方冲突，急须调和，故有华盛顿会议，有四国协约，有英日同盟的废止。无非要想把列强剥夺中国的方法从竞争的变为合作的罢了。几国协约实际便是资本主义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盗取中国的联合预约券。德国自从接受道威斯经济改造的计划以后，已经脱离不掉英美的支配。所以对于欧洲方面它跟着英法签订洛卡诺条约，对于亚洲方面它跟着英美签订华盛顿协约。

一年以来，美国尽量投资给德国，很有攫取资本的专利，推翻道威斯国际化的倾向。因此招英国银行家的妒忌。德法经济的联合使两国钢铁业成为大陆托拉斯的中心。因此又惹起英美工业家的妒忌。意大利于去年4月和英国订立分配阿比西尼亚（一个“国际联盟”的会员）的经济的条约。英国显然和法西斯的意大利携手，同去扩张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了。意法在地中海区域不免互相猜疑，于是法人更加愤恨英人的助意。

英法疏远便是俄法亲善的机会。俄法亲善的议论，1922年2月巴黎的报纸早已有所登载。但两国亲善的起点在乎债务问题的解决。俄法债务本为欧战的一大原动力。十余年前法国若没有联俄攻德的政策，不供给俄政府5,000,000,000佛郎以上的借款；它的当局 Poincaré et Delcassé 若不竭力怂恿俄政府用大借款做军事的预备，何至有四年半震动全世界的大战争呢？俄国革命政府曾否认帝政府时代的旧债。直到去年2月，素来信仰国际会议的蒲立央第八次再出来任法国总理，素来不信仰国际借款的苏联财政委员长苏柯尼柯夫调任为国计院副院长，两国的代表四十六人才开一个债务会议。苏联提议募新债偿还旧债。法国可以交付机器和制造品作为新债。此事正在交涉



中。只要法国银行家肯给些援助，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无论将来俄法和俄德的关系怎样变化，世界外交的局面早已改换了。战前英国联法抗德，现在英国联美抗俄。这是国际新局面，是外交上最根本的关键。俄国的产业改组以后，社会主义即反帝国主义的势力渐渐增长起来。英国防备苏联比从前防备德国自然还着急。战后英国的产业堕落，旧帝国主义已经动摇。所以它不得不赶快拉拢那威权蒸蒸日上的新帝国主义的美国。至于美国对英的亲善，虽说因为同种的情感和苏联同居敌视的地位，实际最迫切的原动力还是英美间自身的财政和商业关系。英国政府欠美债甚巨。本利合计达 11,100,000,000 美金。以每年英国赋税总额的 3.6% 去偿还此债，须待五十七年后（1984）才能付讫。美国出口货运往欧洲的差不多有一半到英国。美国政府万无漠视英国前途的理由。

1925年美国 and 欧洲间商务的统计（以百万美金计算）

美国出口	美国进口	欧 洲 国 名
470	164	德 国
280	157	法 国
205	102	意 大 利
142	93	荷 兰
120	69	比 利 时
286	228	其它大陆国
1,503	813	欧洲(英俄除外)合计
1,032	412	英 国
68	13	苏 联
总数 2,603	1,233	

(Monthly Summary of Foreign Commerce of U. S.
Wash, Dec, 1925, pp. 78)



美国迄今尚未正式承认苏联政府。英国虽在三年前曾一度承认，现在又预备和它断绝邦交。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不但不曾承认苏联，且都和波兰订立防备苏联的条约。波兰介于俄德间，不联俄德自然就要对英国亲善。意大利因为法西斯政治的关系亦决不肯去联苏联。惟有英日同盟解除以后的日本，处于英美和苏联对抗的局势下，实为两方所愿依重的。日本政府必定要双方应酬，一面与苏联交涉满蒙问题；一面与英美交涉山东问题。它此时对付英俄很象从前意大利对付英德，可以坐收渔人之利。果然如是，则日本四年前失诸大地震的 10,156,051,000 日币的财产或将乘机取偿于中国。中国能否不受帝国主义者欺侮，能否拒绝帝国主义压迫，能否运用国际新局面力图振作，更是世界的大问题。这个大问题有了解决希望，到时国际局面又要焕然一新了。

摘自《国际新局面》北新书局，1927年8月上海再版。



日本在中国南端省份的渗入

南 进

日本的扩张力量渗入中国南端省份悄悄地进行着，虽无日本势力侵入整个华北和东北明火执仗的声势，但现在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阶段。有关日本国民权益问题和中国当局征收各种捐税问题的争端事件不时爆发，如最近在厦门、汕头及北海发生的事端均非孤立的现象。他如有关邻近的日属台湾岛及东南亚各国的活动也并非无一定目标的。凡此种综合观之均暗示日本已在发动旨在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扩张其势力于日本帝国之南的整个各区域。

所谓“南进”的目标迄今尚不如在华北的动向明确。但过去几年中的事件，尤其是今年年初日本发生内部骚乱以来，颇使人有理由作出结论，即日本的北向和南向扩张正得到几乎相等的重视。满州国的发展未能如当初策划者鼓吹循此方向扩张所预期的那样顺利（见《远东研究》，1935年11月20日，182—186页，1935年12月18日，198—205页；1936年3月12日，51—58页）。为了抵销这项失策并为满足日本国内某些人长久以来感觉日本作为强国的国运要求广泛得多的扩张宏图，已采取多种步骤一方面将华北纳入日本的轨道，另方面向南伸展其经济和政治势力。

在这里我们不需研究所谓“南方”究竟含义为何。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包括整个马来半岛，荷属印度，菲律宾，新几内亚，



和梭罗门群岛——这广袤的热带地区生产的麻约占世界产量的94%、橡胶约占85%，除拥有大量的食糖、锡、茶叶和烟草外，还拥有巨大的原油和铁的储备。这种原料资源，加上满州国生产的小麦、纤维、煤炭、羊毛和华北的棉，将使日本从自给自足和掌握自然资源的观点来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对中国的威胁

不论所谓“南进”究含何义，至少日本在目前的主要表现是在中国南端省份进行活动。而就中国本身来说，这类活动将给它的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终极目的不外于征服或瓜分这个国家。来自北方的冲刺之外，再加上在南方获得立足地的企图——以福建省作为渗入点，以邻近的台湾省作为行动基地。

更具体地说，日本渗入——从这个词的广义来说——中国的东南部分的行动表现在以下各方面：（一）将台湾发展为行动基地；（二）在福建利用治外法权获得土地，保护罪恶行为，伸张日本的警察系统，进行高利盘剥；（三）最近计划从日本和台湾向福建和广东移民十万人；（四）图谋获取有特殊战略价值的中国领土；（五）为攫取福建和广西矿产资源控制权的部署；（六）沿东南海岸线增进航运权益的活动越加频繁；（七）扩大有组织 and 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以及（八）对自治运动的利用。前四种表现可列为主要是政治性的活动；后三种是经济性的；而最后一种则是为巩固前七种渗入作法所获致或可希冀的成果。

基地台湾

发展台湾成为在大陆上进行活动的基地之事已载早先一期



的《远东研究》（1935年12月4日，第195页）。早在1935年9月据悉台湾十年发展计划的三个目标之一已被直率地宣称为“协助发展日本在华南和南海利益的政策”。从那时起发展为迅速。最近的报导指出，整个岛屿正在迅速军事化，或至少是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军事方面。除已有现代化的公路系统外，又在建造双轨铁道，密集的能容纳整个空军中队的飞机场，和在岛的南端的新港。台湾将配备一支25,000人的防卫部队和日本第二、第三舰队联合组成的海军力量。目前该岛的经济和军事中心正由北部移向南端。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几周以前小林海军大将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同时此岛的首脑级别已提升到与朝鲜总督和派驻满州国的大使相等。据官方解释这次升格是为了促进集权并使殖民当局在此岛的经济方面行使更广泛的权力的一个必要措施。但日本国内的报界和许多著名作者的解释都说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使南向扩张运动与入侵北方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后这一总督职位必将由一位海军大将来充任自不待言了。

利用治外法权作为间接而极重要的渗入手段，已在中国东北三省作出明确的先例。日本目前正在满州国放弃一些治外法权。但是1931年以前在中国东北的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曾使用这种特权作各种活动。时至今日，台湾人正以官方或半官方形式被遣往大陆，并在那里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和所谓“保护”。

双 重 国 籍

在厦门一地有不下15,500名中国籍居民由于他们曾在台湾居住过一个时期从而成为日本的国民。按照中国法律，他们仍被认作是中国公民，因而有权在福建租赁和拥有土地。日方辩称这些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即华籍台湾人，继续享有治



外法权却又不受中国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的法律拘束。此外，他们还享受日本领事警察的保护，这类警察经常在厦门和汕头越出租界边线活动，表面的借口是在协助中国警察维持秩序。

最近几个月来，特别引起了人们关注的是，据报导日本人和台湾人在厦门经营的咖啡馆、舞厅和典当日益增多。如果说治外法权问题对双重国籍居民是个难点，那么对于单国籍人——即作为日本国民的台湾人，更为困难。极为明显的证据表明治外法权是为了保护妓院、赌场和淫猥表演等的经营者。

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引述一个由负责的中国和美国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所作慎重调查的结果，调查报告发表于著名的专载在华基督教传教工作的《中国纪事报》3月号。报告说“在台湾人中有许多体面的守法公民，他们经营顺利和中国邻居的关系极为融洽。但是前几年在福州和厦门愈演愈烈的骚乱，则来自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类型的台湾人和日本国民，他们都生活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从事烟馆、赌窟和妓院等非法营业。在有些事件中，涉及的是中国人归化入日籍的日本公民，在较多的情况下，店员是中国人；但绝大部分掌权和有势的是台湾人。”

罪恶经营的扩展

本年初同一来源的报告说，在福建的两个最大城市福州和厦门中，日本人和台湾人拥有或控制的鸦片烟馆有642家。最近本人又从报告的作者处获悉这数字已增加到782家。该委员会掌握了全部的事实——包括地址、营业种类、日籍或台湾籍老板或经理的姓名等——不但包括上述782家烟馆，而且还有近100家的赌场和众多的妓院和当铺。在省会福州，烟馆的数字与厦门相同，只是日籍和台湾籍的妓女要多得多。

引述这些事实不单单是为了进行改革。目的在于指出这巨



大规模的有组织和受保护的罪恶活动的存在，它完全无视中国警察的管辖权。这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这些不法分子自然喜欢这种可以得到保护，和积极的实质支持以及制造各种“事件”的状况。他们被利用和所起的这类作用在远东肯定不乏先例。

同一组织的调查者还在《中国纪事报》中透露日本警察扩展管辖范围的作法，这和美国闻名的“保护勒索”的某些方面颇有相似之处。若干中国企业，例如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被迫雇用日本警察或台湾管事人。被迫雇用的原因在于只有这些当局才能防止日人或台湾人偷电、偷水或偷窃任何其他财产，不论是为他们自己或为中国犯罪分子偷窃。这种事态不仅表明外国统治权的扩展，而且还招致执法的无能，这方面目前即使没有外来的威胁，也已经软弱无力了。

保护下的重利盘剥

还需要提及另一种形式的治外法权特权的滥用，这是因为它的规模之广也已成为一种渗入的形式。日人和台湾人都在重利盘剥上大发横财，这见于福建省，特别是在福州和厦门。重利盘剥制度在中国的为害已在本刊早先一期上有所叙述（1936年3月25日，第63—68页）。日人和台湾人经营的当铺——在厦门一地约有200家——为害更烈。这些资本约一千银元的当铺均在当地的日领馆登记备案。日领馆庇护下的这些当铺可以自由收购赃物和形形色色的劫掠物。这些物品的原主在费了很大的周章查明其下落后只能在拍卖时买回原物，而当铺则从中取得了暴利。

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这些日本和台湾质当铺规定的月息约为20%，赎期常以两个月为限，它们能以如此苛刻的条件



经营获利——面临着月息仅7—8%并以较高贷额收进质物的中国当铺的竞争——就极能证明它们收进的质物性质了。凡这类当铺所到之处，犯罪行为就上升。

不法借贷行

日本人和台湾人还在经营着一种发达的贷款业务。在厦门一地他们拥有60家以上这种收取日息的所谓借贷行。规定的手续颇耐人寻味。借贷人必须具备三个相互联保的保证人。每次借款均明确规定日息，并在贷款中预扣全部应付利息。借款人逐天还本。短付一天就要承担规定的罚款，缺付罚款，罚上加罚。规定偿付期届满时，全部贷款必须清偿，否则加算利息。

试举例说明如下，言明贷款十元，息额一元五角，贷款人实得八元五角。借期订为四十天，每天还款二角五分。如贷款人不能在四天内偿付一元，罚款十元。罚款就加在贷款额上，另按新率起息。

当然，就中国法律而言，这种超高利贷是非法的。事实上其非法性使得大多数从事经营的中国行家不得不倒闭，或仅能苟全。而日本和台湾的借贷行则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可得到日本警察的协助使贷款契约均能履行。

殖 民

另一种较上述各类行径更为直接的渗入方法就是断然的殖民措施。这对以城市为居民点来说还不是不可少的，因为治外法权存在的本身就足以吸引有创业精神的国民。现在台湾已集资5,000万日元成立一家拓殖会社。这组织在10月10日开业，它



宣布的目标包括调查、投资、建设和殖民。这家新会社除在福建和广东建立农业和渔业的新企业外，还计划在五年内从日本和台湾移民10万人至东南海岸。这一行动在某些方面显然配合了近年来可看出的总动向，即鼓励朝鲜人移民满州国，日本人移民朝鲜。它与北方的渗入也有联系，据报告这开发华南资源的台湾公司要求和日本南满铁路最近为开发华北资源而成立的黄中公司通力合作。

在福建的两个沿海战略区，厦门和平潭，日本已在各种租赁的名义下获得大片土地，目前似乎还在全力以赴谋求完全占有汕头以东位于广东与福建之间枢纽地带的南澳岛。在过去一年中，日本的特务人员积极在资金上协助约7,000名破产渔民和农民移住台湾从事矿业和农业劳动。与此对应的是，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的台湾人则被鼓励移居南澳。这种居民的交换似乎不可能以经济理由作为解释。

日本对铁矿的需求

在另一显然不同的领域里，日本的活动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所已知，近几年来日本大部分活动的幕后动机为占有原材料的来源（见《远东研究》，1935年2月13日，第17—21页及1936年1月15日，第9—14页）。其中尤以铁矿为最重要，日本、朝鲜和南满铁矿年总产量最多为170万吨；从中国的安徽和湖北，加上马来群岛各国和菲律宾的年进口量至多为190万吨。而日本生铁工业的冶炼能力已接近300万吨，为冶炼300万吨生铁，至少需要540万吨中级矿石。这就意味着有必要经营在某些地区再找到额外的180万吨矿砂。而战时需要很可能提高到350万吨

这种形势的另一因素在于日本企图保留它国内较少的铁矿



资源，据公认如充分开采将在数年内告罄。事实上减少日本国内矿产量而增加劳动力价格较低廉的殖民地区的产量可从最近十五年的统计资料得到佐证。1928年在日本可供开采的74座矿井中，有62座处于保留状态。受到影响的钢铁企业得到了补助金和免税进口铁砂的配额。保留矿源和增获矿砂以应日益增长需求的努力可从中国南京出版的《矿业周刊》才发表的数字得到说明。这家周刊仅说湖北大冶铁矿于1935—1936年对日输出了60万吨铁砂。这个数额接近经常出口额的两倍。而且为了在下一年提供70万吨铁砂正在议订新合同。

安溪的潜力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日本正对福建省安溪矿山的潜力所表现的兴趣。去年春福建省建设厅请求日本驻福州总领事馆推荐日籍工程师和专家参加对安溪矿的实地总勘察。去冬组织实地勘察就绪后，人员中有18名日籍专家和几名日籍助理员，大多数来自南满铁道会社。勘探工作分为四个部分：钻探、矿坑测察、铁道规划和港口研究。后者的任务是寻求或建议铺设铁路，以便将矿砂运到海岸并勘定开港地点以利运输。发展水力供开矿用电的可能性亦经研究。

全部工作尚未告竣，但若干初步勘察结果已经发表。据查明安溪地区的总储藏量至少达4,800万吨，矿质极佳。湖北和安徽矿的铁含量为50%，而安溪矿的铁含量为67%。安溪产品中仅有3%的镁含量，而硫含量少于1%。据估算开矿和将矿石运到海岸约需华币3,000万元。一些省政府高级官员已表示由于福建生产的炼钢用煤质量低下和数量不足，矿砂准备售与日本工厂，售价约华币10元一吨，包括矿税1元。



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日本谋求从中国获得尽多的矿石以补国内储量的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矿藏量本不充裕，一旦实施长期和健全的工业化规划时，这些也是急需之资源，岂可弃舍。将来日本如在经济控制之外加上政治控制，事态将更为严重。尤有甚者，福建省政府在整个开发计划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当局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以防止为反对日本介入安溪开发而起骚动和示威游行，并对参加工作的日籍专家予以保护。为此已派出省保安队的整个第五团护送勘测队，并向公众说明开发规划的“真实目的”。

同时日本拟还着眼于在广西获取新的矿源。最近来自远东的报导称住友银公司已经决定投资1,500万日元于广西的采矿业。今年初有一名谢大江的台湾人受托与省当局谈判在该省开设一家中日合资公司开采铁、锡和镁矿。该省还和大连和天津设立办事处的黄中公司进行磋商与合作。甚至现已宣布要在台湾设立一个广西矿业公司的分支机构，因为正如福建一样，预计本地出产的原矿将运往台湾冶炼。

航运竞争

渗入的迹象也见于日本图谋对东南沿海的航运取得更大的控制。日船的运费率使日本、英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航运业间的竞争更形激烈。据悉大阪公司正在考虑大幅度降低货运水脚，使之仅达中国轮船航运公司运费之半。大阪公司已派出代表和华商谈判订立三年或五年为期的货运合同。这家公司已从汉口、芜湖调拨来两艘轮船到厦门和汕头承担货运，其目的在于



揽去较多的货运量，年度货物值至少可达1亿元（中国银元）。

应更指出，在航运上特别难以区分普通的商业策略和政治性渗入。在通常情况下日本夺取中国东南部的航运可以仅看作是商业经营。但是如与指向同一目标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看，则额外的企图又昭然若揭。这些其他因素有的已在上文概述。另一正在引起极大关注的伎俩为北方的走私活动（见《远东研究》1936年5月25日，第110—111页；1936年6月3日，第115—122页；和本期，第238—239页）

大规模进行走私

华南的走私活动并不局限于某一港口，但汕头是公认的走私中心。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可以看到两种走私方法。首先是由日本人、台湾人和一些华人严密组成的大规模的走私公司。走私项目常是食糖、火油、水泥、火柴和海味等高税商品。使用的运输工具是汽艇、帆船和渔船。第二种方法是利用个人经营的正规运输渠道，多为个人经营。通过海员和旅客带进中国口岸大量的布匹和各类杂货。几个星期以前英商《字林西报》的一位通讯员报导：“每当一艘从新加坡满载中国归侨的船到厦门之际，中国警宪和关员执行职务时威风凛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而当一小小的台湾船到来时，他们却噤若寒蝉，奉命唯谨”。

汕头之所以在走私活动中处于关键位置是由于它是人口极为稠密的汉江流域地区的门户，这地区为走私物品提供了良好的市场。这里的活动基地正是附近的南澳岛，前已提及此岛有可能用作海军基地。人所共知岛上以及大陆附近地区的穷苦农民、渔民多收容日籍或台湾籍的“女婿”入赘，按月收取这些“亲戚”交付的酬金。



对物价的打击

遗憾的是大规模走私对中国的金融和工业的危害，其程度如何尚乏统计数字，即就汕头一地而言也无可靠的数据。但可以通过每担18—22元（中国元）的非走私食糖价与每担10—12元的走私食糖价以及每箱42元的上海制火柴价与每箱约21元的走私火柴价的比较看出走私之害。五月间广东糖厂的半数已关门大吉，而在目前事实上已全部停业。

走私也波及货物的输出。出口征税的食盐和大米从广东和福建经由广州湾和厦门走私外运。由于大米走私严重福州的米价去夏从华币8元上升到12元。内地若干地区的食粮价格也同样上升。

“自治运动”

正如在北方走私以及其他各种的直接和间接渗入方法均伴随着所谓自治运动，目前在南方的几种活动也将采用类似的运动加以巩固。早于1915年日本即在著名的二十一条之一中提出将福建省划入其势力范围。今天看来将通过“自治运动”的新手段来达到这同一结果。近日中国报纸报导臭名昭著的高义已接受日本的财政援助以便在闽南组织所谓自治运动促进会。著名的日本泛亚主义倡导者松井将军途经福建去两广时“受到了高义的盛宴接待”。

据悉在厦门和鼓浪屿有另一秘密结社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定名为“福建自治委员会”的这个结社派遣了很多特务去内地鼓动自治。这些特务在漳州和泉州尤为活跃。不久前曾有数名匪首在平和地区办起了“自治军”，当其中一人林振群为中国



政府军所逮捕时，日本总领事要求中国当局将他释放。在滨海另一名为新化的地区，又一匪首江天泽正在组织一支“忠义救国军”。所有这些都与日本在北方进行的各种活动何其相似！

终极目标何在

这里特再重申，很多上述的活动是可以解释为正常的经营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但是将这多方面的经济活动联系到其他具有突出政治性的活动，并和华北的类似行动和最近整个的中日关系史合起来看，其政治倾向是昭然若揭的。在正常情况下，日本与中国之间发展较密切的经济联系无疑对两国都有利，但是凭我们所了解的这些阴暗事件，就不可能将眼下发生的事称之为自愿合作和互利活动了。恰恰相反，日本目前在南方的所作所为正如它在华北的活动一样，将给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论日本决策人士心中如何打算，通过南北并进而使整个中国置于公开或隐蔽的日本统治下，也不论将华南看作是日本势力扩张到整个东南亚的基地，这在决定未来局势发展的重要性上，无疑是不及日本扩张主义内部的强制力量以及必然引起的巨大的反对势力。

原载美国《远东研究》第5卷第22期（1936年11月4日）。

卫宝琰译 杨小佛校



征服与人口

日本要想走资本主义扩张和征服大陆的道路来解决它的人口问题是行不通的。今天，许多外国观察家也这样认为。在第三期的《太平洋事务》杂志上，弗丽达·厄特力在《人口与征服》一文中即持这种观点。她强调说：“日本农村中的封建残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主要障碍。”虽然她在文章末尾还强调：“必须指出日本的现行政策只能是使人口问题加重而不是使之改善”，并且她也对人口问题未得到改善的方面作了详细论述，但她却没有论述使之加重的一面。这种加重其实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如果征服造成人口问题进一步恶化，那么这就意味着近年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没消除农村中的前资本主义关系，而是在维护，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这种关系。

不能忘怀的是，日本的生活水平在世界大战期间乃至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大恐慌中一直是上升的，而在满州事变之后就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因此，人们不能把现时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困难都归之于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导致了满州事变，导致了最近的征服大陆政策。危机对日本的小商人和工厂主无疑是一场浩劫。至于对构成日本本土人口略过半数以上的农民，它的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

满州事件之后，日本开始了在亚洲大陆的冒险。这种冒险刺激了日本的出口工业，特别是那些为满州提供建筑材料和机器的工业。这与日本在南海的贸易扩张结合在一起，使日本的商



业出现了一时的繁荣。但我们亦可明显看出，旨在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征服大陆政策不仅没有解决旧有的矛盾，而且还造成了新的矛盾：那些老的工业和商业利益同1931年后新产生的工业和商业利益的冲突加重了城乡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

新产生的工业和商业利益的核心是生产军需品和军队的企业。在政府预算的直接支持下，在财力雄厚的军火工业基础上产生了强有力的新财阀。当然老财阀中的许多人在这些企业中也有一定的利益。去年的日本预算创了记录，而目前的预算又超过了这个记录的1/3。几达50%的预算被拨给了陆军和海军，其中大半则被用来购买军火和军需品。32%的陆军预算被用于满州。据研究日本财阀史的权威M·铃木说：“陆海军在1935年花了4.1亿日元从私人企业那里购买军火和军需品。花了2,150万日元来购买稻米、小麦和其它食物”^①。

由于推行征服政策和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不平衡发展，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就造成了尖锐的冲突。冲突一方是军火资本家集团，以及与它们联结在一起的银行家、投资军火业的大地主、为军火业采办原料的大多数进口商；另一方是轻工业资本家集团^②。主要是那些纺织业主、银行家和大部分的地主和出口商。不消说，在冲突中陆军是站在前者那一边的^③。他们认为如取消一半军费和海军预算，一系列的工业就将崩溃，所以那些利益相关者因此就满有理由地认为军备工业是维持日本繁荣的主要因素。

诸如1936年2月的军事政变，以及一年后广田内阁的垮台之类的事件是必然对日本全国产生影响的，这些已不需要详述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对日本人口问题的研究，来看一看整个征服政策的结果。征税数额或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1930年，每个家庭缴纳给国家和地方的平均税额是99.9日元。但到1935年即增加到114.4日元。如果我们以五口之家来



计算，那么在五年之中每人所缴税额就由20日元增加到23日元（即增加了15%）。尽管如此，这个税额还只是整个负担的一部分。直至现在，政府筹集资金主要还是靠发行公债。据1933年日本帝国农业协会的调查，资本家的平均缴税额是他们总收入的17%，商人是14%，自耕农是25%，地主是54%。因为大部分工厂主和商人居于城市，而乡村中的地主则能把赋税通过地租的形式转嫁到佃户身上。因此不难想象，横征暴敛在农村必定导致极大的贫困。这对550万佃农家庭无疑是致命一击。

在过去几年中，尽管地租增加了，但佃户数量的增加也成为一种趋势。当然，佃户增加的本身便是地租增加的根本原因。自耕农数量的上升是种暂时现象。就象1925年曾经出现拥有67,390町^④的154,899户家庭时那样。这种上升是通过支出总额达1.25亿日元的政府政策而成为可能的。

在1936年12月的《国民公论》杂志上，研究日本农业问题的著名学者T·猪俣列举了佃户的变化情况。他写道，从1922年到1929年，佃户减少了67,000户，但从1929年到1935年间增加了40,000户，同时许多人被迫变成了雇工。他还指出，从1929年到1935年，自耕农减少了5,000户。

如果我们把1914年到1920年的六年同1929年到1935年的六年相比，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的迁徙前后显有不同。在前六年，人口流向城市和工厂，但到后六年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在资本主义扩张的上升阶段，工厂工人数目增长非常快，从1914年到1920年增加了64%^⑤。S·渡边曾调查了19,571家工厂，结果发现在1914到1917的三年内，有450,000新工人进厂，其中176,000人（39.1%）直接来自农民，其余很大一部分最初也是从农村来的，只是他们有过一段其他就业或失业的间歇时期^⑥。在同一时期，大量农民进入探矿和运输业，流向北海道和海外。农民涌进广岛、冈山、福冈、爱知县、兵库县、大阪等地区的城



镇中，但由于日本农业经济被封建残余所束缚，所以上述地区的耕地并没有增加。唯一的例外是在大阪这个大城市的郊区，在那里由于人口增长带来需求量的增加，使蔬菜农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⑦。

这几年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工人重新回到土地上去的倾向值得注意。根据日本内务省社会局的统计，1927年后，工人在50个或50个以上的工厂年平均解雇工人数是600,000，被解雇的工人中至少有200,000人径直回到农村。由于战争景气，回乡运动在1931年暂时停止了，若非经过1934年这一场农业危机，回乡运动必然更为激烈。此后一年之内，单矿工就有20,000多人回到了农村。

经济国家主义的总政策大大加重了对大陆采矿业的剥削。在国内，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计划相结合的是它剧烈地减少了矿工数量。合理化也在其它工业中提高了产量，但同时也相对地减少了工人人数。名古屋商学院的美浓口教授算出：1920年到1931年日本矿工减少了54%，同时采矿业生产率提高了1%，工厂工人数增长了7%，同时生产率提高了68%。在这十年间，工厂里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57.6%，矿工则提高了119.9%。这种合理化当然也就减少了就业，加速了回乡运动。

失业并非仅仅是城市中的问题，它也在农村中带来一系列问题。在丝乡长野县，1933年11月有32,800失业者，其中22,000人以上是原先的农业工人，6,000人是原先的雇拥工人^⑧。此外，农村中工资也急剧下降。据东京农林省对12个府县的官方调查，1934年的农业工资标准如下：（以1921—1933年的平均数为100）：

	长工	季节工	日工
男	59	60	53
女	52	58	54



十年之内农业工资下降高达 40—48 %。在 1929—1935 年间，工厂的工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都跟着下降了。

在商业恐慌和农业危机的冲击下，人口涌回农村，这就必定造成地租竞争更加激烈的局面。租佃争端成了家常便饭。据官方统计，1920年这种争端仅408起，到1930年就更增加到2,478起，1935年到5,512起，1936年仅上半年就有了3,704起。对比之下，1925年仅7.8%的争端涉及租佃权，也没有涉及地租。但在1936年就有66.8%的争端涉及租佃权。大多数租佃争端发生在本土东北部的东方区，1935年宫城发生了258起争端，其中85%是租佃争端，1936年的上半年发生了288起，其中租佃争端则高达92%。

在1914到1920年农民向城市迁徙时期，农民们经常是突然离地出走，从而毁了租约引起了争端。但近来又争端蜂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主收回土地以更高的地租出租给新的佃户。在许多情况下，中小地主愿意自己耕地来应付不断上升的赋税。为了解决欠下的租款他们就往往收回田地自耕或把土地卖掉。新地主把土地买到手后，就置身于可以收取更多地租的位置上了，这些都使租佃争端大量增加。

以上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强化了日本农业经济中的前资本主义关系。观察表明，日本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虽然从1924—1933的十年中农业雇佣工人数量增加了29%⁽⁹⁾，但他们还没有在农业人口中占大的比重。从那时起，许多农业工人如同长野县的工人那样失业了。农村失业者的增加原因有两种。一般讲，不是由于生产品种起了变化，就象静男木的绿茶换成了红茶，就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更，如同养蚕场近来引进电孵箱和电扇之后出现的变化那样。据钦崇飞田调查，1920年到1935年，农户增加了37,500户，而实际上耕地却降低了89,000町。



当今日本的 560 万户农户中，或许不超过 3 万户是在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虽然稻米是日本最主要的农产品，但在这个数字中种植稻米的农户也极为稀少。今天，由于赋税的压力和价格的控制，即使富裕农民的前途也是暗淡的。从 1913 年到 1936 年，粮食价格只翻了一番，而工业品的价格则增加了 3.5 倍。农林省对 334 户富农和中农的调查表明：这些富农每户的收入从 1929 年的 1,150 日元下降到 1933 年的 726 日元。更重要的是尽管食物的价格一度下降，但预算中食物一项已从 1929 年的 40% 上升到 1933 年的 44%。

资本主义危机使得日本的生活水平明显地下降，而巨额的非生产性的军费开支，不断上涨的赋税重负，以及可能导致新危机的通货膨胀的趋势，这又使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因此旨在摆脱危机恶果的军费扩张事实上恰恰加剧了这种危机。如果说日本确实存在人口问题，那么征服政策只不过是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而已。

注：

- ① 参看：《国民公论》，东京，1936年8月号第82页。
- ② 在1929—1932年间，日本轻重工业的发展速率大致是相同的。但以后轻工业发展速度就非常缓慢了。研究当代政治问题的著名日本学者H·山川指出，林銑内閣的主要任务应是恢复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之间的平衡（见《民国公论》1937年3月号，第136页）。
- ③ 海军并不积极支持前者，因为它自己拥有的工厂要比陆军多。另外，它也不象陆军那样经常对新军火工业中的小私有企业发命令。总之，由于日本对其它海上强国的关系，海军侵略性较少。
- ④ 1町等于2.45英亩。
- ⑤ 参见A·木下在《日本评论》1937年2月号中的文章，东京版，第136页。
- ⑥ 参见：《日本农业的未来》，农业研究会编，东京1921年版，第157—160页。
- ⑦ 参见：《租佃争端研究》，农林省农业局编，东京1922年版。



- ⑧ 参见A·木下在《日本评论》1937年2月号中的文章，东京版，第147页。
- ⑨ 参见Y·石桥为帝国农业协会所作的调查。东京出版。

原载《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1937年第2期。

丁利刚译 杨小佛校



美国垄断资本 (摘录)

第二章 大鱼吃小鱼

美国最初的领土北起圣劳伦斯河流域，南至佛罗里达半岛，原来是面对欧洲的大西洋海岸上的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者于十七世纪初年开始到此。荷兰、瑞典、德国、法国等地的移民虽然也有大批来的，但至十八世纪中叶这地区 150 万人中间大多数还是讲英语和保持着英国习惯的英国人。这些殖民地的人民为了反抗英国的重重剥削和压迫而于 1776 年宣布独立。美国革命推翻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又把美国的资产阶级送上宝座。后者就成为新的统治者。这就说明了美国革命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是片面性的。革命后劳动人民被剥夺了胜利的果实，仍然是被剥削的阶级。斯大林曾经指出：“在各国人民史上有过不少的革命。它们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是些片面性的革命。对劳动者剥削形式是新陈代谢了，但剥削制本身仍然存在。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陈代谢了，但剥削者和压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才抱定了消灭任何剥削制，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目的。”^①

美国原有十三州于 1781 年解散了独立战争时代的大陆会议，而组织一个较为健全的邦联政府。当时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有向外扩张的倾向。邦联政府与英、荷、法和西班牙各国都推进了贸易，又与瑞典及普鲁士订立互惠条约。美国船只也已开始驶往广州和加尔各答去开辟更远的市场。但美国资产



阶级还嫌邦联政府不能充分保障他们的利益，因此在1787年召集宪法会议，制定了实施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劳动人民的联邦宪法，以联邦政府替代了邦联政府。制宪会议由代表55人组成，其中有金融家24人、奴隶主15人、船主11人。

他们的领袖韩密尔顿认为：社会之有阶级的分野是必然的道理；每一个社会都存有两大集团，一个是少数富有者的统治集团，另一个是被统治的贫贱者的集团。政府应当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这样，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忠贞的统治阶级，用全力来拥护和巩固联邦政府。在韩密尔顿看来，英国的典型阶级社会是理想的制度。他相信英国的社会制度是永恒不变的。他不独主张立建阶级严明的社会秩序，并且憎恨人民、鄙视人民达到极点。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使富者更趋富裕，并曾说：“人民！人民是野兽。”在韩密尔顿指挥下的“联邦党人”早就盘踞要津，掌握国家的财富和权势。到了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他们更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联邦宪法所具有的形式上的民主，无非是用来掩饰这一种专政罢了。这就是说，北美洲殖民地人民为要脱离英国而进行独立战争的革命时期，到联邦宪法制定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便告终结了。

当时充分地发挥韩密尔顿所倡导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人们中，最显著的有摩理斯、韦伯斯特和渥金斯·雷三人。在制宪会议中摩理斯曾说：“生存和自由普通被说成比财产更有价值。但关于这件事的正确看法证明，财产是社会的主要目的。”韦伯斯特在北方麻萨诸塞州宪法讨论会上宣称：“权力属于财产，那是自然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渥金斯·雷在南方弗吉尼亚州宪法讨论会上更说得透彻：“权力和财产暂时可能被强暴或诡计所阻隔，但永久分离是不可能的。因为感觉到阻隔的痛苦的时候，不是财产购买了权力便是权力夺取了财产。自由的政府无论如何不可能继续存在了。”是的，资产阶级专政已篡夺



了自由的政府。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美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就很快地向前迈进了。

美国工业的过程是怎样呢？住在8,000人或8,000人以上的小镇的人数，在1820年仅占全国人口1/20，到了1840年就占全国人口1/12。这二十年间农场上的雇农只增加79%，而制造业中就业人员竟增加127%。在这过程中资本家固然早已组织了他们的协会，各州的立法院也订立了公司登记法。开始是银行变为公司的组织。后来保险和国内运输等企业也变为公司。各制造业最后也变为公司的组织。公司就成全国普遍的经济机构。同时个人的道德和行为也愈来愈和公司的道德和行为隔离了。公司是完全可以不讲道德的。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美国的俗谚说得好：“公司是什么呢？公司既无肉体可以蹴踢，也无灵魂可以指摘。”

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上的美国北部工业资本势力，和建立在奴隶劳动制度上的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是根本不相同的。这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引起了1861年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经过战争烈火而牺牲惨重的南部各州在战后必须重新建设。而在这“重建”关头，南部新创的“黑白混合”的民主政府又完全被北部银行和工业资本的势力所铲除。表面上奴隶制虽被推翻，但以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变相的农奴制依然存在。南部各州就成为北部工业资本的原料产地和成品的销售市场。因此南部一般人民所遭遇的不亚于一般殖民地人民所遭遇的。美国西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原来美国东北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了大批饥寒交迫的出外求生的人群。这群人早已成为西向开拓边疆以至太平洋海岸的洪流。南北战争后，美国领土更不断地扩张，终于有四十八州的版图。美国资本主义因为获得了广阔的活动范围，更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自1859年至1899年的四十年间，美国工厂



数量增加3倍，产业工人增加4倍，工业生产总值增加7倍，而工业总投资增加9倍。工业生产总值在1890年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到1900年就倍于农业生产总值。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还远不及英、法、德三国。但战后三十年间英、德、法的工业生产都没有能以倍数增加，独美国增加了几倍至5倍。因此，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的阶段时，它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远超过英、德、法三国了。

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写给魏德迈尔的信中曾说过，美国唯一重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卡莱曾经攻击过李嘉图、马尔萨斯和欧洲其他资产阶级学者，正反映了当时美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展开阶级斗争的强烈意识，也证实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还是相当幼稚的。但二十七年以后，在他1879年4月10日写信给坦尼尔逊（俄国经济学者，曾将“资本论”译成俄文）时，马克思就特别提到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已超过了英国。他于1881年6月20日写信给左格（美国的“第一国际”领袖）时，也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人阶级相应的被奴役已比在任何国家有更迅速而无情的发展”。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于1886年1月29日写信给左格说：“资本主义凭借着一跨就是二十一哩的长筒靴在美国进行集中，这和欧洲的情况不能相比。”

就在那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为争取实行工作、教育、休息各八小时的三八制而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游行。仅芝加哥一市，那天参加的人就有21万以上。这是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的阶段时，美国工人阶级首次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三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在巴黎议决，以每年5月1日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国际劳动节。从此“五一”便成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一支火炬。在那年6月3日恩格斯写信给费希尼韦茨基夫人（美国社会主义者，曾译恩格斯著作）。信中大意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地变为他们的涤罪所，至于什么



时候才能变为他们的地狱，要看美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而决定，无产阶级力量的出现确是一件非凡的事。半年以前这个力量还无从推测，而今天忽然出现了如此有组织的群众已使整个资产阶级恐怖起来，可惜马克思逝世而没有看见这事。

正当美国垄断资本开始成长的时候，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了。列宁是研究和分析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人。根据他的定义，帝国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这种垄断表现在托拉斯、辛迪加和势力庞大的银行，表现在对原料资源的掠夺与收买，表现在对外输出资本。他说：“问题的中心在于经济垄断。”1952年2月斯大林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时，更肯定地指出这经济垄断的特征和要求。斯大林说：“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②他并归纳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说：垄断资本“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③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曾有四个阶段。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直到1880年是萌芽时期。截至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三十余年可称成长时期。1919年至1940年是壮大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进入专横狂暴（实际上是垂死前挣扎）的时期了。

阻挠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南部的奴隶制度被战争消灭以后，400万黑奴成为农场雇佣劳动者，因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在战争中发过大财的金融巨头、厂主、奸商等迅速地促使资本集中起来。垄断资本就有了萌芽。马克



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里早已指出当时的情况：“南北美战争的结果，大的国债产生了，税的压迫加甚了，最平凡的金融贵族被造出了；极大部分的公共土地，被滥送给建设铁道开采矿山等等的投机家公司了——简单说，有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这个大共和国，也已经不是迁出的劳动者的天国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也已在那里，以巨大的速力向前进展了。”④

南北战争后最初十年间，在相互竞争的厂矿企业家中往往有几家自动地订立协定，或决定共同遵守的市价，或决定共同限制的产量。当时在盐和无烟煤两个行业中，这种协定最为普遍。1875年后，比协定更有效的联营组织通行起来了。这个组织当时称为“总汇”，实质上也就是几家公司的联营机构。“总汇”决定了它成员所共同遵守的产量和市价，并在它们中间分割了市场，也分配了红利。当时最著名的有铁道“总汇”、钢轨“总汇”、火药“总汇”、烟草“总汇”等等。铁道“总汇”直到1887年才被克利夫兰政府通过的“州际商务条例”所禁止。但“总汇”的发展代表了垄断资本的萌芽时期。

垄断资本的成长时期中最通行的组织，先有托拉斯，后有持股公司。托拉斯出现时，几家原来互相竞争的公司合组了一个董事会。各公司的股东们都将股票向董事会换取托拉斯证券。如此董事会就统一经营各公司的企业单位，年终时将红利分给托拉斯证券所有者。托拉斯曾一时涌现而盛行，尤其在煤油、烧酒、淀粉、棉籽油、糖、铅等企业。1890年哈利逊政府通过“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垄断资本家为了回避这法案，表面上虽解散了托拉斯，骨子里还照旧进行合营的办法。许多托拉斯就改变为持股公司。持股公司有两种，最初通行的是财产控制公司，后来通行的是证券控制公司。1904年后财产控制公司又占上风了。财产控制公司有三种成立的方式：两家或几家公司的财产合并在一起；这家公司的财产出卖给那家公司；



或这家公司以它的财产换取那家公司的股票。证券控制公司不直接经营任何企业，但因拥有各公司部分的股票而足以操纵各公司的管理权。在十九世纪末年，许多工业、运输、商业等公司的结合曾由托拉斯改变到持股公司。二十世纪初年美国的垄断组织已达380个，他们控制了拥有美国全国工业资本 $\frac{2}{5}$ 的5,300余工厂。其中最大的垄断组织属于钢铁业。

直到1880年，有“进取精神”的美国企业家只是单独和人竞争。1880年以来，有“进取精神”的美国企业家就知道怎样合并起来再和人竞争。迦尼基钢铁公司便是很显著的例子。要炼钢先得有铁、煤、焦煤和石灰石。要运钢先得有铁道和轮船。过去炼钢者从一人取铁，从另一人取煤，从第三人买焦煤，更从第四人采购石灰石。当然四人之中没有一位不要赚钱的。迦尼基了解到这一点，但不愿意分别向他们采购，而愿意只向一人采购。那人就是他自己。因此迦尼基添置了许多产业，有他自己的铁矿、煤田、炼焦炉和石灰石矿山。他的铁矿是明尼苏达州的湖边，他的炼钢厂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因此，生铁须经轮船和铁道运输才能到炼钢厂。迦尼基也明白轮船和铁道所有者要赚他的钱。所以他买进了湖上的轮船和岸上的铁道。

有些矿主、船主、炼焦者和铁道公司不愿出卖产业，宁愿把他们的产业加入迦尼基的公司。迦尼基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进来做股东。从开矿直到轧钢一切都归他独家经营，于是其他公司就占不到什么利润了。因此，经过九百里路程由湖边运到匹兹堡的两磅铁砂，一磅半石灰炼出的焦煤和半磅石灰石，加上从弗吉尼亚运到匹兹堡的少量锰砂，在他公司里炼成一磅钢以后，售价只是1仙，即1%的美元。迦尼基钢铁公司因为经营了整个原料和制造的过程，所以能够廉价售钢。其他须要依靠别家的铁、煤、焦煤和石灰石的钢铁公司决不能办到这样。但迦尼



趣。当他1880年11月5日写信给左格时，他重托这位美国朋友替他收集关于加利福尼亚的经济资料。他说：“如此迅速的资本集中在这里所造成的骚扰和激变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为无情。因此对我说来，加利福尼亚是很重要的。”“骚扰和激变”确是当时美国社会经济最显著的现象。垄断资本的势力漠视而且鄙视国家的法律，它随时随地能够造出为它自己服务的法律。法庭被它贿买，新闻界被它贿买，立法机关也由它掌握。难怪克利夫兰总统在1888年12月3日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有如下一段话：“当我们考察集合资本所做出的成绩时，我们发现了托拉斯、康拜恩和垄断。同时公民就被摔倒在后面，甚至被铁蹄所践踏。应该为人民服务而谨慎地受法律限制的那些公司，反而很快变为人民的控制者。”到了1910年，英国名记者威廉·阿邱在他旅行美国以后还写道：“美国是一群强盗大王横行着的富国，在他们面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机关缺乏维持公安的能力。”

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又有新的发展。工商业更趋向于康拜恩。同业各公司相并而成的康拜恩，就称为横面的康拜恩。一业之中参加部分制造的各公司合并起来，就称为纵面的康拜恩。福特汽车公司即是纵面康拜恩的一个例子，它既经营了汽车每一部分、每一机件制造，又经营了布厂、纸厂、森林、橡胶园等。自1919年至1939年间，美国约有9,500个工矿企业公司被合并了，其中1/3是在1927年至1929年的两年间合并的。又自1919年至1928年，电灯、电话、电车、煤气、自来水公司等4,500余公用企业公司被合并而成为横面康拜恩，大部分属于持股公司。银行和影片公司也同样各自合并，连环的零售商店更大有发展。

垄断资本在康拜恩之间用两种方法操纵了物价。第一是“起点制”。这是沿用1924年以前炼钢业中所用的办法。凡钢



制品不管是在何处造的，其定价都作为是在匹兹堡所造而从匹兹堡所运出的那样计算。价格固然划一了，消费者当然就要吃亏。铜矿、水泥、砂糖等业中定价都采用了这种“起点制”。第二是所谓“价格稳定制”。名为稳定，实即垄断。这个制度规定由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同业公会订立划一的价格。如违反既订价格而敢于廉价批发或零售者，就必须受惩罚。惩罚的方式不一，或从同业公会除名，或不予信贷的方便，或受同业公会在营业上的排挤。

公司既可合并，公司的董事也可以互兼。互兼董事制也是垄断资本家控制许多公司的一法。在120家银行、托拉斯、保险公司、运输公司、土产与贸易公司以及公用事业公司中，摩根财团所支配的就有341名董事。47家大垄断公司中，有72位董事都来自摩根公司。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在37家大公司中就有46位董事。纽约花旗银行在26家大公司中也有32位董事。财富固集中于公司，而公司的财富又集中于少数最大的公司。1933年，各有5,000万美元以上资本的600家最大的公司竟占了美国全国公司资产的一半以上。

1940年罗斯福总统结束了他的所谓“新政”而扩大了军费。一面减缩联邦救济事业和农业救济，一面减轻对富豪所征的税额，且禁止工人罢工。接着美国就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时期，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而被挤倒的中小工商业者不下50万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就踏上了一个更高的阶段。1942年时，美国各制造公司所有资产的49%属于205家。五年以后，200家制造公司就掌握了全国各制造公司所有资产的55%。那时全国约有8万个制造公司，分属于452种工业部门，其中150种工业的垄断情况甚为严重。在这150种工业里，每一业的最大四家公司占其本业生产的50%以上。在其中46种工业里，每一业的最大四家公司占其本业生产的75%。有些工



业整个被数家公司所垄断了。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克雷斯勒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三家就造出全国90%的汽车。又如固特异车胎及橡胶公司，法斯通车胎及橡胶公司、美国橡胶公司和戈特吕区公司四家控制93%的橡胶市场。立俾·欧文斯·福特公司和匹兹堡玻璃板公司两家制造了全国95%的闷光玻璃。美国制鞋机器制造公司一家垄断了本业95%的市场。

制造业以外，垄断情形大致相同。1937年时，美国运输业全部资产的92%属于45家公司。公用事业全部资产的80%属于40家公司。全国银行的信贷和投资27%属于20家最大的银行。全国人寿保险事业全部资产的81%属于17家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1月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据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调查分析后的报告，尽管反托拉斯法案施行了半世纪，对于我们福利最严重的威胁仍然是权力的日益集中于少数巨大组织。在战时这种长期的经济集中的倾向更被加速。因此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空前的现象，整个工业已被一家或数家巨大组织所支配，而这些组织为谋取更高的利润能够限制生产，因而减少就业者且降低购买力。”

最近数年间，美国垄断资本更空前地活跃，资本的集中愈加厉害。1949年有58.7万家银行和企业公司曾向美国政府纳税。其中最大的250家公司，不到总数1/2000，竟拥有全部资产总值的42%。这58.7万家的资产共为4,615亿美元，而其中250家的资产达1,928亿美元。50家最大的金融组织中每家的资产超过5.27亿美元；200家最大的企业组织中每家的资产超过1.25亿美元。这250家组织的董事名额共3,705人，其中1/3就被400人所占据了。1951年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有60家，1952年底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就增至66家。又20家大银行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36%，它们的贷款占全国银行贷款总额的42%。回顾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的百万富豪还不到5家。现在百万



富豪已达数千家，而其中数十家且各有1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垄断资本的势力急剧开始向国外发展，现已驾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上。1949年美国私人在国外的投资已超过英法两国。那年法国的这种投资只合20亿美元，英国的合120亿美元，而美国竟达190亿美元。那年9月18日英国在美国的压迫下将英镑贬值30%。几天以内其他二十二个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实行通货贬值。据联合国秘书处经济事务部最近发表的统计，美国私人在国外的投资在1952年年终已达210亿美元，其中92亿美元是从1946年间开始投放的。换言之，美国私人在国外投资总额的43.8%是在最后七年间投放的。

但以上这些统计都包括了外国企业中美国人所持有的股票。如果除掉外国企业中美国人所持有的股票，而只计算美国各银行和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则美国私人在国外的投资，在1914年仅30亿美元；到1930年亦仅75亿美元；到1943年至1953年的十年间由80亿美元增加到160亿美元。美国援外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在1954年4月美国《外交季刊》论述私人对外投资时曾说，这160亿美元中有60亿美元是到1949年才开始投放的。足见美国垄断资本家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有37%是在最后四年投放的。史塔生又说，1952年内在国外新的美元投资为8.5亿元，而从国外所得利润中再投放于国外的美资为8.76亿美元。由此可推知美国垄断资本所榨取的暴利。由此也可推知美国帝国主义的贪残凶恶。

美国的历史，自从联邦政府替代了邦联政府，自从资产阶级专政压倒了民主政体以来，一直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历史。垄断资本即是帝国主义的根源。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经两次世界大战而愈加猖狂。垄断资本通过各种方式而愈加集中。因此美国有新旧财团的形成。我们分析和了解这些财



团，才能明白美国帝国主义的真相和本质。

注

-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48页。
-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3页。
- ③ 同上书，第34页。
-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7—978页。

摘自《美国垄断资本》，世界知识社，1955年北京版。



杨刚著《美国札记》

再 版 序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应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邀请去讲课。因此1946年春在纽约认识大公报特派驻美记者杨刚同志。她在美国四年之久，所写的札记早于1951年在北京出版。现在郑光迪同志要我为她母亲所写的《美国札记》再版作序言。

读了1951年这本书的第一版以后，深感作者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用生动的笔法刻画了美国社会的真象。第十二章描绘美国农村贫穷的情况同大城市内生活程度的对比明显悬殊。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据1983年1月17日纽约出版的《新闻周刊》的一篇专题报道“现在有三千多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少数民族来说，情况要惨得多。白人之间贫困者只占11%；而拉美人中的贫困者占26.5%；黑人中贫困者竟占到34.2%。”又据《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3日的报道，“美国农民的负债越来越多。1975年，全国农民负债759亿美元，现在已负债1,415亿美元。而且据美国有影响的农业经济学家估计，全国有1/4的农民正濒临破产的边缘。”

美国的失业问题也很严重。据《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2日的报道，美国失业率竟达到10.1%。这是1940年以来美国失业率第一次突破10%。1982年9月份失业人数达到1,130万人。据我所闻由于失业人数的猛烈增加，已经造成美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许多失业者无家可归，只好露宿街头。他们被称为“口



袋人”，因为他们随身仅有的物品只是一个纸口袋。这些人通常在街头、公园长凳上或者在车站的厕所里过夜，靠乞讨度日。

杨刚同志在本书第六章中提到为她打过字的一个美国妇女名叫蓓蒂。她是一个得到硕士学位的美国女子。在她生命的三十年中，她已经丢了好几个男人，都是刚刚有希望结婚的时候男的就跑掉了。现在，过了三十年，由于美国家庭制度逐渐崩溃，家庭里只有一个母亲或一个父亲的情况日益增多，离婚案件和私生子也越来越多。又据香港《大公报》1982年12月12日的报道，这种只有一个母亲或父亲的家庭在美国已增加到660万户，其中35%属于贫困户。这一类家庭本来就穷苦，缺少欢乐，父亲遇到失业的打击，立刻祸及子女。这些儿童的身心受到摧残。还有美国夫妇同时在外工作的人数正在增加，但不少夫妇各自的收入本来都不丰裕，而物价又不断上涨。这些人只看重金钱而不顾子女。长期经济萧条使大量美国人情绪低落，对子女感到厌烦，特别是父亲失业在家，动辄毒打子女，因此子女离家出走事件大大增加，1982年以来这类的儿童已达到180万。他们平均年龄只有15岁，白人占七成，男孩和女孩的比例为4对6，这些尚未成人的女孩不少被迫为娼，一旦堕落，不得翻身。离家儿童的增加已发展成为今天美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书第一章记录史沫特莱的事迹，这位女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就是我所熟悉的友人。她最后离开纽约要来我国时我曾去送行。她的性格刚直不阿，她和杨刚同志一样令人可敬可佩。

陈翰笙

1983年3月22日

载杨刚《美国札记》，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

3月17日午后，北京各种民众团体，因为大沽口炮击事件，遂派代表赴段祺瑞住宅要求政府严重驳覆八国通牒。执政府卫队竟以刺刀拒绝，杀伤代表数人。四川代表团杨伯伦受伤最重，胸肩背各有伤口深寸许。翌日民众在天安门前开大会。会毕整队赴国务院请政府对八国通牒不要让步。国务院前执政府卫队向请愿者突然开枪，当场击毙无辜人民51人，伤百余人。因伤而殁于医院者复10余人。此实中华民国空前的惨案。我亲临其地，适逢其时，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因将当日目击的真相为《现代评论》读者作一简单的报告。

18日早晨报载北京一百八十余团体的公启，要召集国民大会，表示反抗八国通牒，午前十点半钟我赶到天安门时，约有3,000余人环立讲台前面。台上有二条白布。一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一书“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杨伯伦的血衣亦高悬于台前。主席徐谦报告开会意义后，有两三位主席相继演说，有两三位某某团体代表报告昨日与府卫兵冲突的情形。报告毕台上人向众谓警察总督李鸣钟已来函声明愿保护群众。台上复有人报告“府卫兵曾经解除武装，府院防卫由国民军接替”。此时贾德耀的代表潘某登台向众说，“卫兵杀伤代表，总理心极不安，特派鄙人前来道歉”。台下人声嘈杂，对潘表示不满。潘说话不及三分钟即退去。于是大会通过议案六条：（一）电促全国国民一致反抗八国；（二）电请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三）请政府严驳八国最后通牒；



（四）如八国不肯收回通牒即驱逐其公使；（五）督促国民军反帝国主义而战；（六）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散会时主席宣告游行示威，声明先赴国务院，再定路线。

各团体高揭旗帜，排队东行。过东长安街即转向北，自东单至东四约计不下2,000余人。我沿途散发反抗八国通牒的传单。遇着许多相识的学生。从前我在女师大授课，认得刘和珍女士，此时看见她也在队伍中。传单发完我就追过游行的队伍，还看见有人高举天安门台上的血衣。我比群众先到国务院（即海军部旧址）。只见一辆一辆的汽车陆续向西开去，大概是闹员散值或逃避了。汽车去，军队来。逼近一看，号衣上还是“府卫”二字。国务院前面场上府卫兵至少有三百，分三队排列。西面一排个个有德国式手枪及大刀，刀壳在背上，光刀提在右手。东面一排都有步枪，枪上都没有刺刀。当中一队人数最多，也携着步枪，并且军帽早就扣在面上。场的东西口还有许多卫兵和警察。西口外即陆军部旧址，军警当街立。东口外近十条胡同处又有一排卫兵。场西南有小小草坪，几个拿关刀的军人在那里练习拳术。场东南是个马圈。圈内也有些徒手的兵士。

将近下午一点钟时候，游行队到铁狮子胡同，进国务院的东口。过五分钟，照壁以北，卫队以南就充满了群众。西面有四五十工人，所携旗帜都是木杆做的。东面多中学校学生，手中连木杆的旗帜也没有。群众呼口号，反抗八国最后通牒打倒帝国主义。学生有发给卫兵传单的，有对他们演讲的。此时我从照壁南面缓道向西北走，遇着两个外国新闻访员。他们求我和门房说情，让他们进国务院探问消息。所以我们三人同到卫队后面的铁门那里去。只见铁门内不成队伍的散兵不少，二门排队的卫兵还有一百多人。新闻访员当然被卫队长官拒绝。他们两人就站在石狮子上对着群众摄影。我听见一位穿便衣的人



指挥，说队伍应当退入铁门，“学生若攻击铁门，那末，我们就要老实不客气了”。一位黑衣的警官把外国人从石狮子上拉下来，要他们赶快出去。我见状况不妙，跑到大刀队面前，要寻觅群众的代表和他们讲话。不料代表因为不得进国务院正在那步枪前向群众报告交涉的情形。我无法，只可等候着。谁知道卫兵不待报告完结就实行开枪！从我遇见外国人到开枪时，不过六七分钟光景。当代表报告时群众有大呼段祺瑞卖国者，有命令队伍直趋吉兆胡同段宅者。我以为果若退出国务院或可免去危险。思索未完，忽闻笛声。笛声未完，卫兵举枪。正在举枪，群众已逃。逃未十步，枪声砰磅。我闻枪声，立即伏地。枪声甫毕，我即见血溅满地。我所听见的枪声，都是排枪声，计共两次。我于是急向西滚，滚入停车场。向东窥，见卫队退入铁门内，从栏杆后任意射击。照壁下有女子中弹仰卧。西南操坪的“丘八”出来用关刀（非大刀队的大刀，乃如关公所用的“青龙偃月”刀）刺入女身，向空中高举再猛力抛掷！于是该女尸落在一丈远的地方。东南马圈内叫哭声很高。卫兵的手枪声更高。马圈中人向东口狂奔。沿墙逃难的人亦向东口拥挤。因避弹而卧地与力弱而倒地者一时堆积至五六层。灰衣的卫兵和黑衣的警察在东口乘机屠戮群众。木棍，长凳，刺刀，手枪，步枪，都是他们的武器。那时卫队放枪仿佛已有十分钟，场中且有大呼停止放枪的警察。然而西口外还有散枪的声音。东口外有排枪的声音。枪声停了一刻钟我方从西口逃出。口有女尸横陈。头向门口，脚对卫队。我跑的时候，一阵阵火药气和血腥气几乎逼着我使我不能好好呼吸。

西口外我见一卫兵抢劫一个形似学生的青年的脚踏车，又见一个卫兵抢劫一个邻近民妇的手表。幸而没有第三个来抢我的眼镜，我趁着势子奔到南面的胡同里。沿途见有小贩中流弹倒卧人家门前的。适遇黑衣荷枪的保安队二十余人路过其地。



我就跟着他们向西走。走回寓所后再赶到与我最近的医院，即北京疗养病院。好几位重伤的学生已和杨伯伦同住一个病室。我往宣武门外替他们报信，让他们的亲友赴医院照呼。当晚阅报，知道中弹丧命者有26人。刘和珍女士也死于国务院的东口。19日墙壁下与马圈中尚拖出尸身多具。据北大张经李竞何两君言，彼等见警察记载运尸的数目已达51名。医院中因伤而亡者已过10人。闻某医生报告，卫队所用子弹乃开花子弹。这也许是从前日本供给他们的。

十五（1926年），三，二十四北京

原载《现代评论》第8卷第68期
（1926年3月27日）



梦 想 的 中 国

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完全能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因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梦想的个人生活

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志趣。

原载《东方杂志》第 30 卷第 1 号(特)

(1933 年 1 月 1 日)



追念蔡子民先生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者蔡元培（子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个年头了。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不禁追忆起他人格的高尚，学问的渊博，功绩的巨大。

吴玉章同志曾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虽然这是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而蔡先生领导之功自不可磨灭。”那时我还在国外求学。1924年我到北京大学任教时，蔡先生适在欧洲，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直至1928年，我又从国外回到上海才和蔡先生相见，他当即推荐我去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工作。第二年，他又要我到中央研究院负责社会科学研究。为避免傅斯年和王世杰等对我的排斥，他以院长身份自兼所长的名义，而将所内一切具体工作，完全交给我主持。直到1933年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因参加保障民权同盟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我又被迫再次出国，有多年未再见到蔡先生。

据说，蔡先生早就知道我在北大的工作情况，因此，1928年我刚由西欧返国时，他就想找我去负责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但当时主持该所的王世杰说我思想左倾，阻挠我进所。在这种情况下，蔡先生便介绍我先到商务印书馆。次年春，王世杰去南京做法制局长的官而离开中央研究院，他就要我去主持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蔡先生用人办事，非常公正，没有派性和偏见。

这里，我回想起一桩旧事：1924年至1927年，我曾参与



王世杰主编的《现代评论》编辑委员会。他对我早有成见。有一次，编委会聚餐，王突然问我：“如果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在北京街上掏粪的300多人，你觉得将来给他们什么工作为好？”我当即回答：“到那时，就有抽水马桶了，这些人可以做别的工作嘛。”回想起来，当时我和王世杰的思想都非常肤浅。王世杰想象不到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们可以受到教育而担任各种新的工作；而我呢，当时的想法也很幼稚，难道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抽水马桶就会普遍用上了吗？难道说抽水马桶普遍之后，就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吗？可见当时在蔡先生周围的所谓学者，特别是象我这样的人，思想见解是多么的肤浅！然而，王世杰当时是属于国民党胡汉民派，而我则已加入地下革命工作。如果没有蔡先生那样知人善任和兼容并包，我那时几无立足之地。蔡先生真不愧为言行一致、心口如一、雍容大度的伟大学者和教育家。

蔡先生是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都放手让我主持，从不干扰。重要事务，由我去向他报告，他仔细地、认真地、虚心地听取报告，先征求我的处理意见，然后由他提出具体办法来同我商榷。他在青岛休养，我去信请教时，他都亲笔回答，具体而切实，从没有训人的口吻，他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中央研究院每一个工作人员，不论职位的高低，都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平等相待。当我看到现在有些人趾高气扬、傲慢跋扈的恶习时，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最初，社会科学研究所把工作集中在调查日本人在上海所办纱厂内的包身制，作为专题来研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随后，蔡先生告诉我，有人反对这样的工作，劝我们改赴农村，调查农村经济。于是，我和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等同志前往江苏无锡、山东潍县、河南许昌、河北保定以及广东省的十二个县，从事实地调



查。后来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吴觉农先生等组织了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达 500 人之多，编印《中国农村》月刊
达十年之久。当时就是蔡先生掩护了我们这些地下革命工作人
员。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
进行的。

蔡先生知道邓演达是我的朋友，在他被蒋介石逮捕后，蔡
先生立即写了几封介绍信，叫我去南京奔走营救。后来蔡先生
又同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诸位先生发起民权保障同盟，营
救革命青年与爱国志士。这一系列正义行动，充分表现了蔡先
生反抗暴政、勇于救人的大无畏精神，想到这些往事，我对他
感佩不止。

1939 年 5 月，我又从国外到达香港，登岸不久，即去九
龙柯士甸道看望蔡先生。一见面，他就双手紧紧地握着我，很
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我当时深受感动。显然，他这句话
指的是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同志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
绩。

蔡先生和我们永别已经四十年了，如果他今天还同我们在
一起，能参加我们现代化的建设，那又多好啊！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4日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18年1月，他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1922年，他辞去这个职务，保留教授的名义，直到1926年“三·一八”事件以后，他才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转入地下，在军阀白色恐怖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当我1924年4月从美、德两国留学回来，在北京大学就任史学系教授时，才有机会认识他。

我多年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到北大授课时，脑子里没有半点马列主义思想。幸好我当时遇见在北京俄专教授俄文的苏联人格林涅维奇，在他那里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常常同他谈到深夜，讨论一些时事和经济问题，他给我很大启发。经过他的介绍，我又认识了苏联驻北京使馆的经济参赞康托洛维奇。我们三人常常讨论历史问题，他们劝我去认识李大钊同志；不久经于树德介绍认识了他。回忆当时，他非常忙碌，从外地来同他接洽工作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我见到他的机会不多，但每次他总是劝我阅读《资本论》和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历史的著述。在他的影响下，我于1925年春季，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和于树德两位同志是介绍人。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李大钊同志派我去上海设法运动印度巡捕罢工。我在上海，曾同李立三和陈云两位同志接洽，但因某种原因，没有促成印度巡捕的罢工。我返回北京后，通过康托洛维奇，曾多次为第三国际发行的《国际通讯》



撰稿。随后，李大钊同志和当时驻北京的苏联大使加拉罕介绍我为第三国际做地下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同李大钊同志不便经常见面，当时他和国民党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的矛盾很尖锐，双方为争取国民党的一些军官而暗中斗争。但那时在北京的革命运动都是由李大钊同志领导的，他通过郭隆真同志，同北大进步师生保持联系，继续指导北大的革命斗争。

1926年2月初，在汉口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电邀周鲠生，王世杰和我三人去担任外交部顾问的职务，我们到了那里不到十天，李大钊同志电促我回北京，不久即发生“三·一八”事件。在铁狮子胡同执政政府门前，卫队对群众开枪时，我则滚向西面墙脚旁的一辆人力车底下。当我从西面的一个小胡同走出现场的时候，我的手表被一个警察抢走了。后来听说李大钊同志当时也伏倒在地，在枪声停息时，由于向东门跑的群众过分拥挤，很多人被挤倒在地上，又有被挤伤或踩死的，当时有一位年轻力壮的同志，为了保护李大钊，把他背在背上走出了广场。

李大钊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顾反动派的通缉，婉言谢绝了友人劝他离开北京的劝告，继续留下领导党在北方的工作。次年4月6日，当李大钊同志在东交民巷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同志们谈话时，突然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去的武装军警逮捕。

他在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问，但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在军阀的监狱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暗中还继续指导狱外的斗争。在狱中二十多天，他对同时被捕的自己的妻女，从不提家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竟惨被绞死。他那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至今还萦回在我脑海中。

原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北京版。



谈谈孙夫人的高尚品格

1925年春,当中山先生病在协和医院的时候,孙夫人日夜在医院照护。她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的寓所经常是国民党人士聚集的地方。中午吃饭时,往往有七八桌。那时我在北京大学授课,国民党的朋友们常邀我到那里去,因而在餐桌上也听到在座的人谈孙夫人是怎样的贤惠:在东京、南京、上海,是怎样帮助中山先生,料理各项事务的;在广州,又是怎样帮助中山先生对付陈炯明的叛变的。她果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两年以后的冬天,当我在莫斯科第三国际所办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的朋友邓演达同我到红场附近苏维埃旅馆去拜访孙夫人,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见面。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才开始同她熟悉起来。1932年12月,孙夫人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大家推她为主席,杨杏佛任秘书长。一面宣传民权主义,一面援救被蒋介石一帮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孙夫人当时劝我不要加入这个同盟,以避免受到蒋介石政府的迫害。但孙夫人为了营救被南京当局囚禁的太平洋区域劳工组织的领导人牛兰夫妇,让我为她同一个从瑞士请来的律师之间传递信札。她也曾经通过我设法帮助几个共产党员秘密离开上海,以免被捕。那时孙夫人们对宋美龄帮助蒋介石政府很反感,同时宋美龄对她姐姐也表示疏远。有一次孙夫人给我看宋美龄从南京写给她的信是秘书代写的,可见得她们姐妹之间由于政见的不同,是多么疏远。



1932年初,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时候,孙夫人借用交通大学的地方,办起一所救护伤兵的医院,有300多病床。当时我爱人顾淑型帮助为这个伤兵医院募捐,看到孙夫人为了抗战,几乎每天在外面奔走,常忙得连午餐都顾不上吃。

1939年5月,我从纽约到香港时,孙夫人早已在那里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为八路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募捐,把款项和医药器材秘密传递给国内红十字会和八路军。记得有些抗日将领在香港时都去拜访她。在孙夫人的赞助之下,外国友人艾黎、斯诺以及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等组织了一个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要我担任秘书。孙夫人所以帮助这个委员会,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吸收国内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款项和器材,防止重庆财政部收到国外的捐款而不发给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这个委员会在两年多时间内,接受了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款2,000多万元。

珍珠港事件后,孙夫人是香港沦陷前几天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到重庆的,我后来也回到广西桂林,重庆军委会有密令要通缉我,故我夫妇于1944年到印度避难,1946年,党派我去美国做联络工作,1951年初才回国。在这九年的长时间内,我只接到孙夫人一封信。大约在1948年的时候,她有信告诉我,可能到美国去一趟,但后来没有成行。我在美国的四年,我父母也长期不知我的行踪,曾要我胞妹陈素雅到上海香山路孙夫人家去探问,孙夫人告诉她说我在国外很好,不久就要回来的,但她没有说我在什么地方。

1951年3月初,周总理同孙夫人商量,要筹办一个对国外宣传的英文刊物,孙夫人因为我在香港曾编过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便推荐我来筹备这个刊物。她邀我到她北京方巾巷住宅同进晚餐,周总理也在座。我们谈了筹办这个刊物的方针。总理临走时嘱咐我几天内就去上海,借助于孙夫人所创办的中国



福利会的干部力量。另外还请了金仲华、李伯梯、爱泼斯坦夫妇等同志参加了这个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孙夫人为这个英文刊物取名为《中国建设》，于1952年开始出版，到现在快三十年了。最初只限于英文版，现在虽然俄文版停刊了，但已经发展到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等六种外文及中文等七种版本。十年动乱期间，曾停办过若干时间。在那以前，孙夫人常常找我们谈关于这个月刊的编辑方针，还亲自答复有些国外读者的来信。前几年越南当局驱逐华侨，很多华侨逃到云南、广西等地，孙夫人对此非常关心，要杂志社马上派记者到难民所在地去采访，写报告。

过去有一次孙夫人告我，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曾亲自看望她，要她接受国家副主席的职务，她不便推辞。事实上她最热心于妇女儿童和组织社会福利的工作，把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当作她一生的事业，要为少年儿童谋福利，要给他们很好的教育。在十年动乱期间，她无法领导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不得不移交地方去管理。有一次她想介绍檀香山的华侨来拍摄电影，有人告诉她江青在那里包办这些事，劝她不要去管。可见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她这样一个国家副主席实际上已经完全无法工作。她对四人帮的愤恨，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9月，我同在上海的陈素雅胞妹去淮海西路拜访孙夫人的时候，看到同她一起生活的李燕娥同志。在那里，我们一起用了午餐。饭后，孙夫人告诉我们，李姐在她那里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国民党曾经要贿赂她，让她报告同孙夫人来往人士的姓名，她断然拒绝了。从那以后，李姐一直在上海为孙夫人看家，后来孙夫人遗嘱要将李姐同她葬在一起，可见她待人是多么地真诚。

孙夫人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是为人所共知的。可是她工作的勤奋和办事的敏捷，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多。



她每天要翻阅国内外许多报刊和书籍，每年都要给《中国建设》杂志写文章，还经常亲自答复美国和其他国家友人的来信，近年来还接待不少国外来访问她的友人。虽然她身体不好，时常有病，办事却从不拖拉，这只是从我本人同她信札来往过程中所了解的。我去信的第三天，她就有回信来，同时她也要求我尽快回她的信。1981年3月，她来信谈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要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来信同我商量答辞的内容，我第二天就回了信，想不到她在接受学位以后，她的病很快加重了。我四月底从上海回京，5月16日听到关于她病情公告的广播，当天下午我就赶去探望，她已不能多说话了。回忆起来，孙夫人的高风亮节称得上我们国家之宝。她始终不受蒋介石等的诱惑，赞成并且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一生坚持革命；她后半生一心一意为促进社会福利——妇女、儿童的教育等而不屈不挠地坚持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平易近人，勤奋自勉。这种品格实在是少见的。她的高尚品格不但受到国内广大人民，并且也受到世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尊敬。

1981年8月

原载《宋庆龄纪念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版。



斯诺二三事

我初次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见面，已是四十多年前的的事了，1938年4月，我从英国乘船到了纽约。经太平洋学会介绍，同斯诺和他夫人见面了。他说，他在抗日战争前曾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讲授新闻学；1938年前后曾由宋庆龄同志介绍，一次到过保安、三次到过延安，他对我们的部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服装和武器不够完善，但军心一致、纪律严明……。友人们同他夫妇二人还讨论了国共合作的一些问题。从此我对斯诺先生之被认为是我国我党的友好人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39年5月，我从纽约到了香港，准备在抗战后方做些工作。那时路易·艾黎先生和斯诺先生正在热心宣传和推广抗战后方的工业合作社运动。但是，海外热心人士捐助我国这一运动的款项，都被重庆国民党财政部分配到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去，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工业合作社和合作讲习所根本没有得到。因此宋庆龄、艾黎、斯诺和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等在香港组织了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接受国外的捐款，并全部捐助给重庆方面没有分配到的上述地方。当时我担任该促进委员会的秘书，深知斯诺是怎样在纽约、旧金山、马尼拉等地为我国的工业合作运动做宣传工作的。两年半间，委员会收到海外捐款超过2,000万元。

国民党发动内战期间，斯诺对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有他独特的见解。1946年夏季，拉铁摩教授介绍美国政府远东司司



长约翰·阿塞费生脱同我谈话。他说斯诺认为中国的内战是难免的，问我有什么看法。我问他斯诺先生的意见如何，他说斯诺认为蒋介石是必败的。

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是，1951年我从美国经欧洲回国后，忽然接到我过去在东京从事研究工作的助手中岛节子来信。我惊喜交集，不知她怎么知道我在北京的地址。原来她在东京听斯诺讲演时，是斯诺告诉她我的住址的。足见斯诺先生对中国友人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15日。



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向来非常重视历史这门学科，这是因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演变而来的，而世界的明天又必须靠今天的努力。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担负着改造和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尤其应当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界历史发展过程，那就难免重蹈覆辙，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问题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历史。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书信中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①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也谈到历史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②有一次周总理听到有同志告诉他：“现在中小学不教中国历史了，大学只教四门所谓四史”。总理马上问，哪四史。回答说，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总理又问：“没有中国通史吗？那怎么行呢？中国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不学通史，总得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嘛！”^③总理在这里虽然说的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又何尝不是同样重



要呢？如果能融汇贯通整个世界史，那对我们制定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国古代的历史是包括在经诗以内的。王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章太炎认为：“经之所说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学，治人之道则史家意有独至。于是‘经’‘史’遂似判然二途”。“古无史之特称……”④。

在西方上古时代，历史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拥有“西方历史之父”称号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所写的《希波战争》，笔调生动鲜明，引人入胜；但因此而常常在史实中穿插一些不尽可信的故事或传说。欧洲中古时代历史和科学也是分不开的。历史的著述着重神明与人类的关系，例如罗马帝国末期，北非主教奥理略·奥古斯丁（354—430年）所写的《上帝之城》的内容就是这样。

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还是十九世纪上半期在西欧开始的。拿破仑时代因为提倡爱国主义，史学才成为专业，才有历史专课和史学教授。至于在我国直到十九世纪末开设公立学校的时候，才有历史的课程，而有中国通史的专门著作则更要晚得多。

可惜直到现在写世界通史的人们，只是把欧美亚非一些国家的历史，或多或少的分期叙述一下，并未说明社会组织如何转变的，人类如何进步的。无论学述性著作或通俗著作，都有这个缺点。英国剑桥大学编纂的《世界近代史》，阿诺德·约瑟·汤因比所写的《历史研究》，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我国六十年代作为高等学校教材发行的《世界通史》都存在这个问题。

至于世界史的通俗读本，例如早年出版的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1974年出版的爱·齐·曼福特所编的《世界简明史》，1976年出版的汤因比著的《人类与土地》，



也是按时代编写的，在每个时期内讲一些国家的历史。有些作者甚至借此机会宣传自己的偏见。例如汤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里，宣传欧洲社会终究将接受上帝的意志。又如威尔斯《世界史纲》的1974年版，还有一些歪曲事实而反对共产主义的谬论。

上面列举的一些著作，表面上看来，好象都是全面的世界通史，其实这些著作仅仅是国别史的拼凑，很难使读者通晓社会的组织如何转变，人类的文化如何进步的。换句话说，这种世界史的写法，没有说明原始社会如何分化为阶级社会的，阶级社会中又如何通过斗争而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这样的著作，不能起到真正的教育作用，只能使读者知道过去一些历史事实，但不能明白整个社会进步的内在因素。其实世界史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社会组织如何改变，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从而使得这门科学成为我们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这才能够称得上是一部真正有用的世界通史。

任何事物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正因为研究世界史的工作，一般说来比研究本国史要困难，开始的时间也要晚些，所以存在上述的缺点，并不为怪。

那么怎么样的一部世界通史，才能算真正有意义的呢？首先应该从各地区或各国选择一个典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来说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从一个典型的社会来分析它的演变，就可避免现有世界史一般的缺陷。已经出版的世界通史，往往只叙述一些社会演变的事实，读者不能从这些事实中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其实我们应当以无产阶级没有偏见的立场、观点去分析阶级关系、组织体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和其发展的各种原因。因此应该选择一个典型的国家或地区来把问题分析清楚，



才能明白它的意义和发展的规律。当马克思以英国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时，他就告诉我们德国必然有同样的趋势，了解了英国的今天就可以预料到德国的明天^⑥。

其次还应将各大洲或各国同类型的社会，尽可能地作比较，说明它们之间相同和相异的情况，以及互相影响的事迹。这样就有助于证实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从一种社会转变到另一种社会的阶级斗争。现在的世界通史，虽然提到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充分分析它的前因后果和它的过程，这样就不能使读者明白一个社会的转变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今后我们编写世界通史，应当避免上述这些缺点。

总而言之，拼凑各地区或各个国家的历史而编写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读者了解一种社会演变为另一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也不能了解怎样受到前一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而找出社会向前演变的规律。如果我们有一部好的世界通史，那就能加强我们的革命信心去改变社会使它向前发展。因此我们要急起直追来从事世界史的研究。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呢？世界已经有五六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关世界历史的材料。真如又深又广的矿藏，正待我们去挖掘。如果不去挖掘第一手的材料，仅仅根据书刊文章中一些片断不可靠的资料而从事研究，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研究工作应当从大量可信的史料中去精心探索，我们必须在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切忌先有一个结论，再去找史料论证的做法。

毛主席说得好：“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又提醒大家：“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又说：“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



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⑥。大家知道，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著述《资本论》，曾经读过1,500多种书籍，并做了大量的摘录。他正是在充分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科学结论的。他的学风，为我们研究世界历史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那么哪些历史材料是我们必需阅读的呢？第一手资料大约可以有三类。第一是地下挖掘出的大量文物资料。第二是中外各国的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各种档案。第三是当事人的可靠的记载，尤其是回忆录、日记、书信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世界史必需采用的材料。第二手材料，便是可靠的或较为可靠的历史著作。

记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白莱斯台特教授，著述了大部的埃及古代史。他的著作都是根据埃及挖掘出土的远古的文物加以分析研究而写出来的。瑞典的伍伯赛拉大学1956年有一百多学生上古代史课，他们的教授把他们带到埃及去参加考古挖掘工作。近年来美国有不少学者也到埃塞俄比亚去搞考古和研究古代史的工作。可见研究古代史是要同考古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的。可惜我国研究古代史的人们，很少根据国内几十年内出土的文物作为研究古代史的第一手资料而写出的论文或专著。现在只有《文物》杂志和《考古学报》，而没有根据出土文物写成的关于我们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的专门著作。其实近年来，黄河下游挖掘出来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远古的文物，以及广东、四川、浙江这些地方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应该可以供给我们作为研究我国上古史的资料，并同埃及和巴比伦的奴隶社会作分析比较。

世界各国政府的档案，有些俗称为蓝皮书或白皮书，也是研究世界史的第一手材料。欧美各国早已将几十年前的档案整



理出版，可供史学家们探讨。我国虽有档案馆的组织，还没有把档案编成有系统的参考资料。但研究历史的人们，可以在明清档案中找到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十九世纪陈兰彬到古巴去调查华工的报告，俗称为醒迷录，就可供我们了解大批华工在海外被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奴役的真相，以及他们为西方各殖民地开发资源的劳绩。在没有出版的外国档案中也有很多有意义的史料。记得1932年冬，我在广州沙面美国领事馆看到一些档案，其中就有1900年李鸿章通过他的医生英国人马克，私自勾结当时英国首相，要那位首相向慈禧推荐他为议和全权大臣。这就证实了李鸿章私通外国的勾当。

研究印度近代史的人，不免要看马·纳·罗易的回忆录，看了这部书，可以明白1910年代印度抗英运动的内幕。要明白近东地区两霸斗争的历史背景，就应当读一读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所写的回忆录。好些回忆录，是研究世界史的第一手资料。如同回忆录一样，日记也是第一手史料。例如最近我国搞历史的人，对于洪秀全的去世，有所争论，终于在日记中才得到证实。当时曾国藩欺骗清廷，伪称洪秀全“服毒自杀”。但根据李秀成的自述和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就证明洪秀全是因病而死的^⑦。还有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信札，也是第一手材料。如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讯，列宁的书札等，既是经典著作，也是很宝贵的史料。

第二手资料，便是可靠或较为可靠的历史著述。例如公元七世纪唐太宗时代编撰的《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当时138个所谓国家的历史和地理。又如十一世纪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和十八世纪乾隆时定版的《二十四史》，以及各省、府、县的地方志，都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至于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芳兰克，根据官府的档案而写成的一部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诸国家的历史，便是关于欧洲中古史的参考



书。

1976年巴黎出版的《法兰西的弊病》一书，可说是一本有价值的现代世界史参考书，作者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他曾任戴高乐党的总书记。他在这本书里揭露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在法国官僚主义严重，层次重叠，手续繁琐。因此，盖一所中学，需要经过二十四道手续，十四个部门批准。修建一个大学的医疗中心，需要涉及五十个有关部门，一百多次往返周折，耗费了十年时间。又如法国属地留尼汪申请修建一座疗养院，往返多次，竟没有被批准，据称理由是法令规定疗养院的窗户，必须朝南向阳，而这个疗养院的设计，窗户却是朝北。官吏们却不知道留尼汪位于南半球，朝北才是向阳。从阿兰·佩雷菲特这本著作里，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法国因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而赶不上美国。

当时就地的通讯报道对我们研究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一种第二手资料。例如，日本东京的《世界周报》1976年5月30日到6月27日，登载了前驻莫斯科五年半的一位日本记者矶定田章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回国报告：亲身接触到的苏联》。在这篇文章里，他概括地描写了今天苏联的社会。他说，“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方面是官僚主义体制，在社会方面是自我服务的社会。”官僚主义和自我服务是苏联社会的两种不治之症，已经成为一切工作效率低的根源。矶定田章说，苏联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很多干部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而没有主动工作的热情。他看到苏联商店营业员服务的态度，一个营业员即使很空闲，也决不去帮助另一位很忙的营业员。苏联有一种非自己负责的工作，绝不插手的风气。

矶定田章还说，在苏联，贿赂是万能的。书店经理，剧场售票处主任，海关官员，甚至警察，无一不收贿赂。有一个莫



斯科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对这位日本记者说：“苏联人的意识和十九世纪初果戈里（1809—1852）时代的意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帝俄时代只有沙皇一人统治，而现在苏联是十五人统治，只是把社会主义的帽子戴在思想意识依然如故的俄国人的头上罢了”！这个报道，反映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真相。

现在我们来谈谈如何应用第一手和第二手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世界史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来。目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搏斗的时代。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立场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历史，决不可被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蒙蔽。我们知道，只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才是最进步的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才能摆脱一切偏见，才是最大公无私的。所以我们必须很好地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大量的资料中选择核对那些最典型的资料，来毫无顾忌地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但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最后才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还有，我们搞研究工作的人，必须学会分工合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应该很好地发挥分工合作的威力，群策群力，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况”^⑥。我们研究世界史也必须采取有组织、有领导的分工合作制度。

一部世界历史，说到底，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历史。世界史既要叙述压迫民族和压迫阶级对人类历史犯下的罪行，也要记录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为自身求解放而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的历史。因此一部世界史，实际就是一部世界阶级斗争的教科书。



可是为了要完成编写《世界通史》的任务，还需要研究好些目前还没有了解的问题，例如：原始社会是怎样崩溃的？我国奴隶社会起于何时？非洲部落的历史与欧亚两洲的有何异同？我国的奴隶社会与其他各国的有何不同？中国古代和近代与欧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是怎样发展的？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有何异同？宗教与阶级斗争有怎样的关系？近代史上黑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怎样被殖民主义者奴役？最近半世纪内帝国主义有何新发展？英帝国主义是怎样衰落的？非洲各国是怎样相继宣布独立的？苏联为什么会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这些问题如果还没有很好解决，那就很难编写一部较为完善的《世界通史》。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又占世界总数的近1/4，我们还有很悠久的历史，因此我们应该从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有责任来认真研究上述这些问题。希望若干年后，能编写出一部符合我们要求的《世界通史》，对世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759页。
- ③ 《人民日报》1978年7月30日。
- ④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见《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第6期，上海，1935年6月刊行。
- ⑤ 马克思《资本论》初版的序言，1867年7月25日，伦敦。
-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17页。
- ⑦ 《光明日报》1978年9月12日。
-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原载《世界历史》第1期（试刊）

（1978年12月15日）



谈谈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

——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这次经北京到上海，是为祝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大会的召开而来的。大会筹备组要我讲几句话，我无法推辞，只能简单的谈一些个人的感想。大家知道国内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一向是比较重视的。让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现在领导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的陈楚同志，原来就是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所长；代表团的另一位赖亚力同志，过去也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领导；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同志和副所长李琮同志，作为专家，被邀请参加了国家计委制订长期计划的座谈会。再来看看刊物出版方面的情况，例如北京出版的《世界经济》月刊，就已经在国内外大量发行，还出版了几种关于世界经济调研的内部刊物，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就是要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可惜我们的研究工作，目前还远比不上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美国有几十个研究所或学会，从事世界经济的研究，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论文，每年总有几十篇，关于苏联的经济研究数量更多。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有一个联合的经济委员会，已经有两次出版了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每次有几十篇，北京的外贸学院，曾经把它译成汉文，有七十多万字，三年前已由北京财经出版社出版。美国一些著名的杂志，也常登载关于世界经济的文章，报纸上的专栏作家，有时也讨论有关世界经济的问题。拿经济统计一项来讲，美国就出版了中国经济统计一大



本。我问过在我们计委负责统计工作的同志，据说，一些重要的数字，同我们所有的相差不多。可见得国外对我们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关系，多么重视，多么下功夫。听说，苏联方面派好些研究人员到美国去参加研究中国经济，用美国的资料研究世界经济。从这些情况看来，我们还得要急起直追，努力赶上才行。

我想同志们会同意一种看法，那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教导性的多，研究性的较少；还有翻译过来的文章，亦有类似情况，这些刊物的内容很少联系到我们国内的实际经济问题，只能使我们了解国外的情况和问题罢了。这样就很难帮助我们解决自己的经济现代化的问题。因此我想就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谈谈我个人的看法。首先有个方法问题，也就是在研究工作中要了解同经济有关的各种规律，否则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研究经济的人，首先要了解同经济有关的自然规律。比如说，要种甜菜或种糖萝卜，就不能在华南地区，而应当在华北，就是在华北种甜菜，也必须用轮种的办法，不能每年连续种植，应当隔几年换种另一种作物。又如，选择建设工厂的地址，必须先测量地层，并考虑交通运输，以便于原料、燃料等的供应，以及产品的运输等等。还有例如某些工厂排泄出来的污水，应当加以分析，是否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甚至危害鱼虾的生存。经济学者如果不联系这些自然规律来研究有关问题，那就不容易得到正确的结论。

研究经济问题，也应当懂得人事规律，比如说，管理业务部门的领导，没有权力选用干部，同时却要接受不懂本行业务的人来工作；又例如，不懂技术的干部去国外谈判引进技术设备；安排不懂会计的人去领导财务工作。还有往往不懂经济的人要他去搞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或外汇平衡。又如工商业等单位没有适当的自主权，以致产销不能配合，而产



生产品滞销，造成浪费和损失。研究经济的人，如果不认真分析这些问题，那也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

我们不但要懂得自然规律和人事规律，还要懂得发展规律，或者说历史规律。历史说明小生产方式或手工业方式，必然要发展到近代工业，即大规模生产方式，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当我们正要发展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的企业组织，却还停留在分散的小规模“大而全”、“小而全”的不讲经济效果的小生产阶段。例如，汽车制造业，全国现有100多个汽车制造厂，分散在二十六个省、市，其中年产1,000辆以上的只有13个厂，年产100辆以上的有17个厂，其余厂的平均年产量只有几十辆。100多个厂的总生产能力只有18万辆，但这100多个厂在1979年的实际总产量只有16万多辆，还不到工业发达国家的汽车厂的产量。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业经济工作者没有按发展的规律来办事。

近代工业的发展，要靠农业供给原料，而重工业的发展又需要轻工业相应配合，因此经济发展必须符合农轻重的比例。我们全国解放后一直到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的发展比例，比较正常，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成就。但是从195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以棉花的收购量来说，1958年为3,600万担。1961年和1962年则下降到只有1,300多万担。最近1978年棉花的收购量，亦不过只有4,052万担，显然农、轻、重的比例在我们国民经济中多年失调。这当然就影响到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研究世界经济，不但要懂得自然规模、人事规律和发展的历史规律，还应当把国内外的情况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要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世界经济，我们国内现在发表的关于世界经济的文章，谈到一个问题时，很少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同国



外作比较的探讨。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会忽视或很少联系上述三种规律，并且没有采用国内外比较的方法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研究的目的不明确。二是外文程度好的不多，不能直接参考外文资料。三是不注意培养人材，研究人员知识不够广。

如果我们要培养研究工作者，使他们能运用上面所说的自然、人事、发展三种规律，来进行研究工作，就必须使他们具备广泛的知识，因为研究的目的，无非是要从已经知道的规律，进一步探索新的规律，这就涉及到我们目前的教育问题。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他们的知识不够广泛，要进行研究工作，就很困难。列宁在1920年10月，对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讲话时，就说过，青年的学习训练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基础，和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广泛的知识，那么就不能希望研究工作者运用各种规律来工作。

再说外文的问题。现在国内研究世界经济的同志，能用两种外文的不多，就是精通一种外文的亦不够多。虽然有些外文好的干部，亦因经费不够，外文的资料少得可怜，而无法从事研究。近两年来，于光远同志多次建议要办研究世界经济的资料中心，可惜我们的财政，目前还跟不上增加这方面的开支，目前还只能处于筹备阶段，做些极初步的工作。3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千家驹同志的文章，告诉我们日本在1971年所花的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支出的39%，为当年世界第一位，难怪日本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突飞猛进，使生产力能同西德和美国并驾齐驱。可是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在全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是倒数第十名，甚至还不如埃及。在目前教育经费奇缺的状况下，怎么能培养出很多外文好的研究人才呢？现在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邓小平



副总理着重提出要增加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经费。这是很对的。此外我们研究工作者还遇到这样的困难，那就是关于世界经济外文的资料分散在好些地方，互不通气，亦不能集中使用，这些都是我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我总觉得现在所发表的有关世界经济的文章，大多是就事论事。比如讲罗马尼亚、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就没有同我们国内的情况作一比较，这样读者只知道一些国外的情况，似乎同我们国内的情况毫无联系。这些文章只是属于介绍情况的，还谈不到什么研究的成果，因此对我国的经济现代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想这是一个目的和方法的问题。我们没有把国外和国内的问题作比较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研究世界经济的方法，还不够完善。研究世界经济最好要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比如说，要知道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哪一个国家的财政和银行的制度最好，或各有什么缺点和优点；比如说，在哪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采用合作社的制度，这种制度现在是不是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比如说，哪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企业管理体制能促进生产，哪个国家的企业管理体制是束缚了生产。还有我们应当研究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发展，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目前应当研究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和国际金融的混乱，对我国有什么影响。总之，研究世界经济要有明确的目的，否则就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记得五十三年前，那是在1927年的12月，蔡和森同志从苏联回广州，路过北京，同我谈话时，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就很难做到正确地改造自己”。他的意思是一语双关的，既要改造个人，又要改造社会。现在研究世界经济是要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所贡献。今年3月31日，胡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一个会议上也说过这样的



话：“科学研究机关需要通过掌握大量的材料，提出别人没有提出过的，或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的规律性的知识，并根据这种知识，提出一种系统的意见，这才是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的任务”。这些话亦是我們研究世界经济的同志们的指南，让我们大家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吧。

原载《社联通讯》第7期（1980年5月）



社会调查研究八题

在我国搞社会学，应重视调查我国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我以为户口、住房、双职工、社会教育、就业、走后门、计划生育和宗教信仰等八个问题是我们当前首先应该调查的项目。

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11月4日报道，湖南衡阳地区的干部中，有1,300对夫妻两地分居。其中分居二十年以上的有517人，十年以上的有380人。可以想见其它地方也有同样的问题。这牵涉到我国户口制度问题。农村户口不许迁移到城市，两个城市的户口也很难互相对调。因此，对职工的生活和工作造成种种困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住房问题。现在一般城市的居民每人占用的住房面积据说不过是三平方米左右。两家合住一室，三代同堂的均为普遍现象，还有临时住在车间、仓库、办公室的无房户也占一定的比例。住房的紧张，直接影响了居民的饮食起居和日常工作，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双职工问题。夫妻同在外面工作而没有足够的时间照料家务，以至影响工作和生活。我就接触到几个这样的家庭，男的在机关工作，女的在工厂，每天上下班在路上需要花去两小时左右。午间在机关和厂内的食堂用膳，晚上回家做饭，起码要花一小时左右，早上因为要赶时间，往往在路上买四只油饼充饥。他们只有在每周休息的日子才能清理家务，打扫卫生。至于子女的教育往往无暇顾及。这些情况一般是同工资收入较少有关系，两口子的工资要应付日常开销，就谈不上请人帮忙。



这种困难不但影响他们本人，还必然影响后代的教育。

社会教育问题。缺少家庭教育的子女很容易堕落学坏，以致与流氓阿飞为伍，就成为社会教育的对象。尽管有些男女青年经过工读学校改造重新踏进社会，有些还不免继续作恶，再次成为一个社会教育的对象。

就业问题。因为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较慢，同时普遍教育和职业教育进展得不快，以致不能容纳全部要求就业的人。记得北京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上午，某区负责干部在家中，被几个破门而入的青年绑在椅子上，嘴巴也给东西塞住。这些青年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很不错，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里休息。你只知道做官，不了解我们没有读书的机会，没有职业的苦恼，……”讲完以后，他们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摔在地上，然后忿恨地下楼去了。在我们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就业问题恐怕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走后门。因为找职业有困难，改变工作岗位也有困难，随之而来的就是送礼行贿走后门等歪风到处出现，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连在市场上购买各种紧张商品，也有走后门送礼行贿的。这种不良现象，久而久之必然要影响我们的经济和政治。

计划生育。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没有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因此不容易破除传统的多子多孙的思想。个别地方高级干部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但无人敢于揭发；有些地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女干部不善于引导，一味蛮干，逼得人家去烧了她家的大门以泄私忿。这些情况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宗教信仰问题。二十多年前，对于宗教的信仰渐渐淡薄了，可是近年来虔诚的教徒渐渐多起来了。1979年12月25日北京天主教南教堂做弥撒，参加的人多至1,500人，其中就有900多人是中国人。1980年8月17日，前往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做弥撒



的竟多至 3,000 多人。这种现象是二十年以前所不可想象的。说明有些人的精神寄托已渐渐转向宗教，这岂不也成为一个问题了吗？

以上八个方面是当前我国社会中较突出的现象，值得我们详细调查。根据调查所得加以分析和研究，找出造成这些现象的前因后果，提出解决的方案并加以理论的探讨，这样有助于创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学。

原载《社会》(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丛刊)第1期
(1981年10月)。



要学习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愿向大家介绍这位伟大导师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中应首先确定研究工作的目的。一般讲来，写一篇简单的报告或文章是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但如果要彻底了解一个历史问题，那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是为回答问题服务的。那末马克思是为了什么而长期做研究工作的呢？这一点从他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得出来。他是这样写的：“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可见我们伟大导师无非是为了革命而狂热地做研究工作的。

在1848—1849年西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伦敦继续有目的地、顽强地埋头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他曾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他最喜欢的名言之一是“为人类工作”。马克思刻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弄清问题。而不是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关于这一点，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曾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马克思这种研究学问的目的和精神是值得大家深思和学习的。

我们要学习他那种苦干的精神。他的女婿、法国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拉法格曾讲过：“我的岳父虽然睡得很晚，但每天总是八、九点钟就起床，喝过一杯黑咖啡和读过报纸之后，就到



自己的书房去，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中午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马克思在伦敦流亡时期经常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去看书和写作，从早到晚在那里埋头钻研。当他读书读到兴奋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这样长年累月，竟把下面水泥地面磨去了一层，被人称为马克思的足迹”。

马克思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所用的参考资料范围很广，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学科。他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马克思除了深入研究英国、法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历史和这些国家的日常事件外，还读政治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交学等，不过他研究的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

研究问题必须参考已有的成果。这些成果决不可能限于某一国出版的著作，因此研究工作者，应当学习外文，学习的文种越多越好。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为了及时而广泛地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长期刻苦努力，学了十几种外文。他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而且写得非常好，他还能阅读希腊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罗马尼亚文等。他在五十多岁时又发奋学俄文。他在给齐·迈耶尔的信中曾说：“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古典语、日耳曼语和罗曼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成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话是马克思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教诲。

做研究工作不可能不付出辛勤的劳动。马克思在大学研究院为写博士论文所搜集的材料，足足写满了十本手册，其中四册完全是注解。他在每章中所引用的词句都注明了出处。此外他还附有长篇的原文。后来在他自己著作的后面，也附有他所引用的全部原文。难怪1869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写道：“他所始终感到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



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①

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看过的书籍竟有1,500多种，还不包括那些大量的报刊资料，凡同写作《资本论》有关的学科和专题他都钻研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他都仔细地研究过，他不仅阅读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斯密史和李嘉图的著作，而且对庸俗经济学中最反动最荒谬的人物马尔萨斯、西尼耳之流的作品也不放过。他写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一章时，为了弄清实用工艺学中的一些问题，还特意去听别人讲课。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仅有十多页的《生产时间》那一章的时候，读了五个国家的有关炼钢、纺织、制陶、酿酒、制革、漂白、造林、畜牧、谷物栽培、饲料种植以及轮作等技术资料。为了写第三卷中的地租问题，他研究了上古史、农业史、俄国和美国的农业情况以及地质学等。马克思对人口问题、殖民地史以及殖民地居民、经济、贸易等问题都作过认真研究。同时马克思还十分注意阅读和收集报刊上的经济资料，我们知道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是他经常阅读的刊物。

当前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们，有的不看报纸和杂志，有的不肯大量阅读过去和最近出版的书籍，在工作上敷衍塞责，因此很难有什么成绩。马克思曾嘲讽那些把一切认为容易、简单的“头脑简单”的人，说他们根本不想下苦功，只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这些人当然不需要下苦功参考各种资料了。马克思在研究工作中除了利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外，还收集那些没有收藏的书刊。在他生活困难、无力购买麦克拉仓的《货币史纲》一书的时候，他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将购书所需之



款汇给他。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写道：“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我们一定要记住，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并没有埋头于文字堆里，而对社会上的各种情况置之不顾。他在著作中不但引用书面资料，而且引用活生生的材料。他就任《莱茵报》主编时，就召集了工作人员的会议，要求同事们少发空论，少唱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而多讲些明确意见，多注意具体的现实事物。马克思不但观察一般事务，还对社会差别的原因与贫富之间的矛盾进行研究。他认为做研究工作除了利用过去的资料以外，还得自己寻找活生生的新材料，作为研究的根据。拉法格回忆同他岳父谈话时写道：“马克思认为，不论从事那一种科学研究，都不应该为这种研究会得出什么结果而烦心；同时他又认为，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堕落，就决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象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见，要寻找新的资料，研究者就必须参加社会活动。

马克思有同别人用书面或口头讨论各种问题的习惯。马克思常常同他的友人如恩格斯、李卜克内西、沙佩尔、魏德迈和齐·迈耶尔等人讨论和通信。

马克思不但用功去搜集死的或活的材料，并且广泛征求人家的意见、以帮助自己做研究工作。例如马克思常常同在他家中多年的女仆海伦·德穆特谈论问题。他把自己的见解和学说讲给她听，并且征求她的意见，有时还要这位女仆对复杂的政治问题提出她的见解。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我国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新剑桥学派和近来



的学院派都遵循着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体系大多相似的境地。两派都认为资本主义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罗宾逊夫人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就同长期动态的分析有关，而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并提出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所以有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与他奋斗目标 and 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分不开的。

研究的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的目的或动机则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如果目的只是为了写一篇文章或作一个报告，那就谈不上讲究什么研究方法了。在社会科学范围内，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许多极为重要和急迫的研究课题。我们要研究的总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怎样可以建设起来和帝国主义将怎样没落下去。单就我们国内的需要来讲，也有不少急迫问题有待于我们认真进行研究。例如关于党、政、业的分工问题、教育体制问题、农业生产的组织问题、工商企业等管理问题、工资制度问题以及人口问题等等。因此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急起直追来完成我们的任务。

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2—413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北京版。



青少年们的好消息

——《外国历史故事》简介

邓小平同志曾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邓小平文选》第37页）。他还说过：“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同前，第55页）。可见把外国历史知识贯注到中小学的师生中去是当前的一件重要工作。

可惜事与愿违。目前我国国内学校中还不重视历史课，因此一般学生对中国史还不够了解，对外国史更茫无所知。据最近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我国中小学生的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尤其对外国史知识懂得更少，其主要原因是在“文革”期间中小学普遍取消了历史课，少年儿童又看不到课外读物。特别是近几年来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社会上普遍不重视历史教学的情况。同时，现在历史教师人数过少，程度又不高，因此学生就不可能有条件把历史学好。

近年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三个出版社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编写、发行了不少关于中外历史的



青少年课外读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少年百科全书》，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些丛书叙事详实，文笔生动，是青少年最好的课外读物。

最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四本《外国历史故事》也富有普及教育的意义。第一册的内容讲述了原始人怎样生活，并介绍了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和希腊等世界文明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第二册讲述了希腊和罗马的兴亡，对雅典、斯巴达、马其顿、迦太基的历史人物有非常生动的叙述；第三册娓娓动人地讲述和描绘了中世纪阿拉伯、印度、日本和朝鲜等国的封建制度和人物，以及十字军、蒙古人的远征、新大陆的发现和文艺复兴运动；第四册是近代史，作者满怀激情地记述了英、美、法、俄、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

这种通俗读物虽然是由五位同志写的，但他们的文笔同样简明生动、富有感染力。例如“‘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这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一句名言。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又如“文艺的曙光”一章中叙述了意大利小说家薄伽丘在修道院藏书室内发现许多古书，作者写道：“在一寸多厚的灰土之下，却随处可以找到许多珍贵的古书，有些还是多年失传的珍本。”书中还有很多插图，也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套书的特点是在读外国历史的同时，还牵出我国的历史故事。第一册内谈到文字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关系时，就有以下一段话：“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经有六千年的历史。”第三册内谈到“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欧洲的联系，这条路把中国名贵的丝绸送到了罗马，也使欧洲人第一次知



了中国”。第三册内还叙述了1275年马可·波罗所看到的北京。第四册中提到了英国人戈登，叙述了他在苏丹的下场。读这四册《外国历史故事》，不但能知道国外的历史轮廓，并且还可以帮助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

从古到今的历史是连续的，一国的历史和其它国家的历史也是有联系的。历史属于普及教育的一门。我们的青少年读了这部通俗读物，不但能丰富他们的历史知识，还可以了解社会进化的过程，这真是青少年的一个大好消息。

原载《光明日报》1983年8月17日



重视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

——在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中央发出号召，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此，就必须坚持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教育事业。他反复强调：“我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①“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②邓小平同志还明确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③。

历史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而历史科学自然包括世界史。我们搞建设，不能闭关锁国，不能把自己封锁起来，闭眼不看世界的现状和历史。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④在《邓小平文选》中就举了不少世界上的例子。例如在论述科技和教育问题时，谈到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又说明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⑤。又如在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旧社会长期历史遗留的影响可能出现挫折时，谈到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⑥。世界史上的这样一些事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了解当前中国和世界发生的事情。此外，我国当前发生的许多



事情，有的就直接同世界史有关。如果不懂世界史，就无从深入了解这些事情。例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时，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⑦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加强世界史的研究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⑧由此可见，把外国历史知识贯注到中小学的师生中去是当前的一件重要的工作。

可惜事与愿违。目前我国国内学校中还不重视历史课程，因此一般学生对中国历史还不够了解，对外国历史更是茫无所知。据最近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我国中小学生的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尤其对外国历史知识懂得更少。其主要原因是在“文革”期间中小学普遍取消了历史课，少年儿童又看不到历史方面的课外读物。特别是近几年来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社会上普遍不重视历史教学的情况。同时，现在历史教师人数过少，程度又不高。在河北省教历史课的教师总数只有14,483人，其中学过历史专业的仅653人，只占总数的4.5%，而95.5%的历史教师没有学过历史专业，因此学生就不可能有条件把历史学好。如果在学校没有把历史的基础打好，将来搞研究就会增加不少困难。

现在对研究世界史有两种看法：一是把世界史看作一个整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了解、探讨各种重大的课题。如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各地区的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各国的资本主义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怎样兴起又怎样没落的。还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各有不同的特点，等等。二是把世界史看作是国别史的总和，认为把各国的



历史弄清楚了，就算是把世界史弄清楚了。因为有了这个概念，研究世界史的人就不再把中国历史放在里边了。也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史已经讲过了，讲世界史就不必重复了。这第二种看法是一种狭隘的看法。我想这第二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搞世界史就是要明白为什么一种社会会变成另一种社会。并且还要明白每一种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过程。我们研究世界就是要研究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例如，可以研究这样一些题目：美苏为什么实行扩张主义政策，美帝国主义盛衰的关键何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因后果，近代几个大国国内的社会变化，等等。如果就这些题目进行研究工作，就能了解阶级斗争的过程和各国、各阶级在斗争中成败的因果。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设法解决我国当前自己的问题有借鉴作用，有帮助。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变成空谈，研究世界史是要学以致用用的。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⑩。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外文，最好能懂得几种外文，在世界史研究工作中，外文更为重要。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为了及时而广泛地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长期刻苦努力，学了十几种外文。他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而且写得非常好。他还能阅读希腊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罗马尼亚文等，他五十多岁时还发奋学习了俄文。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邓小平同志也讲过懂得外文的重要。他说：“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⑪。

我就简单讲这些意见。

原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面向世界 必须了解世界

——谈谈学习外国历史

今年，邓小平同志给景山学校的国庆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高瞻远瞩，用义深远，堪称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教育大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固然是体育战线提出的响亮口号，却实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强烈心声。我们不仅体育运动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经济力量、国防力量也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正是表达了我们这一志愿。

要走向世界，就必须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世界的今天，而且要了解世界的昨天和前天。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

（《邓小平文选》第55页）我们知道，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概括，不论是一个具体政策的制定还是大政方针的确立，都需要了解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确有一个向历史借鉴的问题，特别是向外国历史借鉴的问题。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还这么穷，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没有很好的研究别国的历史，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个因素。我们闭关锁国，孤陋寡闻，重复了别国犯过的一些错误，不免走了一些弯路。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她能够生存下去，并发展起来，就一定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民族活力，就一定有我们可资借鉴的优点和长处。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他们在短短的时期内，硬是起死回生般地把被军国主义分子推向毁灭深渊的日本经济重新振兴起来。他们缺少资金，自然资源不足，靠什么振兴经济呢？靠的是战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靠的是美国大量的短期贷款；靠的是日本政府重视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逐步实行了管理的现代化；靠的是对广大青少年乃至成年职工卓有成效的培训和教育。德国出口的机械设备、精密仪器，以其技术精湛、质量可靠而著称于世，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德国政府特别注重教育事业所产生的效益。法国的教育也有我们可资借鉴之处。在那里，中等学校的教师都要通过国家的考试才能正式聘用。匈牙利也很重视教育，据1982年统计，匈牙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60%以上的社长和技师都是受过大专院校教育的知识分子。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这方面，匈牙利的农业改革搞得很好。三十五年来，他们兴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社员的自留地提供各种方便，而这些自留地的面积几乎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0，总产值竟达全国农业产值的1/3。合作社帮助社员为自留地制定生产计划，用机器代耕，并提供种子和化肥，代销农产品。这样，农业合作社已经把自留地经济纳入了集体经济的范围。我想，匈牙利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是不是也有可以效法之处呢？

我们可以向外国借鉴的历史经验很多，以上只不过是举几个例子。其实，资产阶级是很懂得研究别的国家的历史的，欧美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历史就很重视。英、德、法、苏等国专门研



究我国历史的人数不少，并发表了许多专门论述我国历史的著作。目前，美国许多大学都设有中国历史课。欧美的历史杂志中也有不少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可见，他们是面向世界的。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无须研究、无所可取。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问题在于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改造它、提高它，为我所用。

学习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开阔眼界、培育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外国历史，可以使广大青少年了解世界各民族的兴衰荣辱和历史发展的进程，用以掌握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之学习外国历史是起于寻找职业的目的。但学了外国史以后，却使我大开眼界，有许多新的体会。例如学了美国史后，发现美国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少，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比其他国家快；学习了欧洲史以后，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争夺，特别是对巴尔干的争夺印象很深。当时虽然不明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些概念，但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要强盛起来，有它的内外因素，对这些因素必须有清晰的了解，才能找到救国的方法。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明白自己对国家、对历史应负的责任，和学习世界历史不是没有联系的。不知道过去，就不知道今天，就不懂得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人生观。

自“十年动乱”以来，我们长期忽视了对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外国历史的学习。我国广大青少年，甚至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的成年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忽视历史教育，耽误了整整一代人。据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1982 年的调查，中小学生的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尤其对外国历史知识懂得更



少。其主要原因，一是“十年动乱”中，中小学普遍取消历史课，少年儿童又看不到合适的课外读物；二是近几年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社会上普遍不重视历史课教学；三是历史教师数量少，质量不高。据统计，河北历史教师现在总数为14,483人，其中学过历史专业的仅有653人，占4.5%，而95.5%的历史教师没有学过历史专业而教历史课，学生学不好历史是可想而知的了。国内对外国历史的研究水平是低下的，难怪我国关于外国的历史著作大部分都是翻译的。

不仅教育部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不重视历史教学，就是出版部门也不重视历史知识书籍的出版发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有些不必印的东西印得过多，该印的东西却不给印。”（《邓小平文选》第55页）就拿历史普及读物来讲，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原本是要帮助广大中学生、青少年掌握外国历史知识，引起他们对外国历史知识的兴趣和重视，可惜的是，由于出版发行部门不重视，发行量很少，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最近，胡耀邦同志指示：“凡属广大群众需要阅读的政治书籍和知识书籍，大概每年也只不过上百种，象这样的书，不是印几万册，几十万册，而是几百万册，这是出版界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众观点。”胡耀邦同志这一指示十分重要。我希望，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一齐来关心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原载《人民日报》1983年10月28日。



附录

陈翰笙著作和论文目录

一、著作目录

书 名	出版时间和地点
人类的历史	上海1921年版
人类的故事（沈性仁译）	北京1925年版
国际新局面	北京1925年版
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与王寅生合著）	上海1929年版
难民的东北流亡（与张辅良等人合著）	北京1930年版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	北京1930年版
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	上海1930年版
亩的差异（与王寅生等人合著）	上海1930年版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海1934年版
华南农村经济问题	东京1936年日文版
Agrarian Problem in Southernmost China	上海1936年英文版
中国的地主和农民	纽约1936年英文版
工业资本和中国农民	纽约1946年英文版和日文版
中国农民	孟买1946年英文版
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	纽约1946年英文版
中国工业合作社史话	纽约1947年英文版
美国垄断资本	北京1955年版



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	北京1959年版
印度莫卧儿王朝	北京1964年版
华工出国史料汇篇（共十辑）	北京中华书局
Agrarian Regions of South Asia	新德里1980年版

二、论 文 目 录

篇 名	期 刊	日 期
临时抱佛脚	《现代评论》第3卷第53期	1925年12月
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现代评论》第3卷第55期	1925年12月
一笔亏本帐	《现代评论》第3卷第55期	1925年12月
英国能独吞莫索尔的 煤油吗?	《现代评论》第3卷第56期	1926年1月
苏联的共产党大会	《现代评论》第3卷第56期	1926年1月
十一国钳制中国的 协约	《现代评论》第3卷第57期	1926年1月
国际间资本的大团结	《现代评论》第3卷第58期	1926年1月
裁兵声中的美国预 算案	《现代评论》第3卷第58期	1926年1月
苏土盟约	《现代评论》第3卷第59期	1926年1月
苏资调节的失败	《现代评论》第3卷第60期	1926年1月
军阀的违法杀人	《现代评论》第3卷第61期	1926年2月
回民的大联合	《现代评论》第3卷第62期	1926年2月
梯罗尔南部的 问题	《现代评论》第3卷第63期	1926年2月
俄法会议的前途	《现代评论》第3卷第65期	1926年3月
急转直下的法国政局	《现代评论》第3卷第66期	1926年3月
德国与国际联盟	《现代评论》第3卷第67期	1926年3月
国际裁兵会议的前途	《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	1926年3月



三月十八日惨案目

击记	《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	1926年3月
中波间订约通商	《现代评论》第3卷第69期	1926年4月
美国资本家的势力	《现代评论》第3卷第70期	1926年4月
美国与塔克那阿利卡问题	《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	1926年4月
美国航空军备的扩充	《现代评论》第3卷第72期	1926年4月
俄德协约	《现代评论》第3卷第73期	1926年5月
波兰的革命	《现代评论》第3卷第76期	1926年5月
属地政策的新发展	《现代评论》第3卷第77期	1926年5月
葡萄牙的革命	《现代评论》第3卷第78期	1926年6月
西班牙的专政	《现代评论》第4卷第79期	1926年6月
美国资本的权威	《现代评论》第4卷第82期	1926年7月
匈牙利的亲英政策	《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	1926年7月
美国政府与农民	《现代评论》第4卷第84期	1926年7月
回民联合大进步	《现代评论》第4卷第86期	1926年7月
英国总罢工失败	《现代评论》第4卷第87期	1926年8月
哀哉法兰西	《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	1926年8月
菲列滨独立问题	《现代评论》第4卷第91期	1926年9月
何以德国能进国际联盟	《现代评论》第4卷第92期	1926年9月
法西斯政治的危险	《现代评论》第4卷第93期	1926年9月
布尔希维克党内的风潮	《现代评论》第4卷第94期	1926年9月
叙利亚革命的挫折	《现代评论》第4卷第95期	1926年10月
美国与巴西的关系	《现代评论》第4卷第96期	1926年10月
德国的旧经济政策	《现代评论》第4卷第97期	1926年10月
伦敦的帝国会议	《现代评论》第4卷第98期	1926年10月



- 布尔希维克的会议 《现代评论》第4卷第99期 1926年10月
- 基督教徒的醒悟 《现代评论》第4卷第100期 1926年11月
- 苏俄的第九周年 《现代评论》第4卷第100期 1926年11月
- 英国煤矿罢工成败的
 关头 《现代评论》第4卷第101期 1926年11月
- 吉海铁路问题 《现代评论》第4卷第103期 1926年11月
- 欧美银行家的宣言 《现代评论》第5卷第104期 1926年12月
- 美国的货富问题 《现代评论》第5卷第105期 1926年12月
- 汉冶萍借款的抗议 《现代评论》第5卷第106期 1926年12月
- 地中海的战云弥漫 《现代评论》第5卷第108期 1926年12月
- 阿尔彭尼亚问题 《现代评论》第5卷第109期 1927年1月
- 尼加拉瓜的战云 《现代评论》第5卷第111期 1927年1月
- 白沙拉比亚的问题 《现代评论》第5卷第112期 1927年1月
- 印度反对遣兵来华 《现代评论》第5卷第113期 1927年2月
- 什么是帝国主义 《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
- 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 《北大社会科学季刊》3卷
 4号 1926年2月
- 东北抗日最近情形 《救国日报》合订本 1926年7月
- 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 《东方》25卷19号 1928年10月
- 中国田地问题 《农业周报》53—55号 1930年10月
- 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
 副业 《女青年月刊》10卷4号 1931年4月
- 中国的农村研究 《劳动季刊》1卷1号 1931年9月
- 国联巴黎决议案的批评及国民对于调查委员团应
 取的态度 《东方》29卷3号 1932年2月
- 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
 经济 《申报月刊》1卷6号 1932年12月
- 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



- | | | |
|---|--------------------------------------|---------------------|
| (王汝骧译) | 《中国经济》1卷4—5期 | 1933年 |
| 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 | 《东方》30卷1号 | 1933年1月 |
|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序 | 载《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 中华平民促进会, 1933
年版 |
| 广东耕地所有与耕地
使用 | 《中山文教馆季刊》第1卷
第2期 | 1934年 |
| The Good Earth of China | | |
| Model Province | 《Pacific Affairs》 | 1936年3月 |
| Japanese Penetration in
Southernmost China | 《Far Eastern Survey》
Vol. V No:22 | 1936年11月 |
| Hopei—Chaher Council | | |
| Legalizer Smuggled
Goods | 《Far Eastern Survey》
Vol, V No:22 | 1936年11月 |
| A Critical Survey of
Chinese Policy in Inner
Mongolia | 《Pacific Affairs》 | 1936年4月 |
| Record Harverts Bring
New Monace to
Rural China | 《Far Eastern Survey》
Vol, V No:23 | 1936年11月 |
| Renewed Attempts to
Pave Chinese
Shipping Lines | 《Far Eastern Survey》
Vol, V No:23 | 1936年11月 |
| China's Military Costs | | |



Bring Huge Fiscal Deficits	《Far Eastern Survey》 Vol, V No:24	1936年12月
Conquest and Population	《Pacific Affairs》	1937年2月
Tientsin Slowly Emerging as a New Textile Center	《Far Eastern Survey》 Vol, VI No:1	1937年1月
侵略政策和人口问题	《中国农村》第3卷第7期	1937年7月
合作运动与农村机构	《工合通讯》1卷第6期	1940年11月
农村与抗战	《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 6卷第10期	1940年9月
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第7卷第3期	1941年1月
抗战建国与劳工问题	《中国农村》第7卷第5期	1941年4月
目前的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第7卷第6期	1941年5月
中国农村底认识	《合作前锋》战时版第11期	1941年
利贷资本与手工业	《中国工业》第6期	1942年6月
《战争与农村》序	《战争与农村》	1942年6月
物价与中农	《中国农村》第8卷第5—6 期合刊	1942年
旅行中对工业有感 (诗二首)	《中国工业》第8期	1942年
关于农业增产的二个 建议	《中国农村》第8卷第3期	1942年5月
工合和建设	《中国工业》第9期	1942年
美国制钢业的进步	《中国工业》第18期	1943年
目前工合的困难问题	《中国工业》第21期	1943年11月
广西工业的前途	《中国工业》第22期	1943年12月
如何走上工业化的		



- 正轨 《中国工业》第23期 1944年1月
- 工合如何走上正轨 《建设研究》第9卷第3期 1944年
- 米价与农民 广西日报1944年3月13日
- 致张锡昌函（手稿） 由新德里寄桂林 1944年6月
- 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 《中国工业》第28期 1945年7月
- 中国五大独占集团 《文萃》第2卷第11期 1946年11月
- 独占集团与中国内战 《经济周报》第4卷第1期 1947年1月
-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
- 中国的独占事业与内战（任新韦译） 解放日报1947年1月2日
- （李宛译） 《民潮》第5期 1947年2月
- 原文载《Far Eastern Survey》
- Agrarian Reform i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1948年4月
- Sinkiang Surrey** 《Far Eastern Survey》 1948年5月
- 中国的土地改革 《世界与中国》再生版第1期 1948年6月
- 美国的垄断资本 《人民日报》1951年2月3日
- 美国财阀与美国侵略政策 《世界知识》1951年第15期
- 美国经济何以必然动摇 《学习》1951年第4期
- 从经济看美国政治 《人民周报》1951年第5期
- NEW RISE OF INDUSTRY** 《中国建设》1952年第1期
- 五十年来的印度史学界 《新建设》1952年3月号
- 走向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 《世界知识》1952年第35期
- LAND REFORM UPROOTS FEUDALISM** 《中国建设》1952年第3期
- 帝国主义的备战经济与当前的



- FISHERMEN'S COOPERATIVES 《中国建设》1956年第9期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
巴基斯坦——“纯洁的人的
地方” 《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8日
支持鲍惠尔，支持正义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
- GLIMPSSES OF THE NEW
COUNTRYSIDE 《中国建设》1957年第1期
在高度工业化的捷克斯洛
伐克 《光明日报》1957年3月9日
富强的捷克斯洛伐克 《文汇报》1957年3月10日
美国的内政和外交——读尼
尔林夫妇合著《今日美国》 《读书月报》1957年第5期
关于美国宪法 《中国青年》1957年7月号
- FUKIEN—A PROVINCE IN
CHINA 《中国建设》1957年第8期
从印度展览会谈中印贸易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9日
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
的态度 《历史教学》1957年第12期
经济建设中的福建 《印华经济》第5卷，第15期，
1957年
- HOW CHINA FINANCES
HERSELF 《中国建设》1957年第10期
THE STORY OF TIEN AN
MEN 《中国建设》1958年第5期
美国农业及其危害 《经济研究》1958年第8期
印度国大党的土地政策 《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2期
FROM COOPERATIVE TO
COMMUNE 《中国建设》1958年第10期



- NEW FACE OF A PROVINCE 《中国建设》1959年第10期
A COMMUNE WITH TWO
WINGS 《中国建设》1960年第6期
FROM GRAIN SHORTAGE TO
GRAIN SURPLUS 《中国建设》1960年第7期
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
——公元第五至十七世纪 《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
印度农村阶级 《经济研究》1961年第11期
印度的土地改革 《新建设》1962年7月号
PORCELAIN—MAKING
MODERNIZED 《中国建设》1963年第8期
VISIT TO TWO COMMUNES 《中国建设》1964年第3期
法国1789年革命前夕城市各阶级 《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陷入严重困境的印度农村——
评印度库苏姆·奈尔著《落在
尘埃中的花朵：印度情况
发展中人的因素》 《世界知识》1965年第19期
印度粮荒为何如此严重 《世界知识》1966年第4期
关于编写世界通史的问题 《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
5期
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 《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猪仔”出洋——七百万华工
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 《百科知识》1979年第5期
追念蔡子民先生 《人民日报》1980年3月4日
谈谈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 《社联通讯》1980年第7期
研究世界经济的几点建议 《世界经济导报》1980年7月15日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斯诺二三事

谈谈孙夫人的高尚品格

《光明日报》1982年2月15日

载《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BEGINNINGS GROWING PAINS

AND PROSPECTS

社会调查研究八题

《中国建设》1982年第1期

《社会——社会学丛刊》1981
年第1期

Slave States In China Six Thousand

Years Ago

香港《东方地平线》

(East Horizon) 1977年12月号

我与商务是同龄

我学与用外文的回忆和体会

不能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

香港《文汇报》1982年2月14日

《英语世界》1982年第4期

《中国日报》1982年1月1日
增刊

要学习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丛刊》

第三辑商务印书馆, 1983年3月

青少年们的好消息

《美国札记》再版序言

追忆吾友杨杏佛

论世界经济中的矛盾

《光明日报》1983年8月17日

杨刚《美国札记》湖南1983年版

《文汇报》1983年9月10日

《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12月
26日

发展工业合作社要面向广大
乡镇

《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5月
28日